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近代后期军事史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本书系《世界全史》百卷本之一。全书以编年纪事为主线，坚持东西并重、整体构思、敬史重实、史论结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代后期的重大战争及其他军事活动、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军事和军事理论的演变发展，并对这一时期军事领域的事件和人物给予了公正、客观的总结和评述，体现了对世界近后期军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一、概述

以 1815 年拿破仑帝国崩溃为标志而开始的世界近代后期史,是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处于上升阶段的历史,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不仅经济有了巨大发展,军事的发展也十分引人注目。革命与反动、奴役与解放、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连绵不断,使世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与硝烟;产业革命在促进生产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军事技术的飞跃;通过不断总结军事斗争的实践,资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逐步形成并趋于成熟;而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更以其崭新的科学理论,为人民革命的军事斗争提供了指南。

世界军事领域的这一系列重大发展,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后期军事史的内容,在世界军事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

1. 世界近代后期军事史的基本线索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当欧美许多国家已进入发达的资本主义之际,一些落后的亚非国家却还处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这种历史发展的差异性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也表现在军事领域。

在近代后期,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欧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走在世界前列,在军事上也处于领先地位。1815 年以前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仍然是世界军事舞台上的佼佼者,但各自的军事实力均发生了很大变化。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英国,军事力量又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海军领域、殖民军建设和军事工业等方面,都已超过欧洲其他列强,成为处于颠峰时期的海上霸权与殖民帝国。法国在拿破仑战败后丢掉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军事力量受到削弱,发展受到限制,虽经以后几十年的卧薪尝胆有所复苏,但整体实力仍不敌英国。在粉碎拿破仑帝国的战争中曾显示出较强军事实力的沙皇俄国,由于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羁绊和工业革命滞后的影响,在军事上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趋势。同沙俄的境况一样,在反法联盟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奥地利,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也日益衰落,军事实力越来越落后于其他欧洲列强。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励精图治,实施了一系列军事改革,在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大业后,逐渐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欧洲列强为了争夺霸权,军备竞赛和军事斗争愈演愈烈,军事实力此消彼长,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在近代后期,发生在欧洲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有近百次。其中规模较大的主要有:1853 年到 1856 年的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为争夺巴尔干半岛及近东各国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克里木战争;1848 年到 1866 年的撒丁王国、法国为驱逐奥地利,实现意大利统一的三次战争;1863 年到 1871 年的普鲁士、奥地利、丹麦、法国为争夺领土和德意志统治权的三次战争。这些战争和重大军事活动,不断改变着欧洲原有的军事格局,构成了近代后期欧洲军事历史发展的主线。

在美洲,自 1812 年—1814 年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美国实现了独立,

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军事实力的大大增强。在军队建设上，根据陆军部长卡尔霍恩、西点军校马汉和哈勒克等人为主要代表提出的关于建立一支现代化、职业化正规军的思想，加强了常备军队的建设，扭转了美国长期以来偏重民兵而忽视正规军建设的状况。在近代后期，美陆军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指挥系统和军官队伍建设更令世人瞩目。在加强陆军建设的同时，海军和海防力量也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到 19 世纪中期，美国不仅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和世界最先进的舰船，而且在漫长的海岸线上构筑了防御工事，形成了牢固的海防体系。美国为了取得在美洲的霸权地位，不断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从 1817 年到 1858 年，美国多次发动了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自 1846 年到 1848 年，美国又大举入侵墨西哥，发动了著名的美墨战争。通过这一系列掠夺战争，美国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版图。在不断扩张领土，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美国国内矛盾也日益加剧。1860 年，代表北方资产阶级利益的林肯当选美联邦总统，南方 11 个蓄奴州宣布退出联邦成立“南部同盟”。在资本主义与封建奴隶制度的尖锐对立下，1861 年—1865 年，美国爆发了南北内战。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第一次大规模现代化战争。它不仅表明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正在美洲大陆崛起，而且对世界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近代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为了攫取资源和开拓商品市场，掀起了疯狂争夺殖民地的狂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开展了大规模反对殖民主义的军事斗争。在亚洲，多数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在几乎遍及整个亚洲的一系列反殖战争中，其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 1825 年—1830 年印度尼西亚人民抗击荷兰殖民主义者的蒂博尼哥罗战争，1839 年—1842 年阿富汗人民抗击英国殖民入侵的战争和 1857 年—1859 年印度人民反英民族大起义。在非洲，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也如火如荼，从北非的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到西非的加纳、塞内加尔，到南非的大菲希河流域、纳塔尔，到处都有非洲人民同英、布等殖民主义者浴血奋战的战场。在拉丁美洲，驱逐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更令世界瞩目。特别是在墨西哥、南美北部和南美南部等西属殖民地爆发的独立战争，彻底粉碎了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变拉美为“黄金乐园”的梦想，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和解放。

灾难深重的中国在封建社会漫长的黑夜中艰难前行，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才缓缓进入近代社会。近代中国的历史，既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英、法、俄、美、日等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大举入侵中国。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对外妥协投降，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对立所导致的革命和战争异常频繁，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从 1840 年到 1900 年的 60 年间，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战争，大小不下 50 次。其中主要有：1840 年—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 年—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1 年—1864 年的太平天国革命，1876 年—1880 年的收复新疆失地之战，1883 年—1885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1901 年的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这些战争不仅记录了泱泱中华蒙受帝国主义蹂躏的奇耻大

辱，同时也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悲壮的篇章。

世界近代后期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也为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尤其是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军事技术和兵器的发展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在火药的制造上，不仅黑火药的配比更为科学，制造工艺更加先进，而且发明了以硝化甘油为主要原料的高爆炸药和引爆这种炸药的雷管。在枪械方面，击针后装线膛来复枪和圆柱锥形子弹的发明，是近代后期步兵轻武器最具革命性的变革，这一发明大大提高了步兵轻武器的射速、射程和射击精度；在此基础上，实现连发射击和自动射击的机枪也开始问世，它标志着枪械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时代。在火炮方面，自 1846 年意大利卡韦利少校制造出第一门线膛炮后，昔日的前装滑膛炮逐步为后装线膛炮所取代，球形炮弹也改进为圆锥形榴弹和榴散弹。在舰船方面，不仅出现了驱逐舰、战列舰、巡航舰、潜艇、鱼雷艇等新型军舰，而且舰船的动力、质量、载炮等都有了重大改进，大功率钢质军舰普遍使用，舰载炮已由威力较小的舷炮变为威力较大的套筒炮和可以旋转的装甲炮塔。除此之外，其它方面的发展也十分显著，如野战电话的出现无线电报的发明等等。中国长期奉行闭关自守政策，军事工业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当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一批仁人志士开始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进而兴起了发展军事工业的“洋务运动”，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等军事工业企业，初步具备了生产和制造近代武器装备的能力。

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样式，而且推动了军事制度的变革。西方国家军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军队普遍建立了新的领导和指挥机构——总参谋部，改变了过去军队由最高统帅直接指挥的领导体制；二是军队的组织编制日趋庞大和复杂化，出现了军团（集团军）、兵团（军、师）、部队（团）以及工兵、炮兵等独立兵种的编制；三是实行了普遍的义务兵役制，改变了雇佣形式的募兵制；四是加强了军官培训制度，普遍兴办了军事院校；五是改革了就地筹措供给、自然力运输、战地救治等后勤保障制度，普遍实行了后方供应、机器动力运输、后送救护等后勤保障制度。中国晚清军制的改变，主要是将八旗、绿营制变为勇营制，设立水师和海军军制，创设新军军制等等。这些变革，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是近代后期世界军事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们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总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体系。在灿如星河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和瑞士的诺米尼。克劳塞维茨是被公认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权威，他通过《战争论》等著名军事著作，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最一般的战争原理和战争哲学，提出了“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等著名论断，诺米尼是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战争史和战争理论两大类。这些著作从理论上对军事学术进行了总结，对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完善影响极大。随着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军事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理论。这一军事科学史上的崭新理论，以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在批判地继承以往军事理论遗产和总结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从战争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军队、人民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军事思想和一系列原则，从而创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先进、最科学的军事理论。

2. 世界近代后期军事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个时代军事的发展，总要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总是与那个时代的国家、民族、社会的各种关系和矛盾相联系。世界近代后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兴的资本主义在较大范围内扫除了封建桎梏，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的较量远没有完结。资本主义在它的工业化过程中，又孕育出一个与自己相对立的充满生机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同时，资本主义固有的掠夺和扩张本性不断膨胀，使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列强间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世界近代后期的军事发展具有与其他时代不同的诸多特点：

（1）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性

各国军事实力强弱不一，这在各个历史阶段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但在近代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

首先，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来看，在 1815 以后，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盛而衰和由弱转强的两种趋势同时存在。过去一些实力很强甚至处在世界霸主地位的国家，军事实力出现了衰退，降为二流甚至更差的国家，如法、俄、奥、土等国；而另一些原本实力较弱的国家，军事上却出现了惊人的发展，很快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如美、日、德、意等国。近代后期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发展出现不平衡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获得独立和统一，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解放，依靠殖民掠夺大发横财等等，是军事力量获得较快发展的直接原因；而战争的失利，政治上复辟倒退，国家出现分裂以及工业革命滞后等等，则是军事力量衰退的主要原因。

其次，从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两极分化”趋势非常突出，且两者的差距越拉越大。中、英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军队建设、武器装备、海防力量等相差之悬殊的情况，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在近代后期军事力量越来越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其内在根源在于这些国家仍处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制度的束缚之下，闭关锁国、生产力低下导致了军事力量发展非常缓慢；而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入侵和掠夺又进一步限制了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加剧了它们的积贫积弱。

（2）军事斗争的多样性

处在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近代后期，被中外一些历史学家看作是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如果仅仅是将这一时期的武装冲突与世界性大战的规模相比较而言，这种看法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战争不仅从未停止过，而且战争的性质也比其他时期更为复杂多样。

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继公元 17、18 世纪英国、法国完成资产阶级革

命之后，近代后期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又有了深入发展，在欧、美乃至全世界，爆发了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战争。其中 1848 年—1849 年爆发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是近代后期，也是整个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战争。除此之外，意大利统一战争、德意志三次王朝战争、美国南北战争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等等，也主要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战争。

二是西方列强的争霸战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寻求地区和世界霸权，长期以来互相争夺，烽烟不止。在近代后期，这种争霸战争仍然十分激烈。爆发于 1853 年—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就是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纯粹的列强争霸战争。

三是殖民征服和反殖民战争。近代后期是西方列强殖民掠夺最猖獗、最严重的时期之一。资本主义为了倾销商品和夺取资源，纷纷向亚、非、拉国家侵略扩张，建立和争夺殖民地。它们的罪恶行径，遭到了亚、非、拉人民的奋起抵抗和坚决斗争。其间发生了中国的鸦片战争、印度民族大起义、西属拉美独立战争等大小数百次的殖民入侵与反殖民主义战争。这些战争既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充分展示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除上述几种性质的战争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后期人民革命战争也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在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之后领导的工农革命（如巴黎公社），虽然从纯粹军事的角度考察并不十分显要，但在人民革命战争史上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军事技术的跃进性和渗透性

世界近代后期军事技术的发展，同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都显得十分突出与辉煌。由黑火药到高爆炸药，由前装滑膛枪炮到后装线膛枪炮，由球形枪炮弹到圆锥形枪炮弹，由木质帆船到钢质蒸气动力军舰，……凡此种种，每一项成就都是带有革命性的变革，都在原有基础上产生了质的飞跃。而且其成就之广泛，涉及领域之全面，也是世界军事发展史上少有的。当然，这些尖端军事技术成就，绝大多数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近代后期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先进的科技成果被优先用于军事领域，进而促进了军事技术的革命。

资本主义世界军事技术的发展，通过战争媒介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这种现象在近代后期极为普遍。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倡导“师夷长技”，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大兴发展军事工业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落后的军事工业向近代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正是这一时期军事技术渗透性的具体体现。

（4）军事理论的系统性和创新性

军事理论的研究是军事各领域中相对滞后的领域。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从 17—18 世纪开始萌芽，其主要代表为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初期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不仅带有很大封建色彩，而且支离破碎，极不系统。到近代后期，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有了长足发展。以克劳塞维茨、诺米尼、卡尔大公、马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不断涌现，他们在近代前期军事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使资产阶级军事理论最终形成了从战争、战略、战役、战术到军事思想、军事艺术、军事历史等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近代后期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研究之所以十分活跃和富有成

果，这与此前的和这一时期的丰富战争实践，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拿破仑战争的军事实践所提供的大量研究资源有直接的关系。

近代后期军事理论研究的另一巨大成果，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创立的无产阶级军事学说。这一学说的问世，开创了世界军事理论研究的新纪元。它不仅对已有的古典的、近代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批判，而且及时地把握了无产阶级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人民革命军事发展的总趋势，提出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暴力革命等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和原则，从而为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二、欧洲列强实力的消长与新的军事角逐

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世界军事格局发生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欧洲军事体系中表现尤为突出。在工业革命和战争的推动下，军事实力本来就较强的英国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并日益成为欧洲乃至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军事强国；而法国、俄国、奥地利等一些曾称雄欧洲的军事强国，由于产业革命的滞后和战后君主复辟等因素的影响，军事实力相对地衰退了，尽管它们在欧洲军事格局中仍具有一席之地，但企图独霸一方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另外，像德意志这样长期处于分裂和力量较弱的国家，由于实行了军事改革和通过王朝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因而军事实力大增，逐步成为鼎立于欧洲列强的军事大国。这些变化，使暂时比较平静的欧洲仍潜伏着危机与躁动。这一时期，虽然像拿破仑战争那样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不曾发生，但围绕民族问题和领土边界等问题展开的局部冲突却接连不断，大国间的争霸仍十分激烈。同时，欧洲列强向外扩张，征服不发达民族的战争也进一步加剧。总的来讲，欧洲这一时期处在相对和平之中，但在和平气氛掩盖下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斗争远没有停止，这是欧洲这一时期军事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

1. 军事大国的兴衰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活跃在欧洲军事舞台上的主要有五个国家，即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拿破仑战争之后，这几个国家仍然是欧洲最具有实力的军事大国。但由于战争和工业化等因素的影响，它们在军事上的发展极不平衡，军事力量的对比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从而也改变着欧洲原有的军事格局。

（1）英国：颠峰时期的海上霸权与殖民帝国

在研究 1815 年到世纪末欧洲军事力量时，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忽视英国的显著地位。因为这一时期英国军事的发展和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的优势和不断扩大的殖民地，是任何欧洲列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正如美国一位著名的战略历史学家所说：“19 世纪后期肯定不是英帝国‘企图获得世界霸权’的时期。正相反，这种‘企图’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作出，并在 1815 年胜利时达到了顶点，这次胜利使英国在以后半个世纪内蓬勃发展，确立了实际上无可争辩的海上和帝国的极大优势。英国在 1815 年以后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有两个最为直接的背景。

第一个背景是长期以来，英国积极参与欧洲列强的争霸战争，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夺取了大量殖民地取溺海上霸权。英国从 17 世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后，就通过一系列战争，先后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全世界海上马车夫”荷兰，逐步拥有了海上霸权地位。特别是在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以组织者的身份勾结欧洲大陆几乎全部封建势力，拼凑了七次反法联盟，经过多次反复较量，终于彻底打败拿破仑帝国。英国及其反法联盟的这一重大胜利，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英国摧毁了欧洲大陆一个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2 页。

强有力的争霸对手，而且还使英国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可观的实际利益。在1814年7月到1815年6月的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和大败拿破仑军队的俄国坐到了十分显赫的席位上。通过英、俄、奥、普四国分赃，英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一份，即获得了地中海战略要地马耳他岛以及战争期间已经占领了的荷兰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包括南非的开普、亚洲的锡兰、美洲的圭亚那部分领土和特立尼达，还取得了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权。英国正是通过不断挑起和介入列强战争并在战争中获得利益，为自己成为军事霸主开辟了道路。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英法“七年战争”时所指出的：“七年战争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拥有领土的强权。正是那个时候，才奠定了现实的这个东方不列颠帝国的基础。”

第二个背景是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率先进行了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使英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并建立起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在产业革命的大约70年内，英国工业生产的增长占据了整个欧洲工业生产增长的2/3，在世界工业生产的份额中也由革命前占1.9%猛增到革命后的9.5%，到1860年又上升到19.9%。同时，产业革命使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是首屈一指的世界贸易大国，其贸易量占全世界总量的1/5，超过了法、德、美三国的总和。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1/3还多。产业革命对英国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广泛使用机器和技术进步，对军事工业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武器装备获得进一步改进；海外贸易的扩大使争夺海上霸权显得更为迫切，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工业原材料需求和产品市场需求迫使英政府采取更为激进的殖民扩张政策，这就使得掠夺殖民地的军事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就是在上述两个主要背景和条件下，英国的军事力量获得了很大发展，在一些重要的军事领域处在了世界的领先地位。

最引人瞩目的是海军的壮大。英国为了争夺海上霸权，保护海外贸易，历来重视海军的建设。在1815年前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皇家海军就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但这还不能说明它已经完全拥有了海上霸权，因为还有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能够与它抗衡和进行海上争夺，波旁王朝就曾多次同它进行较量。但从1805年，著名的“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英国舰队大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之后，在近一个世纪里，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敢于向英国海上霸权真正进行挑战。正如英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劳埃德所说，只有英国的海上力量产生了“海上帝国史上从未有过的广泛影响”。尽管1815年后英国将战时的皇家海军作了大量裁减，但数量仍然十分可观。1816年英国海军兵力大约15万人，在克里木战争之前，几经削减，其兵力降到约为5万人的最低点。但在克里木战争之后，数量又大幅度增加，到1860年时，达到约20万人，而且此时英海军已拥有了200余艘先进的舰船，其中大部分为蒸气动力驱动。战舰吨位高达60余万吨，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列强。皇家海军除驻守本土之外，海军基地和电缆通信站网更是遍及全球。从实际战斗力看，英国皇家海军可以抵得上任何别的3个或4个国家的海军。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当时在欧洲极具威慑作用。

比如英国为保护葡萄牙君主国，把舰队停泊在塔克斯，在地中海多次使

用舰队攻击和遏制别国海军，每当“东方问题”出现紧张势头，就派舰队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在欧洲以外地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小舰队乃至个别战舰，在进行镇压海盗、拦截贩奴船以及慑服殖民地区地方统治者等大量活动中，更是具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所有这一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自我炫耀武力的一种手段，但也显示出英国皇家海军的确是一支很有实力的强劲的海上力量。

第二个显示英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方面，是它不断扩大的殖民军建设。英国依靠殖民掠夺，支持和促进了它的经济繁荣，反过来，经济繁荣又刺激着它更疯狂地掠夺殖民地，以满足它迅速扩大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需要。诚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尖锐，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从1815年以后，列强斗争稍事缓和，英国除对法国在太平洋的活动或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不时感到紧张外，已经没有更厉害的对手了。所以，英国在对外政策和军事建设上，都把重点放在了更大规模的殖民军建设和殖民入侵上。曾两度出任外交大臣和自由党内阁首相的帕麦斯顿勋爵，是殖民政策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他极力反对民主改革，主张以武力进行殖民扩张来缓和国内矛盾。英国大资本家、殖民主义者谢西尔·罗德斯更是露骨地叫嚷：“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避免残酷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领土，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出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在上述殖民政策的驱使下，英国的殖民军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殖民征服战争也愈演愈烈。有关资料的统计数字有助于直观地说明这一点：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国防开支平均每年约为1500万英镑，而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掠夺殖民地达到高峰时，平均每年的国防费开支便高达2700万英镑，增长了近一倍。这些费用主要用于殖民军的征服战争。殖民军数量的增长也是惊人的。1830年，英国常规军的人数为14万，到1860年，猛增至34.7万人。这些兵力，用于保卫本土安全的所占比例极小，大都被派遣到非洲、亚洲、美洲和大洋洲进行新的殖民征服战争和镇压老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比如，在1840年—1860年英国入侵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英国派往中国的殖民“远征军”就有步兵1万余人，海军4000多人，战舰25艘，舰炮700余门。而当时英国派往海外的殖民军有数十支，同驻印度、北美、南非等地的英国殖民军比起来，入侵中国的英殖民军规模算是较小的。依仗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坚船利炮的殖民军在1815年至1865年期间，英国每年平均约将世界上10万平方英里的地区沦为殖民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所占有的殖民地面积达到了30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它本土面积的110倍，英国成了世界上头号殖民大帝国。

体现英国军事实力的第三个方面，是它军事工业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改进。19世纪初叶，英国的火药制造工业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能够采用物理和化学方法，以蒸气动力、水压机械等先进工业设备，进行火药的提纯、造粒、烘干、磨光等加工制作，其火药配方已被各国奉为标准配方。无论在火药的制造方法和生产规模上，英国都大大超过了拥有火药发明权的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火药制造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其他武器的革新，其中雷管和圆锥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02—803页。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99页。

弹丸的发明是 19 世纪前半期两个最为重要的发明。这两个发明使步兵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前者使步枪在任何天气中都能使用，而且大大减少了不发火的机会，后者则使有来复线的步枪变成了这个世纪中威力最强的兵器。到 1851 年以后，英国陆军已普遍采用圆锥形米尼式子弹和来复枪。在火炮的制造方面，英国也有了较大突破。其铸炮技术除模铸法外，又开始采用镗床将实心金属圆柱镗钻成炮管的先进工艺，不仅提高了火炮的精度和坚固性，同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至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著名的乌理治兵工厂，已能成批生产与德国克虏伯炮齐名的阿斯特朗先进前装炮和后装线膛装箍炮。英国为了使皇家海军无敌于天下，在舰船的改进上更是不惜血本，始终走在世界前列。克里木战争结束后，它和法国争相建造自己的第一艘装甲蒸气军舰，当法国人“光荣号”下水不久，英国的“勇士号”也建成。而后者长达 380 英尺，排水量为 8830 吨，引擎功率 6000 马力，舰速每小时 14.5 海里，并装有 28 门口径为 7 英寸火炮，装甲厚度达 4.5 英寸，其各方面性能都大大超过“光荣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装甲蒸气军舰。

尽管在这一时期英国陆军建设仍非常薄弱，政府不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那样将巨大财政支出用于军事动员和建立庞大的军队，但在工业革命后雄厚经济基础的支持下，英国的军事实力是其他任何列强都难以相比的。它所拥有的海上优势和广大的殖民地，不仅使其成为帝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时期，也使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望尘莫及。

（2）法国、俄国、奥地利：衰退中的军事强国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法国、俄国和奥地利是欧洲三个主要的军事强国。但从 1815 年以后，这三个国家远不及英国的发展顺利，在军事实力上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

法国在拿破仑时代是欧洲不可一世的军事霸权，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在它的控制之下。拿破仑战争的失败成为法国的转折点，使它从昔日的辉煌一下子跌落下来。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在分析拿破仑失败产生的影响时说：“同英国的决斗给法国带来了双重失败，它不仅未能达到在旧大陆保持霸权的目的，而且也没有赶上英国工业的前进步伐。三十年的退缩，特别是五十年的落后，使法国受制于其征服世界的劲敌。同时，主要由法国的刺激而激发出来的欧洲民族主义高涨起来了，并在大陆形成一股反抗法国的力量。”1815 年以后，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表示决心制止法国继续称霸的企图。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多数人士都极力主张采取一项“恢复”政策。但很显然，这在当时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只要法国对低地国家采取入侵行动，就会出现英国、普鲁士或其他列强结成的反法同盟来加以遏制，而法国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战争的溃败和列强的制约，使法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和限制。在 1793 年至 1815 年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大约有 150 万人丧生。更重要的是，在整个 19 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远不如其他大国，这对法国的军事动员和兵员补充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1812 年，在拿破仑远征俄国的时候，法国拥有一支至少 60 万人的“国际军队”。而在拿破仑战败后的 1816 年，法国兵力的总人数锐减到仅有 13 万人左右。这种状况虽然在以后有所改观，但始终未能恢复到拿破仑时代的规模。普法战争前夕，面对拥有 80 万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军队，法国所能调动的只有 30 万兵力。1868 年，立法院通过了附有许

多缓免条款的尼埃尔法，力图用抽签方法实行9年兵役制，此外再加4年后备军役。这样，每年招募8万人，法国原则上应有50万军队和30万后备军，必要时还可征集“抽得好签”的人成立机动队，但事实上这种设想并未真正实现。

最能显示法国军事实力的是它在武器装备方面的改进和发展。法国的发明家在佩汉斯将军的领导下发明了平射炮、“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等“划时代的舰艇设计”以及米尼式子弹、来复枪。法军拥有世界上最精良的沙斯波步枪，这种步枪的性能比普鲁士的撞针枪更为先进，同时还拥有机枪这一新式秘密武器，射速为每分钟150发。

尽管如此，法国在军事上的总体实力已远不如18世纪以前，也就是说，无论在哪个方面，它都难以在欧洲列强中处于领先地位。它的军队虽然仍比较庞大，但数量不如俄国；它的舰队得到了历届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但其规模却不如皇家海军；它的武器装备相对比较先进，但其野战炮却比不上普鲁士克虏伯公司制造的野战炮，“光荣号”战舰也比不上英国的“勇士号”战舰。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也远没有英国那么广泛。

应当指出的是，法国在军事上虽然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和显赫地位，但它仍然是欧洲列强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强国。特别是它在制衡欧洲列强的军事对抗中，常常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克里木战争中法国对俄国侵略的遏制，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战争中法国所起的作用，甚至比英国都要大得多。

俄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粉碎了法国60万远征军的进攻，为反法联盟夺取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以救世主自居的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维也纳会议后倡议缔结了所谓“神圣同盟”，沙皇俄国在这个同盟中居于主要地位，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中心堡垒，有“欧洲宪兵”之称。当时的俄国，在军事上的确非常强大，特别是它的陆军力量，是任何欧洲列强都望尘莫及的。但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当欧洲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工业资本主义不断壮大的时候，俄国仍处在封建农奴制和沙皇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这就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不仅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在军事上也出现了严重的衰退。

抗法战争结束之后，亚历山大一世政府为了加强军事动员，压缩庞大的军费支出，在俄军中普遍推行了所谓“军屯制”，即将一些地区划作军屯地区，军屯地区的农民实际上都变成了终身服役的士兵，既当兵又种地。在正规部队中服役6年以上的老兵和当地18—45岁的“国家农民”组成军屯营或团，作为军屯部队的骨干。其他一切适合服兵役的居民，则编入后备队。到1825年底，军屯部队总数近16万人，另有“世袭兵”15.4万人。亚历山大一世本来是想用军屯制取代征兵制，从而减少军费开支，但结果适得其反。军屯部队不但把生产搞得一塌糊涂，根本不能自给，而且还要国家大量补助。更严重的是这种全民武装的农村，为农民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1831年诺夫哥罗德军屯部队曾爆发大规模起义，使沙皇政府十分恐惧。因此，尼古拉一世不得不废除军屯制，重新颁布兵役条例，恢复实行征兵制。但由于尼古拉一世所推行的仍是封建性的军国主义制度，服兵役的主要是农民、小市民和士兵子弟等劳动人民，而贵族、商人和神职人员等统治阶级则免服兵役，且士兵服役期长达22至25年，这就严重影响了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的储备。到克里木战争前夕，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只有14万人，战时兵员扩充只能依

靠未经训练的新兵。

俄军军官主要来源于志愿从军的贵族，不仅数量严重不足，素质也十分低劣。各类军事学校无法满足部队对军官的需求，部队中经过军校培训的军官只有 12% 左右。各级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不仅缺乏军事指挥才能，而且对部队管理也知之甚少，军官中贪污腐化、虐待士兵的现象随处可见，导致士兵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仅从 1825 年到 1850 年间，俄军士兵就有 23 万人因开小差、参加“骚动”、谋杀或侮辱军官而被交付军事法院审判，同时，还有 100 万以上的士兵因受军官虐待而死亡。

工业革命滞后严重影响了俄国军事工业的发展。19 世纪俄国的军工生产大大落后于其它欧洲列强，火药生产数量不足，喀山等地火药厂虽号称拥有 10—12 万普特（1 普特=16.385 公斤）的年生产能力，但实际年产量只 5—6 万普特。到 19 世纪中期，英国、法国陆军已普遍装备了新式猎兵枪，而俄军步、骑兵绝大多数仍使用过时的滑膛火枪，其性能仍停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仅有少数作战步兵装备了猎兵枪，还全部是进口产品。同样，炮兵装备也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相当。当时俄军炮兵装备主要是铜铸前装弹滑膛炮，其射程仅有 600 多米，还不如新式猎兵枪，很难在作战中发挥有效的攻击作用。

19 世纪的俄国海军在欧洲具有一定的地位，除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含多瑙河区舰队）外，还有阿尔罕格斯克、里海和堪察加 3 个分舰队。按主力舰数量，俄国海军仅次于英法，居世界第三位，但质量甚低，技术装备落后。当西欧列强海军大量使用蒸气机发动和螺旋桨推进的新型舰艇时，俄国海军的绝大部分还是木制帆船，其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奥地利在拿破仑战争之前也是欧洲的一个军事强国。18 世纪中期，查理六世去世后，玛利亚·特利萨经过 8 年战争，取得了帝位的合法继承权。她为了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军事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她仿照普鲁士兵兵制，进行军事改革，根据战绩起用军官，在农民、手工工人和手工业者中大量征募新兵，经军事训练后，遣散复员，需要时重召入伍。在她 1749 年实行改革之初，军队只有 10 万余人，到 80 年代初就增至 27 万余人。她为了筹集军事改革费，还成立了执政部，总管内政和财政，并规定 10 年期间的课税定额，使中央征税权摆脱了封建主把持的地方议会逐年批准的限制，保证了国家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这些措施，为建立一支较强的奥地利常备军奠定了基础。

在拿破仑战争中，奥地利军队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多次参与英、俄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当法国对外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在吞并了哈布斯堡家族在比利时和意大利的领地，又威胁到奥地利本土的时候，奥皇弗兰茨不得不采取措施，广泛动员人民，加强国家的武装力量。1807 年，奥地利开始实行普遍兵役制，即“全民皆兵”。除正规军队外，还建立了民兵部队，动员 45 岁到 60 岁的男子在辅助军队中服役。在布拉格、布尔诺以及捷克各小城市，市民和大学生都被组织起来，成立了志愿军。广泛动员国家公民充实军队，使当时的奥地利军队变得非常强大。在 1809 年的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取得了许多虽然是局部的，但却很有意义的胜利。约翰大公指挥的民兵部队向意大利挺进，在波登纳把法兰西人击败了；斐迪南大公在拉斯迁战胜了和拿破仑同盟的波兰人；提洛尔的农民部队在霍佛尔指挥下起义，使 3000 名法军缴械投降。当时奥地利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不仅引起整个欧洲的注视，而且也鼓舞了反法联盟同拿破仑战斗的信心。也许正是奥地利在这方面所作的贡

献，才使它在维也纳和平会议的分赃中得到了足够的“补偿”。

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看起来似乎强大的奥地利在军事上却越来越走入困境。这首先是由于在同法国的数次战争中使奥地利资金耗尽，公债负担沉重，大量纸币贬值，迫使政府将军事开支降到了最低限度。1830年，军队分配到资金由1817年占总收入的50%降到只占23%，而到1848年，这个比例又降到只有20%。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出现战争危机时，政府同意额外增加军事开支，但其费用也绝对不足以使军队达到满员水平。一旦危机结束，军费很快又降了下来。例如，1860年的军事预算为1.79亿佛罗林；到1863年降为1.18亿佛罗林，在1864年与丹麦的冲突中上升到1.55亿佛罗林，到1865年，即普奥战争发生的前一年，军费再次大幅度降到9600万佛罗林。这些数字与当时的英、法、普等国的军事预算根本无法相比的。由于奥地利军事行政上的腐败，效能很差，有限的军费还不能得到有效的使用。

其次，由于奥皇统治的是一个种族混杂的帝国，因而使军队的种族成份极为复杂多样，严重缺乏凝聚力和统一性。1865年，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控制权的决定性冲突前的这一年，奥地利军队的花名册上，兵力达到492686人。这里面有128286名德国人，96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鲁提尼人，33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27600名克罗地亚人，还有5100名其他民族的人。这支五花八门的多民族军队，虽然在数量上显得很庞大，但军心却十分涣散，战斗力很差。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初以来民族自决思想和运动的影响下，军队的集中统一更是受到严重威胁。帝国政府不得不谨慎地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使用军队，比如让匈牙利人的军队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而奥地利和意大利人的军队驻扎在匈牙利，轻骑兵半数驻扎在国外等等。尽管这样，它同整齐划一的法国或普鲁士军队相比，仍然存在着种种难以消除的弊端。所以，从总体上看，19世纪奥地利的军事实力是十分虚弱的。这一点在1859年法奥战争和1866年普奥战争中，都得到了证明。

（3）德意志：走向统一的军事强权

德意志在18世纪以前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几百个小王国、公国和侯国形成相互独立的小邦。拿破仑战争之后，根据维也纳会议决议，德意志建立了38个邦，由这些邦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叫做德意志邦联。组成这个联盟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德意志的内外和平，但它并不意味着德意志的统一。事实上，德意志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各邦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仍然各自为政。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风暴，是德意志统一的又一次预演，但在法兰克福全德国民会议上，普、奥两国议员围绕建立“大德意志”和“小德意志”的问题互相扯皮，争执不休，以至在封建反动势力重新聚集力量之后，再一次将统一的希望化为泡影。所以从1815年到19世纪中期，处在分裂状态下的德意志无论是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都“似乎是一个侏儒”。只是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家逐步实现统一的进程中，德意志的军事力量才有了长足发展。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军事革命”，对德意志的军事繁荣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1860年，普鲁士政府为了适应对内镇压日益勃兴的革命

运动，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把德意志建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君王制国家，便向议会提出一个旨在加强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军队改革方案，即将常备军服役期限从2年延长到3年，常备军人数扩充到20万，军费追加为950万台勒。但这个方案引起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自由派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军事改革会进一步增强普鲁士王朝和容克贵族的专制统治，丧失自身的地位。因此，自由派议员便利用当时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力，否决了这个改革方案。普鲁士政府为此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在新议会中资产阶级“进步党”仍赢得了多数，军事改革法案再次被否决。

在改革面临夭折的时候，普鲁士两个“铁腕人物”——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出现，使事情出现了转机。1861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他的弟弟威廉一世继承了王位。这位曾参加过1814年阿尔克斯会战的国王一上台，就向议会展开了斗争。他在第一次发表训词中说：“在将来，普鲁士的陆军也就要变成了普鲁士的武装民族。”为此，他立即开始改组普鲁士陆军，其目标是建立一支38万人的常备军，13万人的支援性预备军和16万人的国民兵。同时，他任命罗恩为军政部长，毛奇为参谋长，1862年又任命俾斯麦为首相。

俾斯麦是勃兰登堡的容克贵族，受过大学教育，是在1848年革命中突起的最著名的保守分子。他就任首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支持威廉国王改组普鲁士军队。俾斯麦认为，一支庞大的、训练良好的军队，可以成为专制政体有力的支持，也可以成为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意志的有效工具。俾斯麦对议会的自由派拒绝投票支持军事改革非常愤怒，他训斥议员们说：“德意志看得起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强权。……当前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演说和过半数的投票——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犯下的大错——而是靠铁和血。”这位“铁腕首相”，不顾议员的反对，以强硬手段实施威廉国王的军队改组计划，动手进行征税和增兵。当议员们对他的做法实行抗议时，他便以武力封闭了自由派的报馆，并逮捕拘禁了自由派人士。在俾斯麦高压政策的威力下，普鲁士军事改革得到了顺利实施。军事改革使普鲁士的军事实力大为增强，通过推行普遍兵役制，士兵在正规军服满3年义务役后，再服4年预备役，尔后转入后备军。执行这种全面动员的兵役制度后，普鲁士军队的数量相对于人口而言，比任何其他大国都多得多。到普法战争前夕，普鲁士（包括北德意志联邦和南部诸邦）可动员的兵力达100万以上，其中作战部队69万余人。

当然，普鲁士军队的强大还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通过改革建立起来的高效能的指挥管理系统，对普鲁士军队来说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普鲁士总参谋部还默默无闻，当威廉一世在军队改组中任命毛奇为总参谋长之后，这位天才的领导很快使参谋部变成了“军队的智囊”。它在军事指挥方面，认真吸收了军事学院最卓越的成就，给参谋们传授制订防范可能出现的未来战争的计划和战备措施；强调在战争到来之前，参谋部必须拟制好作战计划，并不断修改完善使之更符合战争实际；即使是平时的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参谋部也要参照有强国参与的历史性战役战例，对实施方案加以仔细研究；参谋部还不厌其烦地向军官团和大部队反复强调在实战中既要能独立地发挥机动作用，又要能根据指挥系统的要求随时进行集结

和决战，对于与作战部队相关的军需、工程及其它部门，也要能在参谋部的协调下统一行动。由实行参谋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军队的灵便的指挥中枢，是当时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所没有的。

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强大，在它用“铁与血”的战争机器来实现统一，建立德意志帝国过程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体现。1864年，普鲁士在俾斯麦机警的领导下参与了联合奥地利反对丹麦的战争。普军在炮兵数量极少的情况下第一次使用了最为先进的膛线装填击针枪，这种射速比老式枪高出2倍的火器，在战争中充分施展了它的火力优势，结果普奥联军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便用武力从丹麦夺取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此后，在俾斯麦策划的奥普两国争夺丹麦两个公国的“七周战争”中，毛奇又以他坚决果断的指挥，充分利用铁路实施战略集中和机动，广泛使用装弹方便、发射速度快的线膛后装炮，成功地运用“闪击战”，使普军轻而易举地战胜奥地利，从而扫除了在德意志统一道路上一个关键性障碍。由俾斯麦导演的1870年为惩罚法国企图阻止德意志统一的普法战争，也许更能证明普鲁士在军事上的实力。在这场战争中，普军总参谋部灵活的指挥，周密大胆的作战计划，充分的兵力动员，迅速快捷的战场集结，简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势如破竹的普军很快使法军全面崩溃，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成了阶下囚，德意志的统一大业便在“铁和血”的洗礼中宣告完成。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军事强权的诞生。一位西方历史学家指出：“很显然，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其军事制度的胜利。迈克尔·霍华德敏锐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在德意志的纵队和总参谋部的管理井井有条的背后是一个在装备适应现代战争的条件等方面都比欧洲其他国家占优势的政权。1870年时，德意志诸邦的总人口已超过法国，而仅仅是德意志的分裂掩盖了这一事实。德国的铁路线里程超过其他国家，而且这些铁路线十分适合军用。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钢铁产量正赶上法国。德国的煤产量比法国多50%。德国的产业革命造就了越来越多的像克虏伯钢铁和军械联合企业那样的大公司，这些公司增强了普鲁士—德意志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军队的短期股役制度使国内外的自由派不安——而且当时人们都普遍批评‘普鲁士军国主义’，但是这项制度能有效地将国家的人力动员起来用于军事目的比自由放任的西方国家或落后的农业为主要成份的东方国家都做得好。”

2. 列强的军事斗争

尽管拿破仑垮台之后欧洲的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希望得到和平，维也纳会议后俄、英、奥、普缔结的“四国同盟”也在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定期商讨维持欧洲和平的条款，但这些都只不过是“善良人”的愿望和“骗子”的诺言而已。事实上，只要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从1815年到1870年的几十年中，欧洲列强之间围绕着民族和领土问题展开的军事斗争，自始至终也没有停止过。其中最主要的是列强争夺土耳其、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一系列战争。虽然这些战争最终都表现为有限的地区性局部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236页。

战争，但它对于欧洲军事格局的变化和对世界军事历史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而重大的。

（1）俄、英、法争夺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

克里木战争是 19 世纪中叶（1853—1856 年），沙皇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为争夺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巴尔干半岛及近东各国势力范围而展开的军事冲突。由于这次战争的主战场在克里木半岛，故称克里木战争。又由于欧洲把这一地区称作“东方”或“近东”，所以也称东方战争。这场战争是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 19 世纪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战争。

从根源上看，克里木战争纯粹是欧洲列强的一次争霸行径，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沙皇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以后，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它以“欧洲宪兵”的身份到处侵略扩张，推行南下政策，并把主要目标放在中近东地区，决定利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夺取黑海海峡，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势力。但英国和法国同样也想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加强对中近东的控制。因此，俄国同英、法的关系日趋紧张，受英、法怂恿的土耳其政府对沙俄的威胁也不甘示弱，企图借助它们的力量同俄国争夺克里木半岛和南高加索地区。

双方爆发战争的导火一是 1852 年在“巴勒斯坦圣地”的归属权问题上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发生的争执。“巴勒斯坦圣地”位于奥斯曼帝国内，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互相争夺“圣地”的管理权。法皇拿破仑三世利用这个事件以天主教徒保护人的身份，要求土耳其苏丹尊重天主教徒的权利。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利用这个事件，以东正教徒保护人的身份，要求土耳其苏丹尊重东正教徒的权利。土耳其苏丹指望得到英法的支持，把“圣地”的管理权交给天主教会。随即它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外交战。法国舰队开进爱琴海示威，俄国陆军则陈兵土耳其边境。1853 年初，尼古拉一世再次企图拉拢英国共同瓜分土耳其，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孤立法国。但这一建议不仅未奏效，反而促使英、法更加接近，土耳其更加强硬。1853 年 1 月，尼古拉一世派出高级使团，责令土耳其政府恢复东正教徒的权利，而且要以特别协定的形式作出庄严保证。土政府迫于形势，部分地满足了俄国的要求，但拒绝签订协定。7 月初，尼古拉一世派戈尔恰科夫率领 17 万俄军，再次侵占多瑙河两公国，事态发展到俄土断交。

欧洲列强的全权代表聚集到维也纳，商讨解决“东方危机”的办法。土耳其在英、法支持下态度强硬，10 月 9 日限令俄军在 18 天内撤出多瑙河两公国，遭到俄方断然拒绝。10 月 5 日，土耳其对俄宣战。5 天后，沙俄也发表了对土耳其开战的声明。这样，克里木战争就爆发了。

战争初期，土俄两军同时也在多瑙河、高加索和黑海地区展开激战。在多瑙河战场上，越过普鲁特河的 8 万俄军与 14 万土军对阵。10 月 23 日，溯多瑙河而上的一支俄军小舰队与土军在伊萨克恰要塞发生了第一次炮战。11 月 4 日，奥美尔帕沙统率的 3000 多名土军同戈尔恰科夫指挥的 8000 多名俄军又在奥尔泰尼察进行了一次会战，结果俄军在伤亡 800 多人后退却。1854 年 1 月 6 至 10 日，土、俄两军在切塔特又展开了一次会战，俄军以阵亡 1000 人、伤 4000 人而告失败。在高加索战场上，阿布迪帕沙指挥的土军，于 1853 年 10 月 27 日夜发动对圣尼古拉的进攻，企图打通与高加索山区抗俄人民的联系。11 月间发生 3 次战斗，土军受挫。12 月 1 日，1.3 万俄军在别布托

夫指挥下，在巴什—卡德克—拉尔地区，打败 3.7 万人的土军主力。此后几个月内，双方都无力发动新的攻势。在黑海沿岸战场上，土、俄两军的战斗更加激烈，其中最大的一次会战是锡诺普海战。锡诺普是位于土耳其北海岸中部的一个海军要塞。1853 年 11 月初，土耳其和埃及的主力舰队开进黑海，准备与俄国舰队作战，可是，一连呆了十几天，连俄国舰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土耳其舰队司令认为俄国舰队不敢出来应战，于是就命令主力舰队撤回博斯普鲁斯海峡，留下的另外一支分舰队由奥斯曼帕沙率领，准备向黑海东岸高加索战场的巴统地区开去。这支舰队没走多远，就与俄军 3 艘战列舰相遇。这 3 艘战列舰是由纳希莫夫率领的海上侦察舰，此时并没有能力同土军舰队作战。但奥斯曼帕沙以为俄军主力舰就在附近，慌忙命令分舰队退回了锡诺普湾，并把 7 艘巡航舰和 3 艘轻巡航舰排成一列，紧贴着弧形的锡诺普海岸，抛锚停泊在 3 座海岸炮台之间的水面上。另外 2 艘汽轮巡航舰和 4 艘运输船，则分别插在这 10 艘巡航舰之间，以取得舰炮和海岸炮火的双重保护。11 月 23 日，纳希莫夫得到了从塞瓦斯托波尔开来的 5 艘军舰（其中 2 艘巡洋舰，3 艘战列舰）的增援，便决定向锡诺普发动攻击。11 月 30 日早晨，纳希莫夫指挥舰船乘着大雾驶向锡诺普湾，计划以两路纵队迅速冲入锡诺普湾，在停泊场按预定的舰位抛锚，然后进行近距离炮击，一举消灭土军舰队。为麻痹对方，他命令各舰都升起英国国旗。这天，土军舰队仍像以往一样，贴岸抛锚停泊着。将近中午，值班军官发现一支舰队正从锡诺普湾驶来，便将情况报告奥斯曼帕沙。这位指挥官通过望远镜看到舰船上飘着英国国旗，以为是援军，急忙命令信号兵联系。可驶来的舰队没有理睬，加速顺风冲入锡诺普湾，在大炮射程内迅速转头，组成一个与土军舰队平行的月牙阵。当奥斯曼帕沙弄清面临之敌后，连撤退也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命令舰队首先开炮。但刚开始发射，就遭到俄军舰队反击。俄军战舰拥有 720 门大口径炮的压倒优势，又占有顺风和突袭的有利条件。在俄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仅半个多小时，土军舰队就有好几艘舰船起火和受伤。这时，土军海岸炮兵急忙开火援助舰队。但俄军舰队一面射击，一面贴近岸边，进入炮台的射击死角。加上舰船爆炸的硝烟挡住了海岸炮兵视野，土军岸炮的威力难以发挥。俄军猛烈的炮火一直持续到下午 5 点，被封锁在港湾内的土军舰队受到沉重打击后，一片混乱，奥斯曼帕沙也身负重伤被俄军俘虏。不到四个小时，锡诺普海战就结束了。在这次会战中，土军舰队损失军舰 15 艘，死伤 3000 余人，另有 200 人被俘，其中包括海军元帅奥斯曼帕沙和 3 名舰长。俄军舰队战死的只有 37 人，伤 235 人，战舰虽有多艘受伤，但总算挣扎着都回到了塞瓦斯托波尔。

土耳其在锡诺普海战失败后，英、法两国极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俄国海军将完全掌握黑海制海权，而土耳其陆军失去海上交通补给将无力继续战斗。1854 年 3 月，英、法政府命令舰队立即开进黑海，直接对俄宣战。稍后，撒丁亦加入联军。4 月 10 日，英法联合舰队在黑海北岸炮轰敖德萨，同年夏天占领了奥兰岛，并开始对北海的索洛维茨克寺、堪察加的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进行炮击。与此同时，英法两国舰队还派出舰艇在黑海侦察俄国的海岸，准备伺机登陆，在克里木半岛同俄军决战。实现这一战略计划的关键是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因为塞瓦斯托波尔是俄海军重要基地，是俄国在黑海的屏障。

9 月 2 日，英法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北部的耶夫帕托里亚附近登陆，准备从北面攻取塞瓦斯托波尔。俄军既没有在沿海地带建立防御工事，也没有

在耶夫帕托里亚派兵驻防。这样，英、法、土联军共 6.2 万人，携带 134 门火炮，由 89 艘战舰和 300 艘运输船载运，未遇任何抵抗便一举登陆成功，继而沿黑海海岸向塞瓦斯托波尔挺进。9 月 8 日，联军在阿尔马河畔受到阻击，便立即组织反攻。在炮火掩护下，联军以正面兵力牵制俄军，同时对俄军左翼实施突击并一举成功，从而打通了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的陆路。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位于克里木半岛西南沿海的凸出部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联军在向塞瓦斯托波尔进军时，错误地采取了放弃从要塞北面正面进攻，而从侧翼迂回由南面突击的战略，这就使俄军有了加强守备的充分时间。为抗击联军，俄军日夜赶修工事，同时还部分超龄舰艇沉没，以封锁要塞北部港湾。9 月中旬，联军到达要塞南面，发现围攻计划难以实施，只好决定暂停进攻，在此修筑工事，集结火力。

10 月 17 日晨，联军发起首次炮击要塞。舰炮第一天发射约 5 万发炮弹，地面火炮发射约 9,000 发炮弹。俄军伤亡 1,250 人，防线总指挥科尔尼洛夫亦被击毙，其职由纳希莫夫继任。联军伤亡 863 人。炮火准备持续至 10 月 25 日，但预定的强攻始终未能进行。

联军一面向要塞步步进逼，一面等待援军到达，预定于 11 月 18 日发起总攻。但俄军总司令缅希科夫决定在联军增援部队赶到之前，从塞瓦斯托波尔以东的因克尔曼高地方向发动一次进攻，借以打破联军的总攻计划。11 月 5 日，俄军发起进攻，主攻指向英国阵地。但由于俄军两支主攻部队丧失协同，并使英军及时警觉，以猎兵枪和炮火打击俄军，迫使俄军后撤。俄军进攻严重受挫，损失 1 万余人，包括 5 名将军；联军损失 5 千余人。

因克尔曼会战后，双方处于相持状态。这时已到严冬，联军既无冬衣，又缺少帐篷，霍乱等疾病流行。1855 年 1 月，1.5 万名撒丁军被派赴克里木战场，从事修筑工事和后勤等工作。在此期间，双方主要是加修工事，争夺前沿阵地。彼此在对方工事底下挖洞，施放炸药，破坏对方工事。

1855 年 4 月 9 日，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开始第二次炮击，持续达 10 昼夜。俄军在南部要塞有 1000 门火炮，其中 466 门可打击联军攻城炮兵阵地，但由于炮弹不足，因而火炮发射次数只有联军一半。在 10 昼夜中，俄军损失约 6000 人。联军损失不大，但预定的强攻再次被迫推迟。6 月 6 至 10 日，联军第三次猛烈炮击塞瓦斯托波尔，持续 5 昼夜。联军企图夺取要塞以东之马拉霍夫岗，占领了左翼前沿之西堡。6 月 17 日，联军第四次炮击塞瓦斯托波尔，持续两昼夜，重点打击船舶区。18 日，联军向该方向发起强攻，再次企图占领马拉霍夫岗。守军顽强抵抗，打退了进攻，但损失达 7000 人。7 月 10 日，纳希莫夫在马拉霍夫重伤毙命。

俄军接连失利，使俄皇尼古拉一世对俄军总司令缅希科夫甚为不满，便借口缅希科夫“有病”免去其职务，改由多瑙河战场败将戈尔恰科夫继任。8 月 16 日，戈尔恰科夫获得增援后，决定在黑海会战，进攻法军阵地。拂晓前，俄军在浓雾掩护下出动。法军在炮声惊醒后迅速进入阵地迎战。当俄军接近时，法军已有了充分准备。亲临前线的戈尔恰科夫束手无策，进退两难。后来勉强发起攻击，但由于部队互不协同，进攻受挫，里德将军阵亡，部队陷入混乱。戈尔恰科夫被迫下令撤回黑海彼岸。此后，守卫塞瓦斯托波尔俄军再也得不到增援，防御设施破坏严重亦无力修复。联军则加紧了新的攻势。

8 月 17 日，联军开始第五次炮击，动用 800 门炮，持续 3 天。9 月 5 日，联军发动第六次也是最猛烈的一次炮击，动用了 807 门炮，火炮密度达到 1

公里正面 150 门，炮击持续 3 天。俄军两个炮台和马拉霍夫岗的防御设施被摧毁，南部要塞几乎成为一片废墟。9 月 8 日中午，联军发起强攻，重点指向马拉霍夫岗，经激战后夺取了这个重要的制高点，控制了南部要塞。俄军被迫向北堡转移。9 月 11 日，联军开进要塞。

长达 11 个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以俄军的失败而告结束。此战联军伤亡约 7.3 万人，俄军伤亡高达 12.8 万人。

塞瓦斯托波尔之战结束后，克里木地区再无大的战事。在高加索战场上，俄军于 1855 年春以 4 万兵力对土军守卫的卡尔斯城进行围困，并于 11 月 28 日攻占该城。俄军取得的这些局部胜利，未能挽回其整个败局。1856 年 3 月，战争双方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规定：交战双方交还各自占领的地区；俄国和土耳其均不得在黑海保留舰队和海军基地；俄国拆除黑海沿岸要塞，放弃对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的“保护权”，承认多瑙河通航自由，退出比萨拉比亚南部。

（2）奥、撒（丁）、法在意大利的争夺战争

维也纳会议以后，意大利被肢解为 8 个封建专制的小国。奥地利的铁蹄首先踏入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仅直接侵占了经济比较发达的伦巴第和威尼斯，而且还依靠军队和刺刀间接统治着其它几个公国和王国。后来，法国也在意大利北部谋求自己的利益，并企图兼并萨伏依和尼斯。在意大利境内诸国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且唯一没有被外国势力控制的撒丁（皮埃蒙特）王国也雄心勃勃，竭力致力于建立以萨伏依王朝统治的意大利王国。在这种形势下，撒丁和法国为着完全不同的自身利益，同奥地利展开了军事上的斗争。这场斗争从 1848 年起，一直到 1866 年意大利统一，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

1848 年—1849 年的战争：这次战争主要在奥地利和撒丁（皮埃蒙特）王国之间进行。1848 年 3 月 17 日，伦巴第——威尼斯爆发了反奥起义，并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3 月 18 日，伦巴第首都米兰也爆发起义。起义期间建立起来的国民自卫军，经过几次顽强战斗，把奥军逐出了威尼斯和米兰。与此同时，帕尔马公国和摩地那公国等地也爆发了起义。在整个意大利，要求对奥宣战，驱逐奥地利统治的浪潮不断高涨。在这种背景下，撒丁王国国王查理·阿尔伯特一方面迫于人民革命的压力，另一方也想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于 1848 年 3 月 23 日正式对奥宣战。其他王国和公国也相继声明支持撒丁王国，并建立志愿军队参与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交战，奥军节节败退到伦巴第东部的维罗纳境内。阿尔伯特占领了伦巴第、威尼斯、帕尔马、摩德拉，并将其归属撒丁王国。由于撒丁王国的军队缺乏训练，素质较差，加之武器装备落后，缺少骑兵和炮兵部队，其战斗力低下的弱点在战争中逐渐暴露出来，更主要的是阿尔伯特国王及其军队将领，对人民革命的高昂情绪心怀恐惧。所以在进入夏季的战斗中，奥军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奥军首先从威尼斯省向阿尔贝特的军队发动进攻，并很快推进到伦巴第。7 月 25 日，在库斯托扎附近进行了一次大会战。拉德茨基元帅指挥的 5.2 万名奥军与 4.4 万名撒丁军交战。奥军采取侧翼突击战术，将撒丁军分割成许多小块。被肢解的撒丁部队相互失去联系，首尾不能相顾，在一片混乱中溃不成军，纷纷四处逃窜。经过两天战斗，撒丁军损失共 9000 余人。阿尔伯特被迫放弃米兰，并于 8 月 9 日与奥军签订停战协定，承认意大利北部仍由奥地利占领。

阿尔贝特的投降行径，引起了意大利各国的群情激愤。8月11日，威尼斯人民发动起义反对阿尔贝特，宣布威尼斯脱离撒丁王国，重新恢复共和国。在意大利人民的压力下，阿尔贝特于1849年3月12日声明废止同奥地利签订的停战协定，重新对奥宣战。他任命波兰将领克尔萨诺夫斯基为统帅，率领8.8万人的撒丁军队同奥军展开战争。3月21日，奥军在拉德茨基指挥下向撒丁军守卫的莫尔塔拉进攻。由于撒丁军队没有采取措施加强莫尔塔拉城防，只有少数兵力守城，在奥军突袭击下，撒丁军大乱，败退出城，死伤共500人，被俘2000人，奥军只损失300人。3月23日，撒丁军和奥军又在诺瓦拉进行了一次大会战。撒丁军共4.7万人，由克尔萨诺夫斯基指挥；奥军共3个军团，4.5万人，由拉德茨基指挥。结果撒丁军被击溃，死伤不计其数。当天撒丁国王阿里·阿尔贝特被迫退位，其子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继位。3月26日签订停战协定，承认伦巴第和威尼斯仍属奥地利；8月6日，又在米兰签订和约，规定撒丁王国向奥地利赔款6500万法郎。此战以撒丁王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1859年的战争：这是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对奥地利的一场战争。1848年—1849年的战争失败后，新出任撒丁王国首相的加富尔为驱逐奥地利，尽快建立统一的意大利王国，于1858年与法皇拿破仑三世达成军事同盟协议，约定法国出兵帮助撒丁王国把奥地利逐出伦巴第和威尼斯，使两地并入撒丁王国；撒丁王国则将萨伏依和尼斯割给法国作为报酬。1859年4月，奥地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撒丁王国解除武装，遭到撒丁王国的拒绝。于是，17万奥军在居莱元帅率领下集结于皮亚琴察和米兰之间，将拿破仑三世统率的撒丁和法国军队分隔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已经集结在瓦伦察附近的5.6万名撒丁军队，另一部分是正从都灵和热那亚出发的11.6万名法国军队。本来奥军完全有可能将两部分敌军各个击破，但由于居莱优柔寡断，使撒、法军队得以在5月中旬汇合于亚历山德里亚和卡萨列蒙菲拉托地域。直到6月初，双方除进行过数次小战斗外，仍尚未进行过大的决战。6月4日，麦克马洪将军率法军第2军团495万人同居莱率领的奥地利主力集团5.3万人，在马真塔进行了一次会战，结果奥军被打败。但法军没有乘胜追击，所以奥军在损失6000人之后，撤退到明乔河一线设防固守。居莱被撤职，奥皇弗兰茨·约瑟夫接任奥军统帅。6月24日，约瑟夫率领12万名奥军、火炮451门，在温普芬和舍利克两位将军的实际指挥下，与埃马努埃尔率领、麦克马洪和尼埃尔指挥的11.8万名法、撒（丁）联军（火炮320门）在索尔费里诺村进行决战，结果奥军再度败北，损失为2.2万人，联军损失1.8万人。此役使奥地利的失败已成定局。但拿破仑三世慑于民族解放运动和害怕普鲁士干预，突然中止了军事行动，并于7月11日单独与奥地利签订了维拉弗兰克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奥地利放弃伦巴第，由法国转交撒丁王国。1860年，法国又与撒丁王国签订了都灵条约，条约使法国获得了原属撒丁王国的萨伏依和尼斯。此次战争由于拿破仑三世推行利己政策，使原定的战争决心未能完全实现，奥地利虽被削弱，但仍霸占着威尼斯的一部分领土。

1866年的战争：这是意大利王国（撒丁王国领导的）彻底驱除奥地利残余势力的最后一场战争，它和普奥战争交织在一起。1859年战争和西面里革命以后，意大利除了罗马仍为教皇管辖和威尼斯仍归奥地利统治外，基本上实现了统一。1861年3月，第一届议会在都灵召开，宣布建立意大利王国，撒丁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尔为意大利国王。为了扫除奥地利残余，意大利

王国政府决定与普鲁士结盟。1866年4月,埃马努埃尔与普鲁士签订和约,结成了反奥联盟。普鲁士向意大利提供了1.2亿马克的援助,并答应帮助解决威尼斯归并意大利王国的问题。6月17日爆发的普奥战争,意大利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6月20日,名义上由国王埃马努埃尔统率、实际上归参谋长拉马尔莫拉将军指挥的意军主力部队10.2万人,在明乔河一线展开。6月23日转入进攻,在曼图亚留下了有3万人的强大预备队。与此同时,恰利季尼将军的一个军9万人,从博洛尼亚和费拉拉地域向前开进,准备对奥军的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为了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奥地利不得不在意大利境内组建一支约7.8万人的南线军队,由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指挥。6月24日,阿尔布雷希特的部队在库斯托扎附近与拉马尔莫拉率领的8万人进行会战。拉马尔莫拉渡过明乔河,迎战正向维罗纳东南靠近的奥军。意军前进中要经过一个多山地区,队伍断断续续,不成整体。当走出山区进入库斯托扎平原时,被奥军各个击破,被迫撤离。奥军大胜,伤亡4650人,而拉马尔莫拉则损失8147人,意军余部撤退到克雷莫纳。恰利季尼将军得知主力在库斯托扎附近战败后,也立即回师后撤。然而,奥军未能发展这一显著战果。其原因是奥地利同普鲁士作战失利。尤其是7月3日萨多瓦战役惨败,使奥军不得不火速调兵保卫维也纳。这给意军造成了良好的战机,使意军得以在威尼斯和蒂罗尔转入进攻。在此期间,加波里的志愿兵部队作战也非常出色,迭获胜利,解放了蒂罗尔南部全境。但埃马努埃尔却命令他们撤退,于是蒂罗尔又再度为奥军所占。7月26日,威尼斯实际上已全部为意军所占领。7月20日,意大利海军上将佩尔萨诺率领的舰队在“利萨海战”中被特格托夫海军上将率领的奥地利舰队击败,佩尔萨诺舰队损失舰船3艘、人员1千多。但这并未改变已被普奥战争决定了的这次意奥战争的结局。8月10日此战结束,意奥签订停战协定。10月3日签订维也纳和约,奥地利将威尼斯割让给法国,再由法国归还意大利王国。列强在意大利的争夺,最终以意大利的统一而告一段落。

(3) 普、奥、丹、法在德意志争夺领土和统治权的战争

强权就是战争,这似乎是人类历史上一条亘古未变的铁律。在19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在统一问题上长期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吵,但始终未能形成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局面。可是,当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完成了“军事革命”这个新的军事强权在欧洲大陆出现之后,它就不再容忍为领土和统治权问题坐而论道了,继之而起的则是以“铁血”手段同那些企图维持德意志分裂状况的强权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武力争夺。其中主要的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战争。

第一次是普、奥、丹战争。这次战争是普鲁士、奥地利为夺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而对丹麦进行的战争。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位于丹麦南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基本上是日耳曼人,参加了德意志邦联;石勒苏益格北部以丹麦人为主,南部以日耳曼人为主,没有参加德意志邦联。按传统,这两个地区永不分离。正是由于地理和民族的原因,使这两个地区成了欧洲一些国家注视和争夺的重点。早在1848—1850年,普鲁士就为夺取这两个被丹麦占据的公国发动了对丹麦的战争,结果由于英、法、俄、瑞(典)等列强的干预而遭致失败。1863年11月,丹麦违反1850年和1852年伦敦议定书通过的新宪法,把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王国。

奥普两国要求废除宪法，并于1863年12月派军队2.2万人占领德意志联邦的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大公国。同时，普、奥两国开始准备对丹麦发动战争。1864年1月16日，两国向丹麦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石勒苏益格的地位。丹麦拒绝最后通牒后，普、奥联军6万余人，在普鲁士元帅弗兰格尔指挥下，于2月1日越过石勒苏益格边界。英、法、俄拒绝支持丹麦的领土要求，于是丹麦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境地。2月6日，丹麦军队3.8万人，无力坚守石勒苏益格附近的丹讷沃克阵地，在德梅萨中将指挥下，经弗伦斯堡撤至迪伯尔附近的设防阵地。一部兵力撤向日德兰半岛北部，防守腓特烈西亚要塞。3月初，普、奥联军包围腓特烈西亚，4月18日一举攻占迪伯尔阵地。4月29日，丹麦军队放弃腓特烈西亚，退至阿爾斯和菲英诸岛。丹麦舰队3月17日在吕根岛附近击败普鲁士分舰队，5月9日在黑尔戈兰岛击败奥地利分舰队，但这些胜利都未能决定战争的胜负。4月25日，英、法、俄及交战各国代表在伦敦举行和谈。5月12日签订停战协定，有效期到6月26日止。但和平谈判毫无进展。6月29日，普、奥联军恢复进攻，截至7月中旬占领了整个日德兰半岛。7月16日，再次签订停战协定；10月30日，在维也纳签订和平条约。根据和约规定，丹麦放弃了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领土要求。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精心策划下，普鲁士故意将荷尔斯泰因让给奥地利管辖。石勒苏益格归普鲁士管辖，以便制造预谋中的普奥摩擦。

第二次是普奥战争，也称“七周战争”。这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争夺德意志统治权的一场重要战争。普、奥、丹战争结束后，俾斯麦立即准备对奥作战。他利用在克里木战争中俄国希望得到奥地利的支持而奥未予理睬结下的宿怨，稳住了俄国按兵不动；他向法皇拿破仑三世含糊其辞地暗示，战后将给法国以领土“补偿”，换取了法国的中立；他还利用意大利日益高涨的反奥情绪，与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奥地利。1866年6月8日，俾斯麦借口奥地利管辖的荷尔斯泰因议会单方讨论这一地区未来的问题，破坏了普、奥协议，便派兵侵入荷尔斯泰因。奥地利则在法兰克福的邦联会议上提出制裁普鲁士的动议并获通过。俾斯麦宣称邦联宪法已遭破坏，德意志邦联需要改组，并且提出了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改组草案。这便成了战争的导火线。6月17日，奥对普宣战，战争正式爆发。当时，普鲁士已有充分准备，能投入战争的兵力达63万；而奥地利所拥有的兵力只有30万，且6月20日意大利对奥宣战后，奥地利不得不将其中的8万兵力组成南方军团用于对付意大利。这样，在力量对比上普鲁士拥有明显优势。战争开始后，普军在参谋长毛奇将军的统率下，兵分3路在波希米亚宽250公里的正面发起进攻：王储腓特烈·威廉指挥的第2军团12.7万人，从东北向明兴格雷茨方向前进；腓特烈卡尔亲王的第1军团9.7万人，从北面向赖兴贝格方向挺进；比滕费尔德将军统率的第3军团即易北河军团5万人，从西北向明兴格雷茨方向进攻。6月22日占领德累斯顿后，易北河军团与第1军团合并。随后，普军分两路进攻，其任务是在总决战中歼灭贝内德克的军队，并攻占维也纳。在奥尔米茨附近集结的奥地利北方军团由贝内德克将军率领，向前开进迎击普军。普军由于敌情不明和缺乏统一指挥，通过山隘时行动缓慢。贝内德克本来确有把握各个击破普军，但是其行动比普军还要迟缓，致使普鲁士各军团顺利通过山口。6月27日至30日间，普军在纳霍德和明兴格雷茨附近发起几次交战，迫使奥军退却。7月3日，在萨多瓦克尼格雷茨地域双方进行了整个战争中最大的一次交战。贝内德克再次错过了各个歼灭陆续开到并先

后投入交战的普军的战机。结果，奥军惨败，约 1.8 万人战死，2.4 万人被俘。只是由于普军指挥失策未能及时组织追击，奥军才幸免全军覆没。萨多瓦会战后，奥军不得不收缩兵力来保卫维也纳。它将北方军团残部收集起来，另行编组 1 个多瑙河军团，并将从意大利调回的两个军编入该军团。此时，按毛奇将军的计划，普军完全可以一鼓作气，迅速攻占维也纳，彻底摧毁奥地利的统治中心。但是，狡猾的俾斯麦却不想过份削弱奥地利，而且担心战争拖延过长有引起拿破仑三世武装干涉的危险。因此，他改变了毛奇的战略部署，指挥普军放弃攻击维也纳而转攻匈牙利。奥地利面对丧失匈牙利的危险，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于 7 月 22 日与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8 月 23 日，双方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普鲁士取得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汉诺威、黑森、纳绍、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地，奥退出德意志联邦，旧联邦随之瓦解。1867 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北德意志联邦，其中包括 19 个邦和 3 个自由市。

第三次是普法战争。这是普鲁士和法国两大霸权为削弱对方实力，提高和扩大自己在欧洲列强中的优势地位而进行的一场争夺战争，同时也是普鲁士最终取得德意志统治权的决定性战争。这次战争的前因是在普奥战争前夕，俾斯麦为使法国保持中立曾对拿破仑三世暗示过割让领土，但后来俾斯麦只字不提此事，拿破仑三世因为受骗极为不满。普奥战争之后，双方的关系一天天紧张起来，都在大规模扩军备战，酝酿着一场大厮杀。特别是普鲁士，不仅为战争动员了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而且参谋长毛奇将军早已将作战计划拟制修改完毕。战争是不可避免了。俾斯麦终于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为战争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1870 年 2 月，俾斯麦派人同西班牙临时政府秘谈，提议请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奥波德亲王去西班牙当国王。这种事情当时在欧洲各国历史上本来是常有的，然而俾斯麦却另有企图。他企图通过这一计谋使普、西两国联合起来，从而造成法国腹背受敌的局面。拿破仑三世感到德国和西班牙亲近对自己大为不利，因此向普鲁士提出抗议，并扬言哪个国家的人到西班牙当国王，就同哪个国家开战。其实普王既不知道也不赞成利奥波德接受西班牙王位。7 月 3 日，西班牙“回声报”披露利奥波德出任西班牙王位的消息后，即受到普王的强烈反对，利奥波德本人也正式声明，他不去西班牙当国王。但拿破仑三世对此仍不放心，便命令驻普大使晋见普王，要求普王保证永远不同意利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普王拒绝给予这种保证，并将会见情况电告俾斯麦。俾斯麦在与毛奇和陆军大臣罗恩密谋后，改变原来的电文，使它带有对法国侮辱和挑衅的口气在报上发表。此事立即在法国引起震动。拿破仑三世恼羞成怒，于 7 月 19 日向普鲁士宣战。法军总司令是法皇拿破仑三世，总参谋长为勒布夫。他们企图先发制人，集中兵力迅速越过国界，向法兰克福方向突进，切断南北德意志之联系，迫使南德意志诸邦保持中立，全力击败普鲁士。但实际上法军动员和集结缓慢，到 7 月底才集结于边境 8 个军约 22 万人，8 月初编为两个军团，分别由麦克马洪元帅和巴赞元帅率领。普军总司令是普王威廉一世，总参谋长为毛奇。普鲁士计划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力图将法军主力歼灭于普法边境地区或将其赶至法国北方，继而进攻巴黎。由于普军动员计划周密，采用铁路运输部队，至 7 月底，已于边境集结 3 个军团，约 47 万人，且装备齐全。8 月 2 日，法军在萨尔布吕肯地区首先向普军发动进攻，但并无有力的作战行动。普军于 8 月 4 日转入进攻。法军在边境地区不利的阵地上迎击

普军的进攻，在8月4日至6日的维桑堡会战、沃尔特会战和斯比克伦会战中一再失利。巴赞犹豫不决，时而决心退向沙隆与麦克马洪会合，时而决心在梅斯防御。当最后决定向沙隆撤退时，已丧失时机，普军已逼近。经8月14日的马尔斯拉图尔会战和8月18日的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会战，巴赞军团被普军第1、第2军团合围于梅斯。麦克马洪率军退往沙隆。他原准备诱敌深入，在巴黎城下与普军决战。帝国政府担心继续退却会在国内引起动荡或革命，令其前往解救巴赞。于是麦克马洪于8月22日率军从兰斯出发前往梅斯。此时从柏林传来一则假消息。说除围攻梅斯的部队外，普军决心全部向巴黎挺进。实际上普军第3军团仍在继续追击麦克马洪的部队，它向右实施一次大胆的迂回，协同新编成的第4军团将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连同当时随军的拿破仑三世一起围困于色当。9月1日，普法两军在色当决战，法军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中央塔楼上升起白旗，同时派人向普王递交了投降书。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童雪里村会见俾斯麦，法军正式投降。在色当会战中，法军共死伤1.7万人，被俘10.3万人，其中包括39名将军。色当战役是一次典型的完全的包围战，它是战争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其影响是巨大的。色当战役后，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继续向前推进。这一消息传到巴黎，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迅速增长起来。9月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王朝统治时代。因此，色当战役是普法战争的转折点。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障碍排除了，但俾斯麦却要侵占法国领土，这场战争对于普鲁士已成为赤裸裸的霸权侵略行动。9月19日，普军包围了巴黎，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挂着“国防”招牌的法国临时政府不但不组织抵抗，反而出卖人民武装力量。9月28日，被普军包围的斯特拉斯的法军投降。10月28日，被围在麦茨的巴赞元帅投降。1871年3月，普、法正式签订和约，法国割地赔款，并解除了正规军，至此，普法战争遂告结束。

三、美洲帝国——美国在军事上的崛起

公元 19 世纪前后，当欧洲群雄纷争，以武力谋求霸权和瓜分世界的时候，美国还是一个不太发达的国家。1812 年—1814 年第二次美英战争之后，美国才彻底摆脱了英国的羁绊，赢得了真正的独立，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阶段。到 1860 年，美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比 18 世纪末增长了 10 倍，一跃成为世界第四工业大国。与此同时，美国在军事上的发展也十分引人注目。军队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对外侵略扩张愈演愈烈，内战达到空前规模的程度。这一切向世界表明，一个新的军事帝国正在美洲崛起，并在世界军事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 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在 1812 年战争之前，美国政府奉行不正规、不系统的军事政策，重视民兵的作用而忽视正规军建设。特别是托马斯·杰斐逊，他在就任总统之前的竞选期间，就多次表明反对常备军的立场。他认为常备军不应成为政治工具，甚至有无必要作为别的工具保留下来也值得怀疑。在 18 世纪 90 年代初，因印第安战争需要扩充陆军时，杰斐逊担心地说：“印第安人抢劫的每一件东西，都会被主张建立军队的人当作借口。”他在就职演说中列举了“那些形成昔日明亮星座和引导我们经历革命和改革年代的原则”后说：“……在建立起正规军之前，一支训练有素的民兵，是我们在和平时期和战争初期的最好依靠……”。所以，在杰斐逊执政期间，他的军事计划几乎完全依靠由公民组成的民兵，并想以此来消除民政和军民之间的差别。他说：“唯有把国家武装起来，才能省掉一支常备军。因此，使我们保持武装和训练有素，永远是重要的……”。继杰斐逊之后就任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对正规军建设仍无兴趣，继续推行漫不经心的或漠不关心的政策，甚至采取比杰斐逊更为固执的敌视态度。1812 年，当美国面临一场新的战争时，它的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力比独立战争时期大得多，但它的军事力量和军事管理机器却与 1775 年相差无几。正规陆军大约不到 7000 人，不仅人数少，而且驻地分散，高级军官缺乏才干。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这个“软弱无能的社会”打了一场原始的、几乎无计划的战争。这种打法给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羞辱和失败，包括国会本身被焚毁。

但是，在挫折和混乱的战争之中，仍有几个正规陆军团，由于军官训练有方，加上战争中的运气和美国士兵的勇敢，战斗进行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奇帕瓦和隆迪小道战斗，虽然规模不算很大，但这是战争中唯一在开阔地上进行的作战行动，参加这两次战斗的美军主要是正规部队。他们的善战比起英国老兵来毫不逊色。这不仅为参战部队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也为整个正规军带来了异常的光彩。在战争中戏剧性地暴露出来的美国在军事上的缺陷，以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一部分正规军队训练有素和勇敢精神，强烈地刺击了美国原有的军事政策。因此，在战后一段时间，军队正规化建设思想逐步占了上风，职业化军队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而使偏重民兵的状况得到扭转，民兵开始退居次要地位。

（1）军队正规化建设思想的形成

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后，美国在军事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变，突出的是在军队建设上初步形成了和平发展时期建立一支现代化、职业化正规军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主要代表有约翰·卡尔霍恩、丹尼斯·哈特·马汉和亨利·韦杰·哈勒克等人。

卡尔霍恩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南卡罗来纳州主战派人士，1817—1825年在门罗任总统期间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在卡尔霍恩上任之初，美国国内出现了民族主义热潮，公民为战争中受到的挫折感到羞辱，而为正规军所获得的荣誉感到荣耀。在各种因素的激励下，卡尔霍恩提出了一项以正规军为国防支柱的新军事政策，主张保持一支在战时可以立即扩大的正规军队。他针对1820年国会让他起草一份将正规陆军缩减到6000人的计划，提交了一份《关于削减军队的报告》的文件作为答复。这份文件可以说既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军事文件之一，也是卡尔霍恩军事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份文件中，卡尔霍恩断言，依靠民兵是不切实际的，国家必须依靠正规军队。他建议在平时建立一支具有“弹性”的架子陆军，可以在战时随时扩充而不影响其战斗力。按照卡尔霍恩的计划，陆军的缩编是可能的，但在缩编之后，仍应保留两名少将和4名准将，同时保留完整的参谋部，以便有足够的高级职位把有才能和事业心的人留在部队。在陆军各部队，他主张保持高比例的军官，因为“军官的基本条件高于士兵，更难于培养”。他还要求保持战时的陆军连队编制，建议把炮兵连和步兵连的平时兵力分别减少到64名和37名士兵。这样，陆军总兵力为6316人，接近国会要求的数字，同时可以保证战时不增加军官，单是扩充士兵人数，即可使陆军总兵力增至11558人。卡尔霍恩组建正规军的基本原则是：“在战争爆发时，不应当去寻求或创造什么新的编制形式。陆军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的不同点，只是战时人数比平时多，只要进行扩编，即可将平时编制转化为战时编制。”这样，平时与战时之间的过渡就可以井然有序地进行，并能避免虚弱和危险。虽然卡尔霍恩建立“弹性”架子陆军的建议最终因国会拒绝而未能完全实现，但这一思想后来却成为一项永久性方案，一直流传到20世纪，影响了此后一个世纪的美国军事史。

随着常备军作用的越来越大，军人地位日益上升，许多军人把从事军事看成一种高尚职业。特别是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国军队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军事职业化教育也更加受到重视。在提倡和促进美国军队职业化建设中，马汉和哈勒克的思想最具影响力。

丹尼斯·哈特·马汉于1820年进入西点军校当学员，1824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接着在那里当了两年教官。后来受西尔韦纳斯·塞耶校长的派遣，赴法学习军事工程和筑垒，1830年又回到西点执教，一直工作到1871年去世。马汉在从事军事教学的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把军官职业从行业过渡到专业，并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他编写过许多教材，首创了美国新型军事学说。他的代表作《前哨》于1847年出版。马汉关于职业军人的思想，其核心和基本原则是强调军官作为一种职业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尤其是军事历史知识。马汉强调，“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应该从全部的军事历史中吸取营养。因为，所有的战略原则都来源于军事史”。“只有从军事史中，才能找到全部军事科学的原则，才能找到成功和失败的范例，通过这些范例就可以检验战略原则的价值和正确性。”“一个人如果未能精通过去的历史，那就不能说完全掌握了他的专业。同样，一门专业如果单纯由基本概念构成，仅仅有一些技术语言，而不涉及历史发展知识，那就根本称不上是

专业。唯有历史发展知识才能为人们提供比较和借鉴”。马汉同时也认识到，通过历史研究战争，可能导致军官拘泥于过去和凭书本解决问题。所以，他强调，战略的原则是不变的，而运用这些原则的方法必须变化。他还指出，“凡是精通专业知识的军人，都不会被任何一成不变的制度所束缚。”

亨利·韦杰·哈勒克是马汉的学生，1839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担任炮兵工程师，参加过美墨战争，内战时任陆军总司令。1846年他出版了《军事艺术和军事学基础》一书，这是最早论述军事理论的著作之一。与马汉的《前哨》相比，哈勒克的《基础》对军事学说作了更加系统和连贯的表述。它从美国的角度来考察战争的历史和理论，从而引出了美国的军事政策。哈勒克同卡尔霍恩、马汉一样，都主张国防必须依靠正规化、专业化的常备军。哈勒克认为，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的原则是一门学问，只有通过专业教育才能掌握，不能把现代军官的职责托付给未经训练的公民，这犹如不能让木匠干医生的工作一样。他强调，美国的国防应当托付给一支由职业军官领导的有经验的士兵骨干队伍，这支骨干队伍在战时应能迅速扩充，在战争中“必须由科学来决定胜负”。哈勒克指出：“华盛顿在训练缺乏经验的部队掌握复杂的军事技术时，曾遇到很大困难，他事后热切地告诉人们，平时战备何等重要。所谓战备，并不是要在平时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而是要建立一支数量少而在科学、复杂的军事专业上经过教育和训练的队伍，这支队伍应作为庞大陆军的骨干或骨架，它能够将平时训练所得的技术和能力传授给缺乏经验的新兵”。

以卡尔霍恩、马汉、哈勒克等为代表的关于建立正规化、职业化军队的思想，成为美英战争之后美国军事思想的主流，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美国的军事政策，对加速美国常备军队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海军的壮大与海防的巩固

在1812年的战争中，美国海军的弱小以及管理上的混乱无能，使美国蒙受了許多损失。因此，战后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加强海军建设。1815年初，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在对国会讲话时要求国会维持一种国防体系，这种体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卫通商，要有一系列防御工事来保卫海岸线，还要有一支名副其实的正规陆军和整编过的民兵来守卫边疆，抵御入侵者。卡尔霍恩在就任陆军部长后也力促国会加强海军建设。他说，在美国的战备工作中，“海军……应占第一位，这是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卫方式”。正因为如此，美国海军建设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

自海军部成立以来，一直是由一些职员协助一位文职部长指挥海军行动。在一些专家的倡导下，1815年成立了一个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海军委员会来协助海军部长工作。这个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842年，它解脱了海军部长的许多行政负担，大大改善了海军工厂、医院和后勤供应的管理工作。在这个委员会的影响下，国会对海军建设也更加重视。1816年参议院成立了“海军事务委员会”，1822年众议院也建立了“海军委员会”，使国会有了专门研究海军事务的常设机构。

1819年，美国国会制定了一项和平时期的海军长期建设规划。按照规划，在8年中，国会每年提供100万美元，建造9艘装有74门火炮的战列舰，12艘配备44门火炮的快速舰，3艘海岸防卫蒸汽炮舰。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造舰计划。这个计划虽因经济衰退的影响未能完全付诸实现，但对海军建设

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后，美国像欧洲那样建造超级巨型战舰，到 20 年代初，已拥有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舰。

由于海军的基本任务是保护美国日益扩大的外贸，而对贸易造成威胁的主要是只有小型快速船只的海盗，征服这些海盗用大型舰船无能为力，因此，海军部又依赖国会的定期批准建成了一批小型军舰，并与快速舰或战列舰联合编组为分舰队，分布在各大洋执行巡航任务。到 1843 年，海军已建成了 6 个分舰队。

美国政府把新型军舰看作国家利剑，而把新型堡垒看作盾牌，像重视海军一样重视海岸防御工事建设。1794 年到 1807 年战争恐怖期间，国家开始构筑堡垒体系，但大部分不久便损坏了。1816 年，国会拨款 80 多万美元执行一项新的筑垒计划，麦迪逊指定了一个工程委员会负责海岸防御堡垒的建设。这个委员会由工兵技术专家组成，其中包括拿破仑时代的军事工程专家西蒙·伯纳德。该委员会在 1821 年和 1826 年的报告中，提出了一种防御理论，宣称防御体系的第一道防线是海军，同时必须由海岸防御堡垒、内陆交通网、正规军及组织良好的民兵来配合与支援，这样就能形成一个牢固的海防体系。1821 年的报告提出要建设 50 个防御要点，而到 1850 年又提出建设近 150 个防御要点。由于经济原因和没有战争的威胁，国会对这个计划热情大大减退，致使计划未能如期顺利进行。到 1826 年，在沿海 18 个港口只建了 31 个工事，且质量低劣。到三四十年代，情况出现转机，国会拨款数额也有所增加，修筑工事的步伐才开始加快。到内战前，美国漫长的海岸线均已设防，使旧的防御态势得到了较大改善。

（3）陆军建设的发展与军事教育的提高

战后在两任陆军部长——威兼·克劳福德和约翰·卡尔霍恩等人的正规化思想的影响下，陆军建设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并得到较大发展。

首先是指挥系统有了很大改进。在 1812 年的战争中，美国陆军部由于没有建立支援勤务管理体系，陆军部长如牛负重，在少数职员辅佐下，除要处理繁重公务外，通常还充当总军需官或兵站总监之类的角色，给战争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 响。针对这种情况，1815 年国会批准设立了总参谋部，作为陆军部长手下的一个办事机构，另设有军械部、卫生部、财务部、采购部、领地部等机构。这些机构密切配合了陆军部长对军队的管理，提高了指挥系统的效率。总参谋部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到 20 世纪。在 1812 年作战指挥中暴露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陆军部将陆军划分为战区和部，各由一位指挥官独立指挥，陆军部长负责协调。这样，各指挥官往往难以合作，且对陆军部长的过多干预不满。为克服这一弊端，1821 年，国会将陆军高级指挥官削减到只保留一名少将和两名准将。卡尔霍恩便命令唯一的陆军少将雅各布·布朗前往华盛顿，并任命他为总司令，不失时机地建立起一个集中指挥体系。

战后陆军的实力和编制也得到了加强。1815 年 3 月，国会批准建立了一支拥有 1.2 万人的陆军。除了战时和特别危急的情况，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支陆军。按照 1812 年的法案规定，陆军的编制为 7 个步兵团、4 个炮兵团，撤销了南北两大军区，代之以东方部和西方部。到 1855 年，国会又将陆军编制定为 15 个团，包括 8 个步兵团、4 个炮兵团、2 个骑兵团、1 个骑兵来复枪团。1818 年，炮兵成了独立兵种，包括野战、攻城防御和海岸三种炮兵。

美国从 1812 年的战争中认识到,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是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因此,战后美国对军事教育十分重视。在 1815 年战争结束时,美国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西点军校濒临瓦解的厄运。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扶持了这所军校的复兴。1817 年,詹姆斯·门罗总统亲临西点视察,将极不称职的原校长奥尔登·帕特里奇交付军法审判,任命西尔韦纳斯·塞耶接替校长。塞耶任校长后,加强了对高质量职业军官的培养。他以法国军校教育为楷模,起用马汉等著名军事教授,对学生讲授军事艺术和科学知识,同时,学校还翻译和介绍了诺米尼《战争艺术》等外国军事文献,开展科研工作。除西点军校外,战后美国还相继建立了其他一些军事专业学校。这些军事院校为美国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有力地促进了军队结构的改善和军官队伍素质的提高。在美国陆军军官队伍中,仅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比例,就从 1817 年的 15% 上升到 1860 年的 76%。

2. 帝国的领土扩张与对外侵略

美国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进一步助长了帝国的扩张侵略野心。从杰斐逊当政时起,美国就进入了大规模扩张领土时期。19 世纪初的欧洲战争以及拉丁美洲人民反对西班牙的独立运动,为美国的领土扩张提供了有利形势。1803 年,杰斐逊利用拿破仑在战争中遇到的困难处境,以 1125 万美元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那的大片土地,使美国的面积增长了一倍;1810 年,美国乘西班牙殖民地爆发革命运动之机,强占了西属佛罗里达的西部;1819 年,美国又以武力威胁的手段,以 500 万美元从西班牙人手中强购了东佛罗里达,使美国的版图再度扩大。

为了进一步推行扩张政策,为愈演愈烈的扩张主义行径作辩护,门罗总统于 1823 年发表了《门罗宣言》,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等三项原则,其实质和目的是要在美洲建立霸权。在“门罗主义”思想影响下,美国的侵略扩张进一步加剧,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印第安人的驱杀和对墨西哥的入侵。

(1) 对印第安人的战争

印第安人是居住在北美洲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 15、16 世纪,欧洲殖民者侵入北美洲,就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掠夺、奴役和屠杀。美国独立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为了攫取市场和开辟种植园,加紧开拓疆土。印第安人不仅未获得自由,反而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历届美国总统均实行灭绝印第安人的政策,有步骤地将印第安人向西部驱逐。1824 年,美国设立了由陆军部管辖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专门负责印第安人的搬迁。他们强迫印第安人廉价出卖土地,然后把他们赶到贫瘠狭小的所谓“保留地”。一旦印第安人拒绝搬迁,军队便诉诸武力,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激烈、残酷的战争。

西密诺尔战争是同印第安人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也称三次西密诺尔战争。第一次发生在 1817 年至 1828 年,杰克逊奉陆军部的命令,以报复西密诺尔人袭击佐治亚边境和捕捉逃奴为名,进攻西属佛罗里达。杰克逊捣毁了印第安村庄,攻占了西班牙城镇,废黜了西班牙总督,迫使西班牙割让了佛罗里达。在同西密诺尔人谈判中,美国蛮

横要求对西密诺尔人实行强制迁移，遭到了印第安人的拒绝。第二次西密诺尔战争爆发于 1835 年，美国先后动员了 1 万名正规军和 3 万名民兵参战，在菲尔德·斯科特和扎卡里·泰勒的指挥下进行了四次远征。西密诺尔人和逃亡黑奴约 1000 人，在领袖奥斯西奥拉的领导下，利用沼泽和丛林地带，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英勇战斗，多次打败美国军队。而美军由于部队素质差，纪律松弛，不熟悉沼泽和丛林地形，不善于进行非常规的游击作战，再加上热带水土带来疾病流行，直接影响了战斗力。战争整整进行了 7 年，其间美军更换了 8 任司令。1837 年，泰勒采取卑劣手段，将前去议和的奥斯西奥拉俘获关押，折磨身亡。此后，印第安人的抵抗因受挫减弱。1842 年，美国总统授权威廉·沃思宣布战争结束。美国军队在此次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阵亡者超过 1500 人，耗资达 2000 多万美元。最后虽然强行将 3000 名印第安人迁到了西部“保留地”，但全面迁移的目标始终未能达到，印第安人仍占有佛罗里达的许多地方。1855—1858 年，美军又再次发动军事攻击，镇压西密诺尔人的反抗，这就是规模较小的第三次西密诺尔战争。这次战争仍然未能彻底征服印第安人。以后，美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还是经常不断。

在西北地区，美国同印第安人的战争也非常激烈。其中最著名的是 1833 年的“黑鹰战争”。黑鹰是居住在伊利诺州北部萨克和福克斯部落印第安人的酋长，1831 年，因美国陆军部安排印第安人搬迁并强迫年迈的黑鹰酋长签署保证协定，受到印第安人的抗拒。1832 年，美军便对印第安人实施镇压。368 名印第安人武士及 1000 多名家眷，在黑鹰的领导下，同美军展开了力量悬殊的战斗。黑鹰的军队采用游击战术使美军屡次受挫，损失严重。战争最后以黑鹰兵败被俘而结束，大量的印第安人被美军杀害。美国同印第安人的战争，既反映了印第安人民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也充分暴露了美国扩张主义政策的残暴和虚伪。

（2）侵略墨西哥的战争

美国扩张主义者为了建立美洲霸权，在向西部扩张的同时，又对南方邻国墨西哥大举入侵。1846—1848 年的美墨战争，是美国入侵墨西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这次战争从美国掠夺得克萨斯拉开序幕。得克萨斯是墨西哥的一个省份。早在 1835 年，墨西哥宣布要在得克萨斯根绝奴隶制，美国便策动得克萨斯美籍种植园主叛乱，将墨西哥军队大批驱逐出得克萨斯。墨军在阿拉莫等地反击叛乱者，歼灭美军 187 人。之后，美军以优势兵力击败墨军，另行建立了一个美国人傀儡国家——“孤星国”，并由杰克逊的好友豪斯顿任总统。1845 年，新执政的波尔克总统借口保护“孤星国”而正式吞并了得克萨斯州，并宣布它为美联邦第 28 州。1846 年，美国在强迫墨西哥承认格兰德河为新国界以及出卖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大片土地遭拒绝后，反诬墨西哥入侵。于是，同年 5 月 13 日，美国会通过决议正式对墨西哥宣战。

战争爆发时，墨西哥陆军有 3 万余人，以骑兵为主，几乎没有海军，在数量上优于美军，但部队素质较差，武器装备比较落后。美国当时只有正规军 8600 余人，补充兵力主要靠征集志愿兵，但武器装备比较先进，有舰队配合陆军行动。美国为了迅速实现其侵略目的，早在正式宣战前夕就兵分两路，分别向得克萨斯以南的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进军，同时出动舰队封锁墨西哥沿海，夺取重要港口。美国此战的目的，是“使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

可能还有墨西哥另外几个北部省份并入美国……”。

战争开始后，由泰勒率领的美军主力部队在墨西哥北部与墨军主力交战。1846年5月8日，阿里斯塔率墨军6000人，迎战泰勒指挥的2300人，美军以优势炮火击退墨军。同年9月，防守战略要地蒙特里的墨军，依托城市建筑，顽强抗击泰勒的部队，并予以重创。泰勒在获得兵员补给后，攻占了蒙特里。12月，美军以900人进攻北部重镇奇瓦瓦市。部队长途奔袭1000英里，击溃了占优势的墨军，美军伤亡不到20人，而墨军伤亡800人。到1846年底，墨西哥北部大部分地区已沦入美国之手，但墨西哥并未屈服，仍然进行着顽强抵抗。为了尽快征服墨西哥，美军改变主攻方向。1847年春，美军调集1.3万余人的部队，在陆军司令斯科特的指挥下，向墨西哥中部进犯，企图夺取首都墨西哥城。这时，墨总统桑塔安纳乘美主力南下之机，率军约2.5万人，北上袭击原属泰勒的一支约5000人的留守部队，由于指挥不力，在蒙特里西南布埃纳维斯塔被美军打败。在美军向墨西哥城推进的过程中，墨军利用首都外围有利地形设防，先后在塞罗戈多、丘鲁武斯科、莫利诺—德尔—雷伊以及查普特佩克等地英勇抗击美军的进攻。同年9月13日，美军向墨西哥城发起总攻，墨军英勇顽强，同美军浴血奋战。在激烈巷战的一天中，美军即伤亡860人，墨军损失1800人。14日，美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攻占了墨西哥城。但墨军和墨西哥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游击队，仍然以各种方式顽强抵抗和打击美国侵略军。1848年2月，美墨签订《瓜达尔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条约规定墨西哥正式割让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给美国。这片土地相当于当时墨西哥全部领土的一半以上。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的损失也十分惨重，先后死亡12876人，伤4102人，耗资共9750万美元。美墨战争再一次暴露了美国赤裸裸的侵略扩张政策。就连美国总统、名将格兰特也承认：“这场战争乃是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所曾进行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

3. 美国内战

从拿破仑战争或者说第二次英美战争到1860年美国内战前夕，只不过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但一个庞大的虽大部分还是空洞的帝国，在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的使命后，终于在美洲大地诞生了。当它以蒸气舰船、线膛炮、来复枪把“天定命运”的印第安人、墨西哥人的土地划到了自己的版图以后，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内在冲突的发展，以免使其走向分裂。毫无疑问，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仍免不了战争的形式。所以1861年—1865年的美国内战就注定地发生了。

这是一次无限性的工业化战争，是蒸气时代的第一次大战。战争不仅使美国巩固了统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帝国强大的基础，而且作为工业革命后的一切军事发展的总试验，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书写了全新的篇章。

（1）战前美国社会

任何战争都不是偶然的纯粹的军事对抗，必然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美国内战的社会历史根源，在本质上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

独立战争之后，由于美国北方和南方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完全不同，使南北方内部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出现了巨大差异，双方的对立也日益暴露出来。在北方，“自由劳动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自 50 年代完成工业革命以后，工业生产急剧增长。到 1860 年，北部和中部各州已达到产煤 1400 余万吨，铁 92 万吨，工业总产值 18.8 亿元，占据世界第 4 位。土地开垦的面积也迅速扩大，西北部农场经济的发展，为东北部各州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和市场。在南方，奴隶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工业发展，生产技术十分落后。南部和西南部各州以棉花种植业为主，1857 年的棉花产量共 533 万包，达到内战前顶峰，但到 1860 年，不仅未增长，反而降至 384 万包。奴隶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有的大批逃亡，有的举行武装暴动，纵火烧毁种植园。

南方落后的奴隶制经济不仅阻碍了自身社会的发展，对北方工商业也起到了制约作用。数百万黑奴被南方奴隶主束缚在种植园，北方资产阶级便失去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所以资产阶级以及被压迫的奴隶都强烈要求冲破奴隶制度的桎梏，而奴隶主却拼命维护和挽救处在危机中的奴隶制。1854 年，南方奴隶主为阻止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加入联邦成为自由州，强迫国会授权由两州居民自行决定建立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同时组织武装进入堪萨斯，企图以武力控制投票选举。北部工人农民对此十分愤怒，也携带武器进入堪萨斯，同奴隶主武装发生了流血冲突。1857 年，奴隶主又通过最高法院否决了密苏里州黑奴斯科特请求成为自由人身份的申诉。法院在判决书中宣布奴隶制在全国都是合法的，这激起了人民的愤慨。“废奴运动”在全国声势浩大，不断高涨。1859 年，废奴派激进分子约翰·布朗在南部发动了震惊全美的黑人起义。起义虽然终告失败，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度，唤起了黑奴的觉醒。1860 年，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为总统，使奴隶主占优势的民主党丧失了联邦政权。于是，南部 15 个蓄奴州有 11 个相继退出联邦，于 1861 年 2 月成立了“南部同盟”，推选杰佛逊·戴维斯为“总统”，以蒙哥马利为“首都”（后迁至里士满），造成分裂的事实，同时征集 10 万志愿兵，积极备战。4 月 12 日—15 日，南军首先炮击并占领联邦军守卫地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要塞，挑起了战争。4 月 15 日，林肯下令征集部队，镇压南部叛乱。南北战争便这样打响了。

（2）战争力量的对比分析

内战开始时，北方的战争潜力远超过南部同盟。首先，在兵员资源方面，联邦能动用 2000 万白人，而南方只有 600 万人，还仅仅是静态统计。实际上，战争期间北方征集黑人部队时，南方大批黑奴反而成了北方的战士。另外，战争期间有 80 万移民到达北方，很多是可从军的男性公民。在联邦军中服役的共 200 万人，军队实力最高时达 100 万人；而南部同盟在军队作过战的约 90 万人，军队人数最多时为 46 万余人。其次，在经济实力方面，南部同盟没有能应付长期战争的金融机构，没有可供支配的硬货币，其收入主要来自给北方和欧洲出售棉花，战争使这种贸易大受影响，税收比例不足总收入的 5%。且南方工业投资环境差，借贷外来资金也很困难，债券总共不到政府收入的 33%。为筹集战争费用，财政部长克里斯托弗·梅明格只得求助于印刷厂，印发了超过 15 亿美元的纸币，这个数字相当于战争时收入的 2/3，造成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在北方，联邦政府凭借其优厚财力，主要依靠税收

和借贷为战争筹资。税收约占政府收入的 21%，借贷占 63%。1862 年开始，联邦也发行了 4.5 亿美元纸币，但这仅占政府支出的 1/6，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再次，在交通保障方面，1860 年时，南方仅有占全国 5 万公里铁路中的 1.5 万公里，真正的铁路干线只有从孟菲斯到里士满一条，其余绝大多数都是短途和单线。各铁路公司为了竞争，使用不同的轨距并且互不连结。铁道和桥梁粗制滥造，机车、车辆和钢轨十分匮乏。政府拒绝对铁路实施管理，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1863 年 5 月，议会批准政府对铁路享有广泛的控制权，但直到 1865 年初，政府才最终接管了铁路，那时战争已快结束。与南方相比，北方铁路交通完整得多，不仅拥有足够长的铁路网络，而且具有生产足够车辆和铁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对铁路的干预十分有效。1862 年 1 日，国会授权林肯统管所有铁路，当公共安全需要时，可将其全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2 月，林肯任命丹尼尔·麦卡勒姆为美国军用铁道部主任，5 月即正式接管了全部铁路。北方的水路和公路运输也比南方好得多。联邦政府的海上力量控制了沿海交通，炮舰在西部多数大河中耀武扬威，而南方则连驳船和汽船也少得可怜。

虽然南部同盟在总体上处于劣势，但在许多方面也占有优势。一是战争主要在南方本土进行，军队熟悉地形又易于后勤补给。二是南方战争准备充分。在战前 10 年，南方就有用武力解决南北问题的思想准备，战争开始时，南方已拥有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北方到战争打响后，还有人敦促林肯妥协。三是南方军队素质较高，拥有一批如罗伯特·李、托马斯·杰克逊等杰出指挥官，由于军队常与黑奴发生武装冲突，因而普遍能征善战，且具有好战本性。四是南方尽管工业落后，但军火工业却处于优先发展地位，因此，武器弹药能够保证战争之需。

内战战场包括美国整个东南部广大地区，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流域。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华盛顿—里士满地区和以西的田纳西—密西西比河地区，是东西两个主战场，其战斗频繁而激烈。整个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南部同盟军较为主动，赢得了许多局部的胜利；后一阶段联邦军调整了部署，逐步由被动转为主动，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3）第一阶段的战争

这一阶段从 1861 年 4 月到 1862 年 9 月，战事主要发生在东战场。在战略考虑上，南部同盟总统戴维斯企图通过持久防御拖延时间，一方面等待英法的援助，另一方面消耗北方力量，促使联邦政府同意南北分立。但南军司令罗伯特·李不同意这种兵力分散的消极防御战略。他根据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制定了以攻为守，争取主动的积极防御战略。他把主力集结在波托马克河一线，重点保卫首都里士满，同时伺机与北军决战，歼灭北军主力。北军由于对战争毫无准备，所以在战略上也缺乏周密计划。北军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拟制了一个被称为“大蛇计划”的战略，即通过海上封锁和陆上堵截，对南方实行环形包围，像蛇一样缠住南部同盟，最后将其窒息而死。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缺陷的战略，它使北军兵力分散，极易被南军打开突破口，同时耗费时间，会使战争“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一草率的战略，使北军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1861 年 7 月 21 日，林肯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决定在华盛顿与里士满之间的交通枢纽马纳萨斯地区决战（即第一次布尔河会战，亦称马拉萨斯会战），以打通通向里士满的道路。结果麦克道尔指挥的联邦军被博雷加德和

约翰斯顿指挥的南军打败，北军损失近 3000 人，南军损失近 2000 人，华盛顿为之愕然。以后，联邦军在陆上次要战场虽然取得一些小的胜利，但并没有扭转全面局势，北军主力被长期牵制在首都周围。前线失利加剧联邦后方的动荡，反对派借此活动猖獗。形势迫使联邦政府授权林肯征集 50 万志愿兵，并加强海军建设和军工生产，以为长期战争作准备。

1862 年 2 月 22 日，林肯集合联邦陆、海军发动全面攻势，战斗进行得更加激烈。在西战场上，联邦军连连取得胜利，进展比较顺利。2 月间，格兰特指挥的田纳西军团在联邦炮艇小舰队配合下，先后攻克田纳西河上的亨利堡和坎伯兰河上的多纳尔森堡。比尔指挥的俄亥俄军团也攻克坎伯兰河上的纳什维尔，迫使南军从密西西比河上的哥伦布撤走。3 月，波普又在联邦小舰队支援下，夺取了密西西比河上的十号岛。格兰特则向田纳西河上的匹兹堡码头进军，4 月 6 日在夏洛与约翰斯顿指挥的南军遭遇，经两天激战，双方各损失 1 万余人。5 月底，西部联邦军在哈勒克统一指挥下攻克科林斯，继而攻克密西西比河上重镇孟菲斯。至此，整个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大部分已在联邦军控制之下。同时，密西西比河这条南北中枢水路，除维克斯堡以南一段外，绝大部分已被联邦军打通。同年 4 月，巴特勒指挥的联邦军在法拉格特舰队协同下，攻克南方战略要地新奥尔良，为打通密西西比河南段造成了有利态势。

尽管西线获得了胜利，但在主战场上联邦军仍然屡遭挫折。马拉萨斯会战失败后。北军改由麦克莱伦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麦克莱伦天性谨慎，从未打过胜仗，他连续几个月按兵不动，使南军有了充实力量的机会。1862 年 3 月，麦克莱伦在可能被撤职的外界压力下，制定了一个经由水路把军队运到詹姆斯河与约克河之间的半岛东端，再由半岛西进、攻占里士满的方案，即所谓“半岛战局”。但由于麦克莱伦情报不准，又行动迟缓，多次失去了歼击南军和攻占里士满的机会。6 月 25 日至 7 月 1 日，南军在调整集结大量兵力后，向麦克莱伦发动了反攻。在著名的“七日会战”中，联邦军受到罗伯特·李指挥的费吉尼亚军团的沉重打击，被迫撤出半岛。李乘胜北上，8 月底，在第二次马拉萨斯会战中，打败由波普指挥的联邦军新建立的费吉尼亚军团。李军团渡波托马克河继续北上，华盛顿告急，林肯命麦克莱伦率军迎战。9 月，在安蒂特姆战役中，联邦军击退李军团。麦克莱伦再次按兵不动，不予追击，使李军团顺利撤回南部，从而失去了全歼李军团的良机。

这一仗作为战争第一阶段拉锯战的尾声，虽然胜负十分模糊，但它却带来了两个战略成果：一是战后五年林肯公布了他在 7 月份就起草完毕的《解放宣言》初稿，把为联邦而战改为为自由而战。二是推迟了英国内阁干预战争的企图，北方的解放政策使得谁也不敢贸然承认“南部同盟”的独立地位。这是将战争引向转机的一个重要起点。

（4）第二阶段的战争

这一阶段从 1862 年 9 月至 1865 年 4 月 战争从有限阶段转入总体阶段。

联邦军在第一阶段战争中的失利，给林肯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国内动荡不安，从北端的缅因州到西边的加利福尼亚，许多城市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林肯政府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立即解放黑奴，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发动广大群众，用革命的方式进行战争。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利用战争失利进行煽动和颠覆活动。面对这种局势，林肯曾直言不讳地写道：

“每当我考虑到镇压暴乱的政策，心里就忐忑不安。我一直谨慎从事，尽量不使这个不可避免的冲突演变成一场残酷无情的革命暴力斗争。”但在事实面前，总统感到调和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南北冲突，他不得不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联邦。他说：我“只要手中还有牌，就不会放弃比赛。”

在战争的危急关头，林肯以一位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作出了使联邦转危为安的重大决策。在1862年9月22日第一次公布《解放宣言》初稿的基础上，林肯又选择了1863年1月1日朱比节这一“黄道吉日”，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发表了正式的《解放宣言》。宣言庄严宣告：凡叛乱州的奴隶，“从现在起永远获得自由”；允许“条件合适”的黑人参加北方军队。宣言直指罪恶的奴隶制度，使广大黑人奴隶看到了自由的曙光，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参与革命战争的斗志，这就从根本上击中了南方统治者的要害。

在宣言颁布前后，林肯还采取了一系列与宣言的精神和原则相一致的革命性措施，以扩大武装力量，争取人民支持。1862年5月，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允许耕种西部无主土地五年以上的农民，只付10美元证件费便可获土地160英亩，赢得了为土地奋斗的农民的欢迎。1862—1863年，林肯决定实行武装黑人的政策，激发了黑人为自由和解放献身的强烈愿望。18万余黑人踊跃拿起武器，走向前线，另有25万黑人参加后方部队，为战争服务。1863年3月，林肯颁布《征兵法》，用义务兵役制取代了志愿兵制，使军队兵员有了法律保障。1864年，林肯又通过改组军事领导机构，撤换了麦克莱伦、伯恩赛德、比尔等不称职高级将领，任命了以格兰特为司令的一批新将领，从而加强了军队的指挥系统。同时，还通过镇压反革命、打击投机倒把等严厉措施，消除了联邦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在战争的非常时期，这些措施对转变战争进程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此，内战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当然，联邦军的优势是逐步到来的。在1862年底到1863年上半年，南军仍有较强的实力，连续向联邦军发起攻击。1862年12月13日，南军李军团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阻击向里士满进攻的伯恩赛德联邦军，经过一天激战，联邦军惨败，伤亡1.2万余人，而南军伤亡不足5000人。12月30日，联邦军罗斯克兰斯指挥的4.4万人的坎伯兰军团与布雷格指挥的3.6万人的田纳西军团进行了斯通斯河战役，结果双方各有1/3的人员伤亡。1863年3月初，胡克指挥的联邦军波托马克军团兵力增至13万余人，南军李军团只有6万人。但胡克指挥不力，4—5月钱瑟勒斯维尔一战，损失惨重。6月，李军团8.9万人攻入宾夕法尼亚州，北方再次告急。林肯令波托马克军团迎战。该军团已由米德指挥，共12.2万人。7月初，双方进行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战争”。经过了3天激战，联邦军歼敌2.8万，自己损失2.3万。这是联邦军开战以来取得的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大胜利。这一战以后，南军便一蹶不振，完全失去了进攻力。

与此同时，在西战场上，格兰特指挥联邦军攻克了密西西比河下游重镇维克斯堡，俘敌约2万人。稍后，防守密西西比河下游另一重镇哈得孙港的南军也缴械投降。至此，联邦军打通了整个密西西比河，将南部同盟的西南部与东部切断。11月，在西战场中部，联邦军坎伯兰军团占领南部重要铁路交通枢纽查塔努加，并击溃外围之敌，从而取得了向南方进军战略基地。

1864年春，新任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和西战区总指挥谢尔曼，共同制定了新的战略进攻计划。该计划规定，东西两战区同时对南部同盟实施协调一

致的打击：东战区以波托马克军团为主力，由格兰特亲自指挥，以歼灭李军团为主要目标，相机夺取里士满；谢尔曼则率密西西比河战区主力，由西向东横扫，深入敌后，占领乔治亚州，前出大西洋，对南部同盟的东部地区实施中间突破。4月底，格兰特率领12万人南进，攻击只有6万人的李军团。5月初渡过拉皮丹河，进逼怀尔德尼斯，接着向科尔德港发起攻击。5月8日至13日，双方在斯波特西法尼亚—科特豪斯进行了近代世界上第一次堑壕战。联邦军损失了3.1万人。6月1日至3日“冷港会战”，联邦军向敌发起猛烈攻击，双方伤亡很大，北军折损约5万人，李军损失约3万人。北军兵源充足，几周后便补足了兵员。而南军因人力财力濒于枯竭，补充十分困难。6月中旬，格兰特围攻里士满以南的彼得斯堡，双方相持数月。在此期间，李为了牵制北军，分散格兰特兵力，命厄尔利率1万余人奔袭华盛顿。格兰特遂派谢里登率5万余人对厄尔利实施围追堵截。双方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谢南多厄河谷之战”的搏斗，厄尔利全军覆没。

在东战区格兰特节节胜利，捷报频传的同时，西战区谢尔曼也顺利地展开了军事行动。谢尔曼在查塔努加集结了10万兵力，与约翰斯顿指挥的6万余南军对峙。5月7日，谢尔曼以歼灭约翰斯顿并夺取南部重要工业交通中心城市亚特兰大为目标，向敌军发起了猛烈攻击。这是一场无后方战斗。谢尔曼采取迂回战法，绕过敌人设防的阵地，除个别情况外不进行正面强攻，当面敌军被迫向亚特兰大败退。9月2日谢尔曼占领亚特兰大，下令将该城的一半焚毁，随后，谢尔曼又制定了“向海洋进军”的计划，目标是攻占乔治州沿海要地萨凡纳。他挑选了6万余精兵强将，其中包括大批黑人，携带20天粮秣，于10月15日出发。为迷惑敌人，谢尔曼兵分两路，使敌人弄不清他的主攻方向，防不胜防。11月23日，两路大军在米利奇维尔会合后继续东进。12月21日，在海军配合下夺取萨凡纳。此次远征历时一个多月，长驱300多英里，沿途捣毁了敌人众多战争设施和目标。这是内战史上的一次军事壮举，它为夺取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865年，战争到了最后决战关头。此时南部同盟濒临灭亡的边缘，部队士气低落，逃兵不可胜数，后勤补给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南军仍苟延残喘，破釜沉舟。已升任南军总司令的李和约翰斯顿，企图以灵活防御战略与联邦军对抗。格兰特决定与谢尔曼分进合击，围歼南军。2月1日，谢尔曼挥师北进，直捣南北卡罗来纳，威胁李军后方。3月底，格兰特也直接指挥11.5万联邦军向李军进攻，4月3日占领里士满。4月9日，李率残部2.8万人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26日，约翰斯顿向谢尔曼投降。历时4年的内战以联邦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美国内战虽然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次国内战争，但其规模之大，动员兵力之多，耗资之巨，现代化程度之高，都引起了世界军事史学界的关注。在整个战争期间，南北两军共动员了近400万兵力，战线长达数千公里，战争死亡人数共62万，其中北方36万，南方26万，伤者在百万以上，双方共消耗军费250亿元左右。在战争中，陆军大量采用装甲列车，利用铁路干线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后勤物资保障能力；步兵普遍装备和使用前装式来复枪、射速为每分钟175发子弹的霰弹枪等新式线膛武器，增加了射程，提高了杀伤力；海军以蒸气动力装甲战舰为主编成的舰队，其机动性、防护力和火力都大为改观，从而引起了海战的变革；无线电报系统的广泛使用，大大改善了通讯联络手段，方便了战场军事指挥。这一切，都显示了美国近代

工业革命的发展正在改变着军队的面貌和战争的样式。通过内战，美国的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军事力量也日益强大。随着西部土地的开发完毕以及印第安战争的终结，美国军事战略逐渐从传统的地区性向世界性转变，一个新崛起的军事帝国正在从美洲走向世界，开始了它同世界列强争雄的新阶段。

四、亚非拉国家反殖民主义的军事斗争

从 19 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列强在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之后，为了开拓国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加紧了对殖民地的侵略和掠夺。处在殖民主义铁蹄蹂躏下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纷纷拿起武器，同殖民入侵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在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入侵和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及独立战争风起云涌，数以百计，不仅有力的遏制了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也为人民革命的军事历史写下了最壮丽的篇章。

1. 亚洲反对殖民主义高潮中的战争

亚洲以其灿烂的古代文明享誉世界，也因此招来了西方列强的觊觎和垂涎。从 15 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列强对亚洲的殖民入侵便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进入 19 世纪，亚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先后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随着殖民入侵的加剧，被压迫民族同殖民主义者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到 19 世纪中叶，亚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第一次反殖民主义的革命高潮。这期间发生的反殖民战争有：1825 年至 1830 年的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蒂博尼哥罗战争；1839 年至 1942 年的阿富汗抗击英国殖民主义的战争；1848 年至 1852 年的伊朗反抗俄、英、法等列强及其代理人卡扎尔封建王朝的巴布教徒起义；1851 年至 1864 年的中国反对英法侵略者和清政府的太平天国革命；1857 至 1859 年的印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大起义。此外，还有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朝鲜人民抗击美、法侵略的战争等等。这些反殖民革命战争一个接一个，几乎遍及整个亚洲。它给殖民主义者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人民军事革命的巨大力量。在这一系列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规模较大的有蒂博尼哥罗战争、阿富汗抗英战争和印度民族大起义。

（1）蒂博尼哥罗战争

战前的殖民统治。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由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 3000 多个岛屿组成，有“千岛之国”之称。16 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首先侵入印度尼西亚，建立据点，设置商店，掠夺财物。1598 年，荷兰殖民者侵入印度尼西亚西瓜哇的万丹，并于 1602 年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经荷兰国会批准，获得了东起好望角、西至麦哲伦海峡这一广大地区的贸易独占权和在印尼的通商独占权；同时，还享有征募军队、建筑炮台、发行货币、任命各级官吏、与外国缔结条约等特权。实际上，公司已拥有了国家的职能，是荷兰殖民者侵略东方的工具。荷兰以此为据点，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向印尼全国各地扩张，逐步取得了对印尼的控制权。

18 世纪末叶，荷兰日趋衰落，英、法都力图控制荷兰并争夺其殖民地。1806 年，法国占领了荷兰。拿破仑为阻止英国夺走荷兰的殖民地，遂委派亲法的荷兰人丹德尔斯就任印尼总督，把荷兰在印尼的殖民军从 4000 人扩充至 1 万人，并强迫爪哇人民修筑了众多防御工事和长达 1000 公里的军事公路。1811 年，英军进攻爪哇，占领雅加达，荷兰殖民者投降，印度尼西亚落入英国殖民者手中。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荷兰恢复独立。根据 1814 年英荷条约，

荷兰重新占领了印尼。

荷兰是个商业资产阶级国家，工业不够发达，在工业品贸易上无法与英国竞争，于是荷兰在印尼重新恢复了贸易垄断制度，实行保护关税，同时，扩大咖啡种植，加重土地税额，变本加厉地开征各种新的苛捐杂税，如门户税、人头税、牧畜税、迁居税、土地贸易税等等，不可胜数，甚至怀抱婴儿过关卡也要纳税。像谏义里这样一个小地方，苛捐杂税就有 34 种之多。旧税加新税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单土地税一项即夺去农民收成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加上其他负担，有的农民辛劳一年几乎毫无收获，生活陷入绝境。在荷兰殖民者统治下，印尼封建主的领地日益缩小，收入大减，殖民者又蔑视封建主的权力，在各邦操纵一切，作威作福，早已引起一部分封建主的怨恨。1823 年，殖民当局禁止封建主出租土地给外国种植园主，并勒令废除祖约，更加深了封建上层对殖民者的不满。印尼各阶级同荷兰殖民者之间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 1825 年—1839 年的蒂博尼哥罗战争。

战争进程。1825 年，爪哇人民举行起义，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残暴统治。由于这次起义是由蒂博尼哥罗所领导，故称之为“蒂博尼哥罗战争”。蒂博尼哥罗是印尼日惹王国的王子，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曾任摄政。他仇恨荷兰殖民统治，向往重建强大的伊斯兰教封建王国。1825 年 7 月，荷兰殖民者借口修筑公路，强行穿过蒂博尼哥罗领地上的祖坟，并围攻他的住宅，企图逮捕他。7 月 20 日，蒂博尼哥罗在日惹附近的斯拉朗发动武装起义。他发表文告，号召人民进行“圣战”，消灭爪哇岛上的异教徒——荷兰殖民者。文告传出，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数日内有 6 万农民参加起义，部分封建主包括梭罗著名的大阿訇奇阿依·摩佐也参加了起义，不少华侨也踊跃从军或积极供应武器，起义队伍迅速扩大。起义军向荷兰殖民军大本营日惹进军，所到之处，严惩殖民官吏，烧毁殖民者的住宅、仓库、关卡和种植园。起义浪潮席卷爪哇广大地区。同时，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也燃起了抗荷的烽火，殖民军穷于应付。日惹的荷军兵力单薄，被迫龟缩在日惹、梭罗一线，处境危急。蒂博尼哥罗在起义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后，于 1825 年 10 月，建立伊斯兰教王国，自立为爪哇苏丹。

战争初期殖民军虽然失利，但在力量对比上仍占优势。荷军组织严密，武器精良，许多军官富有作战经验。起义军缺乏枪支大炮，大部分使用刀棒长矛，组织也较松散。但是，起义军的正义行动极大地动员了人民群众。以农民为主的起义军，怀着对殖民者的深仇大恨，为爱国主义精神所鼓舞，作战英勇，深受人民爱戴，得到人民的热烈支持。殖民军中的印尼士兵，受到感召也纷纷弃暗投明。有一次，巴厘王派往爪哇的援荷军 85 人在船上起义，与监送官兵展开搏斗，大多数不是跳海逃走，就是壮烈牺牲。在人民支持下，起义军以弱胜强，取得了辉煌战果。

1827 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蒂博尼哥罗对起义军进行了整顿，把起义部队分成若干固定的队伍，作为率领和推动各地人民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面对装备精良的荷兰殖民军，起义军采取游击战术，机动灵活，避实就虚，流动作战，奇袭敌人。在日惹、梭罗和三宝壟之间的广大地区，起义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灵活转战，迫使殖民军疲于奔命，伤亡惨重。殖民军司令德·科克在晕头转向之中，急于消灭起义军有生力量。他经过几个月精心准备之后，拼凑一支拥有数门大炮和数千兵力的殖民军，向拉斯朗发起进攻，企图抓住蒂博尼哥罗，一举摧毁起义军政权。但当殖民军进入拉斯朗之后，

才发现起义军早已转移，拉斯朗仅是一座空城。以后，德·科克又几次寻找起义军主力决战，但都未能得逞。在起义军的打击下，殖民军连连败北。1828年底，荷兰驻印尼总督卡勃仑被迫下台，遗缺由德·科克代理。

德·科克上台后，加紧了对起义军的围剿。他采用碉堡战术，在起义军控制的地区四周每隔 20 至 30 公里筑一碉堡，又组织了 14 支机动骑兵部队配合各碉堡据点作战，使起义军处于被分割和包围状态，但起义军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仍继续坚持战斗，不断打击敌人。

狡猾的殖民军在武力镇压起义军的同时，还以威胁利诱手段进行分化瓦解起义军的活动。殖民军多次向蒂博尼哥罗提出谈判的建议，均遭到蒂博尼哥罗的严辞拒绝。于是殖民军又将他的儿子俘获，并以杀害来威胁蒂博尼哥罗投降，但蒂博尼哥罗仍不为所动。殖民军在蒂博尼哥罗身上未能打开缺口，又在起义队伍的领导层中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以封官许愿拉拢一些封建主，许诺起义者归附后可以占据“叛变者”的土地。殖民者的诱降分裂活动在少数封建主身上收到了效果。1828 年 11 月，起义军的另一领袖奇阿依·摩佐因与蒂博尼哥罗争夺领导权发生内讧，背叛革命。1829 年，其他一些领导成员，如莽古甫美亲王、青年将军申托特等也相继叛变，起义军力量大为削弱。

1830 年 3 月，蒂博尼哥罗被骗往马吉冷同殖民军进行谈判，因他拒绝投降，荷兰殖民者便背信弃义地将他扣留，押往巴达维亚，终身幽禁于苏拉威西的望加锡。由于封建主的背叛，起义军内部分裂，爪哇起义没有与外地起义统一行动，在荷兰殖民者军事镇压与分化瓦解下，这次起义终于失败。

蒂博尼哥罗战争虽然是由封建主领导的反殖民起义，但起义军的主体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占印尼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因而具有鲜明的人民战争性质。起义队伍歼灭殖民军 1.5 万余名，使殖民者消耗战费 2000 万盾。起义群众惩办了许多殖民官吏，烧毁了无数种植园，给荷兰殖民者以沉重打击，这次起义是 19 世纪上半期印度尼西亚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它拉开了 19 世纪中叶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高潮的序幕。

（2）阿富汗抗英战争

阿富汗地处地中海和里海到印度洋之间的枢纽地区，是西亚通往印度的门户，因而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从 19 世纪初开始，英国和沙皇俄国殖民主义者就开始了阿富汗的争夺。1839 年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利用流亡在印度的阿富汗前国王舒加·沙，出动了 3 万多名英印雇佣军，大举进攻阿富汗。英国侵略军在“使节和公使”麦克诺顿、助手亚历山大·白恩士及总司令约翰·克安尼率领下，于 1839 年 4 月占领阿富汗南方重镇坎大哈，7 月占领中部要城加兹尼，8 月初兵临首都喀布尔城下。多斯特·穆罕默德国王求救于俄国未获成功，只好携妻挈幼，弃城逃往北部边城巴尔赫。

英国殖民主义者推翻了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亲俄政权以后，扶持舒加·沙建立了傀儡政权。从此，英国人挤走了沙俄势力，在阿富汗第一次建立起殖民统治。

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阿富汗的入侵，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英国殖民军占领阿富汗之后，阿富汗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民族独立战争，便在各地普遍展开。

广泛的抗英游击战。在阿富汗抗英战争前期，各地人民自发地组织起来，采用游击战术，同侵略者进行了长期斗争。首先举起抗英旗帜的是马卢

夫地区的吉尔查依部族的游击队，他们在英国殖民军侵略阿富汗后，就投入了战斗。英军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支抗英队伍镇压下去。但是，到 1840 年 4 月，吉尔查依部落一支新的游击队又开始了行动。游击队切断了英国占领军从坎大哈到喀布尔之间的运输线。2000 多名游击健儿利用山地有利条件，活跃在阿富汗的南部广大地区。他们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得从坎大哈派来的英国骑兵队一筹莫展。在阿富汗边界上的独立部族中，这种抗英游击队也迅速建立起来，到处打击敌人。俾路支游击队打败了英国克列尔中尉指挥的占领军，收复了卡拉特城，并处决了英国政治专员洛夫台。另外一支游击队还占领了交通枢纽维特。尽管英军司令部派来大批部队进行围剿，也没有能够消灭遍及各地的抗英游击队。

1841 年上半年，阿富汗抗英战争的规模更大，在东部和东南部尤为广泛、激烈。卡拉特附近的西吉尔查依部落的抗英游击队，重创瓦依迈尔少校指挥的侵略军。杜兰尼部族的抗英军在阿喀杜尔·汗领导下，于 6 月同英军进行了战斗。这是一次主动的出击，抗英军经过激烈的战斗之后，又撤回到山区，并积极准备进攻坎大哈。阿富汗人民的抗英战争使坎大哈的英国占领军惊慌失措，士气低落。一位驻坎大哈的殖民军军官在信中写道：“全国的反抗事件，与日俱增。海别尔人、吉尔查依人和杜兰尼人都拿起武器，向我们的军事据点进攻，我们的士兵就在自己眼皮下被他们杀死。我们真该撤军了。”

1841 年 10 月，麦克诺顿被任命为孟买总督，他正准备去上任时，东部吉尔查依部族又爆发了全面抗英战争。抗英军占领了东部重镇贾拉拉巴德，切断了英军从白沙瓦到喀布尔的交通线。麦克诺顿慌忙命令英军将领赛尔迅速打通这条交通线。赛尔奉命率领一个旅出发。勇敢的阿富汗游击队紧紧盯着这支侵略军的行踪，不断寻机给敌人以突然的袭击，赛尔的军队被打得狼狈不堪，丢失了许多枪弹和军需品，好不容易才通过游击区，于 11 月 13 日占领了贾拉拉巴德。赛尔派一部分英军去扼守甘达马克，但立刻被抗英游击队击溃。这支英军丢下了所有的辎重和两门大炮，慌忙逃到了贾拉拉巴德。在库希斯坦，抗英游击队攻占了恰里卡尔哨所，英国政治专员埃尔德莱德·朴鼎查身受重伤，侥幸逃走，游击队还攻占了加兹尼附近的谢卡巴德哨所。英国殖民军遭到阿富汗游击队的沉重打击，伤亡惨重，被迫龟缩在几个大城市和军事据点，不敢轻易出动。

喀布尔人民的起义。经过两年多的战斗，阿富汗人民的抗英斗争愈益高涨，战争迅速朝着有组织的总体战方向发展。1841 年 9 月，20 多个部族首领在喀布尔附近集会，商讨统一抗英行动计划。会议决定在喀布尔举行总起义，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首先向市内的白恩士官邸发起进攻，一举夺取喀布尔；然后出城消灭麦克诺顿及英国殖民军司令部。会议以后，与会者按照总起义的命令，开始动员和组织喀布尔人民进行周密的战前准备。

起义军一面秘密地积极备战，一面以散发传单、写警告信等方式麻痹敌人。起义军在 11 月 1 日给白恩土的几份传单和一封警告信中写道：“英国佬，你们滚出阿富汗的日子已经到了。”骄横狂妄的白恩士以为是阿富汗人对他的恐吓，根本不把起义军的警告放在眼里。他拿着传单毫不在乎地对部下说：“放心吧，不会出什么事，喀布尔很平安。”没料到，就在他得到警告的第二天清晨，喀布尔人民涌上街头，手持各种各样的原始武器，冲向了事先约好的地点——白恩士的住所。白恩士从睡梦中惊起，他企图用金钱来收买起

义军，但起义群众根本不买的他账。殖民者惯用的“钱袋政策”失灵了，只好命令军队负隅顽抗。当起义军即将攻进白恩士住所时，狡猾的白恩士换上了阿富汗仆人的衣服，企图化装逃跑。但此时已经来不及了，白恩士当即被起义军击毙，参与抵抗的殖民军大部分军官、卫士被打死打伤，只有英罕·拉尔和特拉维尔二人侥幸逃走。起义军占领了白恩士的金库。

傀儡国王舒加·沙得知起义军进攻白恩士住所后，急忙派出一个团的雇佣兵前来解围。谁知这支援军刚一出动，就被周围的游击队包围了。只是在英军的掩护下，他们才得以突出重围，但军队被消灭了大半，团长康拜尔也被打死了。由谢尔准将率领的英军，慌忙退入军营，不敢应战。11月2日晚，起义者占领了喀布尔全城。麦克诺顿听到白恩士被击毙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他为了阻止起义军的继续进攻，拖延时间，挽回败局，便给起义军首领穆罕默德·扎曼写了一封信，邀请他到英国军营去谈判，遭到了穆罕默德·扎曼的拒绝。

11月3日，起义军开始向英国殖民军的城外据点发起进攻。起义军首先攻占了军火库，接着又攻占了英国的行政中心。11月9日，起义军占领了从喀布尔城到巴拉·喜萨尔要塞之间的所有英军据点，并将殖民军的军事大本营——英军司令部所在地团团包围。

在起义军进入决战的艰苦而关键的时刻，喀布尔起义军得到了各地抗英武装的有力支援和配合，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是穆罕默德·阿克巴·汗领导的阿富汗北部游击队。阿克巴·汗是多斯特·穆罕默德的儿子，他从英国侵略一开始就主张抗战。当英军进攻加兹尼时，他率兵奔赴东线，扼守哈伊巴尔关隘。以后在布哈拉组织游击队。喀布尔起义爆发后，他冲破重重障碍，率领游击队于11月10日到达喀布尔。在起义首领举行的欢迎会上，穆罕默德·扎曼主动让贤，推荐阿克巴·汗担任喀布尔起义军领袖。阿克巴·汗表示坚持抗英战争，直到把殖民者赶出祖国。

阿克巴·汗领导喀布尔起义的消息，使起义军大为振奋，同时也使受包围的英国殖民军更加慌乱。殖民军总司令埃尔菲斯顿主张立即把军队撤到贾拉拉巴德，待印度援兵到达后，再重新进攻喀布尔。但掌权的英国使节麦克诺顿却提出了以谈判来拖延时间，分化起义军的领导，巩固舒加·沙傀儡政权，等待援兵到来的计划。按照麦克诺顿的计划，殖民军一面要求同阿克巴·汗谈判，并表示同意撤军，一面又许愿让阿克巴·汗做阿富汗首相或国王收买阿克巴·汗。麦克诺顿还以个人名义，送给阿克巴·汗一支手枪、一辆四轮马车和120万卢比现金。富有智慧的阿克巴·汗将计就计，在接受了麦克诺顿的谈判条件和“馈赠”之后，于12月23日以邀请麦克诺顿到起义军受降的妙计，将克麦诺顿击毙。接着，他又率领起义军对英军两个团实施突击，很快取得了胜利。在起义军的巨大压力下，代替麦克诺顿职务的朴鼎查被迫再次与起义军谈判，并在谈判协议上签字接受了起义军提出的撤军和交出武器装备等五条要求。

1842年1月6日，英国殖民军开始从喀布尔附近撤出。老奸巨猾的埃尔菲斯顿不甘心失败，在撤退中公然违反协议，企图带走大炮和弹药，被起义军识破后将他俘虏，后死在俘虏营。拥有1.6万余人的殖民军撤出喀布尔后，又遭到沿途抗英游击队的袭击，最后只剩下身负重伤的布莱顿军医1人逃到贾拉拉巴德，向英军报告了喀布尔殖民军全军覆灭的悲惨消息。

打击殖民军反扑的战斗。英国殖民军在喀布尔失败后，舒加·沙被起

义军处死，傀儡政权被推翻，从而严重动摇了英国在阿富汗的殖民统治。为了挽回败局，英国殖民者又重新调兵遣将，对阿富汗人民进行反扑。

1842 年秋，以英将波洛克和诺特为首的两支殖民军队伍，分别从贾拉拉巴德和坎大哈出发，由东部和南部向喀布尔发动了钳形攻势。为了阻击殖民军的进攻，阿克巴·汗率领抗英游击队，在德辛谷同波洛克殖民军展开激战，在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战士英勇顽强，浴血奋战，沉重打击了殖民军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抗英游击队在果爱因地区，对诺特率领的殖民军也实施了阻截。游击队以机动灵活、突然袭击的战术，将诺特的队伍分割包围，予以重创。之后，游击队又迅速转移，利用山区同殖民军进行周旋。

由于殖民军来势凶猛，阿克巴·汗为保存抗英实力，主动退入山区。9 月 15 日，英军重新占领喀布尔。入城后，殖民军将舒加·沙的儿子法什·贾思扶上王位。在巴拉·喜萨官升起英国国旗。同时，在城内大肆烧杀抢掠，数千名阿富汗爱国者被枪杀，中世纪时期塔吉克人的艺术珍品——劝业场也被炸成瓦砾。

殖民军变本加厉的报复行径，更激起了阿富汗人民的抗英斗志。在喀布尔城，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对殖民军进行反抗和袭击，致使英国士兵惊恐不安，不敢单独在街上行走，夜间躲进兵营更不敢出来。同时，各地抗英游击队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在南部的乌尔岗德山区、北部的库希斯坦以及从喀布尔到贾拉拉巴德的广大地区，每天都有游击队打击殖民军的激烈战斗。在阿富汗人民的顽强抵抗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已无计可施，被迫于 10 月 12 日将全部殖民军撤回到了印度，阿富汗重新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历时 3 年零 8 个月的阿富汗抗英战争以阿富汗人民的胜利而告终。在这次战争中，英国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达 3 万余名，战费支出达 1.5 亿英镑。战后的 36 年间，英国殖民主义者未敢再向阿富汗入侵。

（3）印度民族大起义

英国殖民者 17 世纪开始侵入印度。1600 年组成东印度公司，并以此作为侵略印度的主要工具。18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殖民者利用莫卧儿帝国的解体，一面竭力排斥法国殖民者在印度的势力，一面加紧对印度的鲸吞和蚕食，到 19 世纪中期完全吞并了印度。

英国殖民者在对印度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在经济上也进行着疯狂的掠夺和剥削。他们通过抢劫、垄断性贸易和征收高额赋税等手段，榨取了惊人的财富。据统计，1757—1815 年，英国从印度掠走的财富达 10 亿英镑。因此有人曾生动地比喻说，英国“像海绵一样从恒河上吸取了财富，又挤出来倒在泰晤士河中”。

在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下，印度人民生活贫困不堪。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每百人中有 99 人负债，遇有灾荒，就成批地死于饥馑。由于英国利用殖民地倾销商品，使印度手工业者被剥夺了谋生手段而找不到生活出路，有的死亡，有的流落街头沦为乞丐。

在英国殖民军中服役的印度士兵，其生活景况更为恶化。英国从印度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中共招募了 20 万士兵，他们受着 4 万英军控制，受尽了英国军官的歧视和欺凌。英国在蒙蔽和利用印兵征服了南亚次大陆以后，对印兵实行了更为苛刻的政策，印兵的薪金被降低，原有的一些优待也被取消，

而且不顾印度教的种姓规定，常常把他们调到伊斯兰教国家去作战。1856年英国制定新的募兵法，规定印兵必须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企图以新兵代替旧兵，进一步取消印兵的某些权利。殖民军中的不平等待遇，引起了印兵的强烈不满。他们同印度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一道，结成了最坚强的反英同盟。

起义的爆发。从1856年起，印度社会各阶层都在酝酿反英起义活动。在农村中开始传递烧饼，作为联络起义的信号；在城市里出现了号召起义的秘密传单；在军队中以传递荷花作为秘密起义准备的标志。印兵中反英情绪最强烈，宣传鼓动最活跃。印度教士兵手捧恒河水，伊斯兰教士兵面对《古兰经》，庄严宣誓要消灭英国殖民者。印兵还利用暗语通讯方式，与各团队建立联系。

1857年初，殖民当局下发的一种新子弹，是用涂有牛油和猪油的纸包装的，使用时必须用牙齿咬开，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士兵都认为是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侮辱，无比愤慨。印兵们经常秘密集会，联合附近居民，控诉殖民者的恶行，表示战斗的决心，准备起义。4月，德里附近的米鲁特发生印兵拒绝使用新子弹事件，殖民者对参与这一事件的85名印兵判以10年重刑，并当众加以侮辱，激起了印兵的更大愤怒。5月9日，当被判刑的印兵被押赴监狱时，其他印兵举行会议，一致决定举行武装暴动。于是，新子弹事件就成了起义的导火线。5月10日，驻在米鲁特的印兵首先发动起义，市民和郊区的农民也纷纷参加了战斗。起义者杀死英国官员，烧毁营房和殖民衙署，释放狱中“政治犯”。5月10日晚间，起义者行军40英里，浩浩荡荡向德里进攻，德里军民纷纷响应，把英军打得一败涂地。5月16日，起义者控制了整个德里。

德里收复后，起义者拥立早已名存实亡的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赫二世为印度皇帝，并以他的名义发布文告，号召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团结一致，驱逐英国殖民者。同时，起义军人和市民代表共10人组成了行政会议，作为印度的临时政府。行政会议颁布命令，宣布废除殖民者实行的土地制度，取消贫民捐税，对地主、富商、高利贷者征收特别税。

以德里为中心的起义的胜利，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反英斗争。起义烈火迅猛燃遍印度北部和西北部，一个月内，有40个地区发生了起义。接着，南部和东南部广大地区也相继爆发起义。全国各民族各阶层都纷纷响应和参加起义，使这一由印度士兵发起的抗英斗争发展成为印度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大起义。

德里、勒克瑙和詹西的战争。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以后，英国殖民者丧魂落魄，立即调兵遣将，向起义军进行反扑。1857年6月，英军围攻起义中心德里。据守德里的4万起义军英勇善战，不断奇袭敌军，英军损伤严重。英军围住德里3个月内不敢攻城。但是，起义军缺乏统一领导，没有乘胜突围。追歼敌军，贵族军官统领的军队，不服从出身微寒的总司令巴赫德·罕的调遣；一部分贵族、地主和买办商人投机倒把，抬高物价，制造混乱，通敌叛国，甚至炸毁起义军的军火库。这一切，使起义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9月，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发动猛烈攻势，用重炮轰破德里城。起义者进行巷战，利用楼房和街道掩护，狠狠打击敌人，打死敌军5千余人，击毙英军两个司令官。9月20日，英军占领了德里城。他们在德里大肆抢掠、烧杀、掳掠，犯下滔天罪行。医院伤员被杀死；不少老百姓被割下一块块肌肉，然后

搁在火上活活烧死；许多水井填满了害怕英军污辱而自杀的妇女的尸体。英军的暴行惨绝人寰！巴哈杜尔·沙赫二世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集团向英投降。起义军撤退到恒河与朱木拿河之间的大平原，展开游击战。

德里失陷后，起义的中心转移到印度北部敖德公国的首府勒克瑙。早在1857年5月底，敖德的士兵、市民和农民举行了反英起义，把英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敖德的行政长官兼司令官蒙哥马利·亨利·劳伦斯率领残兵败将龟缩在勒克瑙总督府，被起义军层层围困住。6月，起义军不仅控制了勒克瑙，而且控制敖德全境，不断向总督府进攻。7月，歼灭了几百英军，把劳伦斯击毙。英军曾多次进攻勒克瑙，均被起义军打败。1858年2—3月，英国殖民者集中七八万兵力，180门大炮围攻勒克瑙。起义者以少抗多，英勇奋战20多天后撤退。3月19日，英军占领勒克瑙，实行极其野蛮的“抢光”、“杀光”政策，洗劫两星期之久，勒克瑙所受损失达600万英镑。

勒克瑙失陷后，敖德的许多地区仍继续战斗，在阿拉哈巴德境内一个小土邦首领官瓦尔·辛哈，年逾八十，于1858年3月18日收编了一些从勒克瑙退出的起义队伍，时而集中兵力会战，时而化整为零突围，出没无定，到处打击敌人，把英军打得晕头转向。在一次渡恒河作战时，他的右臂中弹，恐毒性蔓延全身，遂拔刀砍掉右臂，扔进河中，强渡恒河，继续指挥战斗。4月2日，重新夺回小土邦，重创英军，4月26日，辛哈臂伤发作而死。

英军占领勒克瑙后，开始进攻印度中部的起义中心詹西。早在1857年6月，詹西士兵和人民起义摧毁了殖民政权。在民族大起义的浪潮中，与英国矛盾的詹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也参加了起义，并掌握了詹西地区的起义领导权。巴伊的丈夫詹西王死后无嗣，只有一个收养的儿子，英国殖民当局不承认他这个养子有权继承王位，引起了巴伊的愤恨，因此她积极参加反英起义。她领导詹西人民赶走英国殖民势力，使詹西维持独立达11个月之久。1858年3月，英军进攻詹西之前，女王就在詹西周围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以迎击敌人，并亲自修筑工事。3月24日，敌军围攻詹西，23岁的女王率领全城军民奋勇抗击。3月29日，敌人的炮弹把城墙轰塌了一段，11名妇女身裹毛毡，冒着枪林弹雨进行抢修；工匠们也日夜赶造武器弹药。起义军架着大炮向敌人射击。4月3日，英军突入城内，詹西人民进行巷战、白刃战，杀死不少敌人。500名坚守高地的壮士，誓与詹西共存亡，流尽最后一滴血。4月5日，詹西陷落。女王巴伊手持武器，身穿男装，带领一支队伍突围，连夜赶路100英里，与领导游击队伍的唐提亚·托比会师，继续坚持抗战。在6月18日一次战役中，女王的头、臂、眼、胸被敌人砍得鲜血直淌，她已神智不清时，仍在马上用佩刀把一个英军骑兵杀下马，最后女王巴伊英勇牺牲。

后期的游击战争。詹西失守后，印度民族大起义由城市保卫战转为游击战。1858年，约有15至20万人拿起武器，继续战斗。其中以平民出身的将军唐提亚·托比领导的起义队伍战斗得最出色。他率领的部队转战在恒河流域一带，支援过德里、勒克瑙和詹西等城市的保卫战，多次袭击英军据点。詹西失陷后，托比转战中印度，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到处袭击英军，烧毁军火库，夺取大炮，往往接连几个星期每天转移几十公里，使英军疲于奔命。他的部队，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时而占领城市，时而放弃城市，选择有利时机打击敌人。英军四面八方包围他的部队，但他们总是不可捉摸地突出重围。

英国政府一面加强军事力量，疯狂镇压印度起义军，一面颁布英国女王

诏书，收买封建主为其效劳。1859年4月7日，印度民族英雄、起义军领袖唐提亚·托比被叛徒出卖，献给英军。4月18日，托比泰然自若、毫无惧色地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其他一些游击队伍仍然坚持斗争，直到1859年底起义最后失败为止。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削弱了英国的侵略扩张势力，有力地推动了印度和整个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2. 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战争

非洲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最早的地区。1415年，葡萄牙殖民者占领摩洛哥建立了第一，殖民据点。之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殖民者也相继入侵，纷纷在西非、中非、南非和东非沿岸建立殖民地，用抢劫和不等价交换手段，掠夺非洲财富，从事血腥的奴隶贩卖，使非洲一度成为殖民者的“黄金海岸”、“奴隶海岸”和“谷物海岸”。到19世纪中叶，欧美殖民者凭借武力，将非洲1.8%的领土变成了殖民地。热爱自由和独立的非洲人民，自殖民者的铁蹄踏上非洲土地的那一天起，就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从沙漠到丛林，从海滨到内陆，他们凭借弓箭刀矛等原始武器，到处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早在15世纪末，刚果人民胜利地驱逐了最先侵入刚果河流域的葡萄牙殖民者。1512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阿尔梅达侵占开普，霍屯督人起而自卫，把他连同75名卫士全部歼灭，使欧洲殖民者侵占南非的时间推迟了140年。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在非洲如火如荼，越烧越旺。到19世纪中期，非洲已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1）北非人民反殖战争

北部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马格里布国家，在西方殖民者向非洲扩张时，首当其冲受到侵犯。从15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的魔爪就开始伸向这里，以后英、法、美等国也接踵而至。北非人民不断奋起反抗，打击殖民者的入侵。在19世纪，反殖民主义斗争最为激烈的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法国殖民主义者对富饶的阿尔及利亚早已垂涎三尺，拿破仑曾亲拟了入侵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计划，但未及实现就垮台了。法国王朝复辟以后，重新拣起拿破仑的衣钵，发动了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战争。1827年4月，法国以阿尔及利亚国王“侮辱”法国总领事为借口，下令封锁阿尔及利亚海岸。1830年6月，法国布尔蒙将军统率3.8万名步兵和4000骑兵在阿尔及利亚登陆。7月4日，法军占领阿尔及尔城。法军侵入阿尔及利亚之后，疯狂屠杀人民，随意奸淫妇女，掠夺财富，引起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在阿尔及利亚，西起特累姆森，东至君士坦丁，抗法斗争的怒火到处燃烧。斗争最激烈的西部地区，广大农民、牧民以及部分小封建主，在年轻的民族首领阿布杜拉·喀德领导下，同法国入侵者展开了英勇的战斗。

阿布杜拉·喀德出身于古老的阿拉伯家族，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和勇敢的军人。1832年—1834年间，他运用游击战术多次挫败在兵力、装备方面处于优势的法军，迫使法军于1834年签订在西部停火的条约，并承认喀德在西部的统治权。喀德建立了以马斯卡腊为中心的“艾米尔国”，在辖区内限制

封建主的剥削，建立正规军，创设军需工厂，修筑防御工事，以抵御法国侵略者。

1835年，法军在拼凑力量之后，撕毁条约，重新挑起战争。喀德率军再次打败法军。法军被迫又于1837年与喀德签订和约，承认除阿尔及利亚东部外，其余归喀德统治。但这是侵略者的缓兵之计，当法军击败东部阿赫默德领导的抗法斗争后，便在1839年撕毁和约，向喀德进攻。喀德率领部队重创法军，消灭4万余人。当时法军拥有兵力超过10万，而喀德只有3万人左右，由于力量悬殊，喀德逐渐失利。1841年，喀德都城马斯卡腊失陷。1844年，喀德退往摩洛哥。1845年，西部掀起新的抗法起义，喀德又被推为领袖。他兵力虽薄，但仍坚持奋战，多次打败侵略者。1847年，喀德在一次进攻战斗中不幸被法军俘虏，西部抗法斗争遂出现暂时的低潮，但斗争的烽火并未扑灭。从1849年—1864年，阿尔及利亚又先后爆发了查阿克绿洲、卡比利亚山区、拉古亚特绿洲、贝尼—斯南桑部落、乌勒得—西迪—赛依赫部落等抗法起义，其中卡比利亚起义坚持斗争达7年之久。到1870年，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又出现了新的高潮。

摩洛哥反法、西战争。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入侵阿尔及利亚的同时，把魔爪也伸向了摩洛哥。1844年，当喀德败退到摩洛哥时，法军以追击喀德为借口，首次窜犯摩洛哥，以炮舰击毁丹吉尔城。摩洛哥人民奋起反击，但统治者摩洛哥苏丹却采取退让政策。在法国的压力下，摩洛哥同法国签订了《丹吉尔条约》。该条约规定，摩洛哥政府放弃支持喀德的反法斗争，法军则撤出摩洛哥。1847年，当喀德第二次兵败退入阿—摩边境时，摩洛哥苏丹竟派兵阻拦喀德进入摩洛哥，使喀德陷入绝境而失败。

与摩洛哥苏丹幼稚的想法相反，法国殖民者在镇压了阿尔及利亚抗法斗争后，便撕毁条约，背信弃义地再次入侵摩洛哥。1859年，法军开始袭扰阿、摩边境，接着又把军舰开进摩洛哥领海，炮击得土安港。在摩洛哥人民的抗击下，法国的侵略阴谋未能实现，摩洛哥暂时仍保持着独立，但法国仍未放弃把摩洛哥变成殖民地的野心。

西班牙为了谋求在北非的利益，也不断向摩洛哥进行渗透和扩张。1859年11月，西班牙殖民者奥当奈尔将军率领4万殖民军，大举进犯摩洛哥。摩洛哥人民拿起武器，奋力抵抗入侵者。抵抗军民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但采用勇猛机智的游击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侵略者处处遭到打击。经几个月的激战，西班牙殖民军仍未能实现占领得土安和丹吉尔的图谋。由于摩洛哥苏丹害怕人民抵抗运动，又慑于西班牙武力，于1860年同西班牙签订了《得土安条约》。条约规定摩洛哥放弃休达城周围地区的主权，向西班牙赔款2000万皮阿斯特，并给西班牙以最惠国待遇。

（2）西非人民反殖战争

位于撒哈拉以南的西非是非洲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拥有加纳、马里、桑海、伊菲和贝宁等古国的文明。从15世纪开始，欧美殖民主义者就涉足这里，进行血腥的奴隶贸易，以后又打着传教和“探险”的幌子进行殖民掠夺。19世纪中叶，英、法、美等国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大举入侵西非。美国侵占了利比里亚，英国侵占塞拉利昂、加纳、尼日利亚，法国侵占塞内加尔和马里。殖民者的侵略，遭到了西非人民的坚决抵抗。其中尤以加纳的阿散蒂抗英战争和塞内加尔的图库列尔抗法战争最为著名。

阿散蒂抗英战争。阿散蒂是位于加纳中部的一个王国，居民主要是阿肯族人。17世纪中叶以来，阿散蒂不断扩张，开始崛起。18世纪末统一了周围许多阿肯族土邦，逐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王国。19世纪初，英国入侵西非，占据了加纳沿海的海岸角、阿克拉等地，并辟为殖民据点。英国唯恐阿散蒂在加纳建立统一国家，便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竭力煽动芳蒂土邦反对阿散蒂王国。1805年至1806年，英国挑起了阿散蒂和芳蒂之间的战争，结果芳蒂被打败。英国殖民军便以“保护”芳蒂为借口，向阿散蒂王国开战，于是爆发了阿散蒂第一次抗英战争。阿散蒂王国的军队连连取胜，攻下了许多英国殖民军的碉堡，迫使英国放弃了对阿散蒂统一的阻挠。1811年和1814年，阿散蒂王国又同英国进行了两次战争，再次挫败英国。1820年，英国殖民总督被迫与阿散蒂签订条约，承认芳蒂土邦归属阿散蒂，并向阿散蒂交纳在其境内修筑碉堡的租金。

英国殖民者把出于无奈的谈判签约作为缓兵之计，暗地却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1822年，英国殖民总督悍然宣布废除协议，并把加纳沿海殖民地堡垒归塞拉利昂总督麦卡锡管辖。麦卡锡一面修筑堡垒，加强殖民据点，一面用威胁利诱手段强迫沿海各族酋长同英国结盟，拼凑兵力。1823年，英国殖民军向阿散蒂发动攻击，遭到阿散蒂军队的顽强抵抗，英军惨败。1824年11月，英军在恩沙曼被阿散蒂军包围，几乎全军覆没，麦卡锡受伤后毙命。1826年，阿散蒂军在进攻中初次受挫。英军虽然获胜利，但付出了沉重代价。1827年，双方通过谈判，再次签订协议，英国承认阿散蒂独立，阿散蒂放弃对加纳沿海一些地区的控制。

此后，英国加紧收买沿海各族酋长，以分裂阿散蒂王国。同时，将侵略势力扩大到离海岸60公里左右的内地，建立所谓“黄金海岸保护领地”，企图巩固它在加纳沿海的殖民统治。1853年和1863年，英国又两次撕毁条约。挑起同阿散蒂的战争，但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图库列尔抗法战争。19世纪上半期，塞内加尔河流域分裂成许多封建小王国。法国殖民者利用这些小王国之间的矛盾，进行挑拨和干预，把自己的势力渗透到塞内加尔河流域。法国的这一侵略扩张阴谋，遭到了塞内加尔的图库列尔王国的反抗。

图库列尔国王哈吉·奥马尔笃信伊斯兰教。他一生致力于塞内加尔河流域各封建王国的统一事业，是当时非洲黑人的民族英雄之一。奥马尔利用伊斯兰教一个进步教派的教义训练并团结了一批教徒，并从沿海取得武器，组成一支强大的部队。1857年，奥马尔率领军队1.5万人宣布“圣战”，立志要把法国侵略者从塞内加尔驱逐出去。奥马尔军进攻法国据点梅迪内堡，迫使敌人龟缩堡内，在3个月围攻期间，法军伤亡惨重。后由于法国殖民军大批增援部队赶到，方才解围。奥马尔率军主动撤退到西苏丹腹地。此后，几年间，他向东扩张，建立了一个包括尼日尔河以东大片土地及塞内加尔与尼日尔河之间大部分地区的国家，阻挡法国继续向东侵略。1864年，奥马尔被图库列尔王国叛乱贵族杀害，其子阿赫马杜继位，继续领导人民反抗法国侵略者。

（3）南非人民反殖战争

欧洲殖民主义者从17世纪开始，就不断向南非（阿扎尼亚）扩张。1652年，荷兰殖民者在开普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并将大批移民迁居南非。紧

接着，法国、德国殖民者也相继侵入。从此，这些殖民者以及他们的后裔——布尔人便开始了对南非人民的殖民统治。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也大规模入侵南非，争夺领土，奴役人民。南非人民同殖民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19世纪，主要是科萨人和祖鲁人反对英、布殖民者的战争。

科萨人的战争。科萨人是南非班图族的一支，生活在大菲希河流域。科萨人反殖民侵略斗争，在南非人民反殖斗争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从1779—1877年间，荷、英殖民者对科萨人进行了10次侵略战争，即所谓“卡弗尔战争”，遇到科萨人的坚决抵抗。

1778年，布尔人从开普北上，以武力进攻科萨人，占领了他们居住的大菲希河地区的土地和牧场。次年，科萨人坚决反击，发生了第一次卡弗尔战争。1806年，英国侵占好望角，1815年，又从荷兰手中夺得开普殖民地，并进行扩张。从此，英国殖民者成了南非人民的主要敌人。英国殖民当局派遣军队把两万多名科萨人赶过大菲希河，霸占他们的土地，建立碉堡，移来白人开垦，激起了科萨人的极大愤恨。这时科萨人中间出现了一位叫马康达的“先知”，他以神的名义号召科萨人行动起来，把白人殖民者赶下海去。科萨人渡过大菲希河，向开普进军，1819年包围了殖民据点格雷厄姆斯敦，英殖民当局陷入混乱。1834年，科萨人在酋长马可摩领导下，联合分散的部落进行收复失地的斗争，一度进入开普殖民地。1833年，殖民军打败马可摩军，向东北进占巴西河地区。1850—1853年科萨各部落联合起义，班图人其他各支及霍屯督人甚至殖民军中的非洲人骑兵也参加了起义。英殖民当局调动了10个营以上的兵力，镇压了这次起义，但科萨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反英斗争坚持到19世纪70年代。

祖鲁人的战争。祖鲁人是南非班图族的另一支，散居在纳塔尔北部地区。19世纪初，在杰出的酋长恰卡领导下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大部落联盟。面对布尔人向北扩张，蚕食班图人土地的威胁，恰卡着手建军备战，征收18岁以上的男子入伍，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改革传统的战术和武器，采用牛皮盾牌和长矛，并配以短杆刺矛，进行白刃战；用有组织的密集队形代替没有指挥的各自为战的战术。恰卡还设立皮革加工工场，向葡萄牙人买武器，建立了一支非常强大的武装。1818—1828年10年间，恰卡在纳塔尔、德兰士瓦、奥伦治一带建立了统治权，奠定了祖鲁人国家的基础。1828年9月，恰卡被同父异母弟丁刚刺杀。丁刚夺取了哥哥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兄长反殖民斗争的事业。

1838年2月，布尔殖民者侵入纳塔尔，丁刚率部抵抗，歼灭了布尔军，接着又打败侵入纳塔尔沿海的英国殖民军。后来，英、布殖民者勾结起来，使祖鲁人腹背受敌。1839年3月，丁刚被迫承认布尔人所占纳塔尔土地。接着，布尔人进一步分化瓦解祖鲁人的队伍。丁刚之弟姆潘达率军叛变，勾结布尔军，打败丁刚军。1840年丁刚被杀害，祖鲁人反抗英、布的斗争暂时处于低潮。19世纪70年代，在开芝瓦约领导下，祖鲁人的反英斗争重新高涨。

3. 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

位于美国以南的美洲广大地区，统称为拉丁美洲。19世纪以前，在拉丁美洲的大陆上，除巴西以外，北起墨西哥，南至智利、阿根廷，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独立战争前夕，在1500万殖民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处于被役地位

的印地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即土生白人，多数属于地主阶级，但也受到宗主国的种种限制和歧视。只有占人口少数的宗主国出生的西班牙人，才享有各种特权，高高在上。整个拉丁美洲殖民地，充满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殖民地广大人民，特别是印地安人和黑人奴隶，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着反对西班牙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英勇斗争。19世纪初，在法国革命、海地革命的影响下，辽阔的西属美洲大陆，从北到南掀起了独立解放战争的巨大革命风暴。

从1810年至1826年，西属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主要在墨西哥、南美北部和南美南部三大中心区域展开。

（1）墨西哥的战争

墨西哥是独立战争最北部的中心区域。这里是重要的金银产地，殖民统治势力较强，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所受的压迫最深，民族矛盾也最尖锐。长期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对西班牙殖民者怀有无比的仇恨，正因为如此，墨西哥独立战争比其它地区也更富群众性。

1810年9月16日，多洛雷斯教区天主教堂教甫伊达尔哥敲响了教堂的大钟，号召他的印第安人教徒群众奋起夺回西班牙人从他们祖先手中夺去的土地，争取国家独立，废除奴隶制度。数千印第安教徒在“独立万岁”、“打倒坏政府”、“绞死西班牙人”的口号下起义。他们拿起砍刀和棍棒，放火焚烧大地主庄园，夺取和分配土地。起义队伍很快占领了重要城市塞拉亚，随即又攻陷瓜那华托城。10月，伊达尔哥向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进逼。这时，起义队伍已壮大到8万人。西班牙殖民当局大为恐慌，立即组织反扑。11月下旬，殖民军在卡耶哈的率领下，重新攻占瓜那华托城，起义主力遭到巨大损失。伊达尔哥统领着另一支起义部队。进驻已解放的瓜达拉哈拉，并在这里集结和补充队伍。1811年1月，卡耶哈指挥的西班牙殖民军扑到瓜达拉哈拉，起义军在卡尔德龙桥地区同殖民军进行了顽强战斗，结果起义军失败。3月下旬，起义军在向北撤退途中，由于叛徒出卖，伊达尔哥被俘后遭杀害。

此后，伊达尔哥的战友、出身贫困的混血种人莫雷洛斯继续领导起义部队，多次打败殖民军。1811年下半年，莫雷洛斯解放墨西哥城南边的奇尔潘辛戈等地，建立地方政权。1812年2月，占领夸乌特拉，开始威胁墨西哥城。卡耶哈调重兵围困夸乌特拉，莫雷洛斯率军民突围成功。以后，起义军又连克特瓦坎、瓦哈卡、阿卡普尔科等地，使整个南方几乎全部被起义军控制。1813年9月，莫雷洛斯发起在奇尔潘辛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通过“民族意识”的革命纲领；宣布墨西哥独立。

1814年，莫雷洛斯在北上夺取巴利阿多利德失利后，奇尔潘辛戈也落入敌人之手。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复辟上台之后，又进一步加紧了对墨西哥独立运动的镇压。一些土生白人的上层分子纷纷投向敌人。1815年，莫雷洛斯在一次战斗中被俘就义。墨西哥解放运动失去了具有军事才能的领袖，斗争受到重大挫折，从此转入低潮。但各地人民仍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殖民主义者。

1820年，西班牙国内爆发革命。墨西哥的殖民当局和土生白人上层阶级都惊恐万状，害怕西班牙革命会引起墨西哥独立运动的高涨，加紧策划政治阴谋，他们让过去镇压过革命的土生白人军官伊都尔比德提出一个所谓脱离西班牙的纲领，骗取了人民的拥护。1821年9月，当殖民军遭到解放力量的

打击濒于灭亡的时候，伊都尔比德率领军队进入墨西哥城，宣布墨西哥脱离西班牙独立。在他窃取国家权力后，立即倒行逆施，自封为皇帝。此后经两年的曲折斗争，伊都尔比德被人民推翻，墨西哥才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

（2）南美北部的战争

南美北部是独立战争最重要的一个战场，这里武装斗争开始得最早，战争也最激烈，其中心是委内瑞拉。

1810年4月，法国占领西班牙的消息传来，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城的群众爆发起义，驱逐了西班牙的殖民官吏，成立了新的市府。1811年，加拉加斯召开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共和国。这时，盘踞在加勒比海岸的西班牙殖民军同天主教复辟势力勾结，向共和国发动反扑。1812年4月，米兰率领共和国军队，多次击退殖民军进攻。但不久，重镇卡贝略港失守，爱国力量失去了主要军火供应地。米兰丧失信心，与西班牙殖民者签订了投降协议，共和国因此而被绞杀。

共和国失败后，米兰被捕，玻利瓦尔成了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他从西邻的哥伦比亚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力量，重新开始战斗。1813年2月，他率军从新格兰纳达向加拉加斯进发。一路上受到人民的支持，队伍不断扩大。在多次击败西班牙殖民军以后，于8月6日重新占领了加拉加斯，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但是，玻利瓦尔没有采取有利措施赢得人民，共和国的敌人不断发动反革命叛乱，勾结西班牙殖民军进行对抗。结果革命军接连受挫，第二共和国被扼杀，玻利瓦尔流亡牙买加，后转到海地。

在海地共和国的帮助下，1816年，玻利瓦尔率领250名战士，在委内瑞拉马加里岛登陆。1817年，会合当地游击队攻克奥里诺科河上的重镇安哥斯土拉。1818年成立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玻利瓦尔被选为总统。共和国认真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争取人民的政策和措施，使革命队伍不断壮大。到1819年，玻利瓦尔的部队达1万人以上。

1819年5月，玻利瓦尔率军进攻殖民军，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一路佯攻加拉加斯的敌军主力，另一路则悄悄越过安第斯山，奇袭敌军的心脏哥伦比亚。8月7日，爱国部队在波亚卡河畔与殖民军大战，全歼守敌近3000人。随即解放波哥大。同年12月，由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构成的“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玻利瓦尔当选总统。

此后3年，玻利瓦尔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肃清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等地残存的西班牙殖民武装。1812年6月24日，玻利瓦尔率8000人的部队，在卡拉沃沃战役中彻底粉碎了由拉托雷指挥的4000名西班牙殖民军，歼敌3600余人，7月29日，玻利瓦尔重新占领了加拉加斯。1822年5月，玻利瓦尔的部将苏克雷将军又在皮钦查大败殖民军，占领厄瓜多尔首府基多。厄瓜多尔宣布独立，并加入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3）南美南部的战争

南美南部是独立战争的第三个主要战场，重点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爆发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西班牙总督的殖民统治，成立了土生白人独立派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派遣远征军去帮助周围各地区争取独立的斗争。在巴拉圭、乌拉圭、智利，到处都掀起

了独立运动。1811年5月，巴拉圭人民发动起义，不久宣布独立。乌拉圭在阿蒂加斯领导下，于1811年和1812年两度围攻首府蒙得维的亚。1813年2月，西班牙殖民军勾结阿根廷地主武装，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进犯，被临时政府军队击败。1816年，阿根廷正式宣布独立。

但是，当时盘踞在秘鲁的西班牙殖民军，严重威胁着阿根廷的独立。阿根廷解放运动著名领导人、临时政府任命的北方军总指挥圣马丁决定摧毁西班牙在南美的殖民老巢——秘鲁总督区。圣马丁计划由阿根廷西部越过安第斯山，先解放智利，然后再从海上进攻秘鲁。1814年，他设总部于接近智利的门多萨，筹建著名的安第斯军。黑人奴隶、黑白混血种人踊跃参军，手工工人为军队制作装备，妇女们缝制军服，农民们供给粮秣。依靠人民的力量，圣马丁经过两年多时间，组织和训练了一支5500人的军队，1817年初，圣马丁亲率这支远征军，经过20多天艰苦行军，胜利翻越4000多公尺的安第斯山。2月12日，在著名的恰卡布科战役中，远征军一举击败西班牙殖民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接着，在奥希琴斯领导的智利人民起义的配合下，解放了圣地亚哥。1818年4月5日，圣马丁又在迈普平原会战中，全歼西班牙在智利的残余军队。至此，智利全境解放，正式宣告独立。

为了进一步向秘鲁进军，圣马丁把安第斯军和智利军队合并，组建了一支有4500人的陆军和一支拥有23艘战船的舰队，并由圣马丁亲任总司令。1820年8月，远征军在秘鲁登陆。1821年7月，远征军攻克秘鲁首都利马。28日秘鲁宣布独立，圣马丁被推为护国公。

利马解放以后，西班牙驻秘鲁殖民总督逃往北部，纠集近2万殖民军继续负隅顽抗。为集中力量完成秘鲁解放大业，1822年7月，圣马丁亲赴厄瓜多尔与玻利瓦尔会晤，秘谈协同作战计划，因两人意见分歧未达成协议。圣马丁返回利马，之后又毅然辞职以敦促玻利瓦尔出兵。1823年9月，玻利瓦尔率领6000名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军队到达秘鲁，在与阿根廷、智利军队会合后，于1824年8月在胡宁与1.9万名西班牙殖民军会战，玻利瓦尔联军取得重大胜利。同年12月9日，联军同殖民军在秘鲁南部阿库乔进行决战，西班牙殖民军出动9000余人，联军只有5000余人。在苏克雷将军指挥下，联军运用骑兵快速逼近，大败西班牙军，击毙西军1800余人，俘虏了包括秘鲁总督兼总指挥拉塞尔纳在内的2000余人。1825年1月25日，秘鲁宣布独立。为纪念解放玻利瓦尔，秘鲁改称玻利维亚。1826年1月，驻卡亚俄港的西班牙殖民军残部向玻利瓦尔投降，西属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宣告结束。

五、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战争

自 19 世纪三四十年开始，英、法、俄、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开拓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先后把侵略扩张的手伸向地广物博而又贫穷落后的亚非地区，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它们觊觎已久的中国。在此后的七八十年中，它们依仗船坚炮利，不断武装侵犯中国，并同渐入末世的清王朝相结合，一步步把这个东方大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期间的主要战争有：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战争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甘屈服的大无畏气概，在中外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鸦片战争

(1) 第一次鸦片战争

自 18 世纪中叶起，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中，英国一直占压倒优势，但由于中国市场对英国商品需求量小，因而英国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后来，他们发现鸦片这个毒品既是中国乐意接收的“商品”，又可以带来高额利润，于是便大量向中国输出鸦片。在鸦片战争前的 40 年中，英国共走私运入中国 40 多万箱鸦片，从中国掠夺了约 3 亿多银元。鸦片的大量输入，使烟毒在中国到处泛滥，从皇室官吏，将弁士兵到商贾平民，吸食者高达 200 万以上，直接毒害了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同时，造成了大量白银外流，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生活。鸦片贸易实际上成了和黑奴贸易一样残酷的殖民掠夺形式。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和呼吁下，加上清廷内部主张禁烟官员的推动，道光皇帝终于定下禁烟的决心，于 1839 年 12 月 31 日任命力主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节制水师，查禁鸦片。林则徐于 1840 年 3 月 10 日到任后，置个人荣辱祸福于度外，采取了断烟源、强防务、堵私船、缴鸦片等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开始了震惊中外的禁烟运动。他郑重宣布：“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在短短两个多月中，共收缴鸦片 2 万多箱，计 237.6 多万斤。6 月 3 日在林则徐主持下，对所收缴的烟土，除留下 8 箱作为样品外，其余全部在虎门海滩用盐卤和石灰销毁。

早在中国禁烟运动开始以前，英国资产阶级就妄图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林则徐禁烟的壮举，使英国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的 200 万英镑化为乌有，英国资本家纷纷要求对中国采取所谓“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政策”，公然叫嚣：中国禁烟给了英国“一个战争的机会”。1839 年 10 月 1 日，英国内阁会议作出了向中国出兵的决定。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任命曾任印度总督、英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懿律和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对华谈判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 月，一支拥有 540 门大炮、48 艘舰船和陆军各兵种 4000 多人（后增至 1.5 万人）的“东方远征军”，开始从印度出发侵略中国。事实上，还在英国政府为出兵中国进行准备时，义律就指使英舰向广东水师发起进攻，点燃了战火。1840 年 6 月，懿律率领的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沿海，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场战

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1840 年英军封锁珠江口，至 1841 年 1 月义律单方面宣布订立《穿鼻条约》。

林则徐到广州上任后，探知英国准备出兵进犯中国，于是一面坚持禁烟，一面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一起积极备战。懿律率领舰队到达广东沿海后，看到这里早有戒备，于是留下 5 艘兵船封锁广州海口，主力则向北进犯。7 月 2 日，英军侵犯福建厦门，被守军击退；5 月攻陷浙江舟山群岛定海县，为英军继续北上夺得了一个基地。8 月 6 日，英军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投递英国政府照会，要求中国赔偿烟价和作战经费，在沿海割让一岛或数岛给英国，并威胁说，如不答应其要求“必相战不息”。英军抵达大沽口，对作为北京门户的天津顿成威胁之势。清廷内的投降派立即被吓倒，大肆攻击林则徐等抵抗派。道光皇帝害怕战火烧到天津，迅速倒向投降派一边，派直隶总督琦善同英军谈判，请求英军南返，在广州会谈。英军鉴于自己兵力少，加之军中疾疫流行，不敢任意挑战，遂同意迁往广州交涉。林则徐、邓廷桢则被横加“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等罪名，由道光皇帝下令撤职查办。新任两广总督琦善于 11 月到达广州后，在对英谈判中一味屈辱退让，接受了赔偿烟价等要求；但对割地一事因未得到皇帝允准，未敢答应。此时继任英国全权代表的义律决定使用武力威胁，迫使琦善接受割地的要求。1841 年 1 月 7 日，英军发动突然袭击，攻陷大角、沙角炮台，随即英方单方面发出“公告”，宣布已和琦善签订“初步协定”，清政府同意割让香港，赔偿烟价 600 万元，恢复广州贸易。中外一些史籍称此“初步协定”为《穿鼻条约》。其实，琦善并未在此“条约”上签字，清政府也未同意。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公元 1841 年 1 月 26 日），英军强行占领香港。至此，鸦片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自 1841 年 1 月 27 日清政府对英宣战，至 1841 年 5 月 27 日《广州和约》签订。

英方的蛮横，特别是大角、沙角炮台的失陷，使道光皇帝大为恼怒，遂于 1 月 27 日诏告中外，对英宣战。道光派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主持广东战事，并从南方数省抽调军队 1.7 万多人开赴广东，随后下令将琦善锁拿押京。英军见清政府调兵遣将，决定先发制人。2 月上旬，英军大举进犯虎门。老将关天培率军苦战，虽然负伤十多处，仍从容指挥作战，并亲自燃放大炮，手执佩刀与闯上炮台的英军格斗。最后与数百名将士一起壮烈牺牲。继虎门失陷后，广州以南诸炮台亦被占领，英军逼近广州城郊。奕山率军抵广州后，于 5 月 21 日，派兵夜袭英船，次日英军进行反扑。不几日，广州城西之泥城、缙浦和城北制高点四方炮台，均被英军攻占，广州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火力之下。面对如此严重局面，奕山只得狼狈乞和，于 5 月 27 日同英军签订了《广州和约》。同清政府妥协投降的态度相反，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侵略斗争。就在和约签订后不久，广州北郊三元里等 103 个乡的人民，在牛栏冈一带将来犯的 2000 名英军包围，用大刀、长矛、铁锹同英军作战，打死打伤敌 200 多人，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第三阶段：自 1841 年 8 月英军攻陷厦门始，到次年 8 月《南京条约》签订。

1841 年，英国政府收到义律关于与琦善签订所谓《川鼻条约》的报告，

对已从中国取得的权益仍不满足，决定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率领增调的援军扩大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接受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璞鼎查来华后率军一路北上，8月下旬攻陷厦门；9月下旬再占定海。清军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官兵顽强抵御，激战6昼夜，因援兵不至，先后阵亡。10月中旬，英军又接连攻占镇海和宁波。浙江三城连失，迫使清政府从江苏、湖北、江西、安徽、河南、甘肃、陕西、四川等省调兵遣将，组织反抗。道光皇帝派协办大学士奕经到浙江应战。奕经同奕山一样腐败无能，对如何与英军作战并无认真部署。1842年3月，清军集中1.2万官兵和义勇、水勇2万余名，总计约4万人，自绍兴分兵三路向定海、镇海、宁波进发，企图一举收复三城，结果因英军预有准备，加之兵力分散，大败而回，从此不敢再战。浙东反攻，是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所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斯役失败，使道光皇帝战胜敌人的信心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从此便由主战转向求和。清廷派盛京将军耆英和已经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向英军求和，英军不予理睬。5月，英军攻占位于杭州湾之北的军事重镇乍浦。6月，从印度派来增援的一万多英军陆续到达中国江浙沿海，英军便对吴淞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江南提督、年近七十的老将陈化成率军苦战，全身8处受伤，血流如注，仍坚持作战，力竭牺牲，7月，英军溯长江而上，攻占镇江。8月4日，英国舰队开到南京城仪凤门外草鞋峡江面集结，扬言要炮轰南京城。清廷在英军炮口的威胁下，终于完全屈服。8月29日，耆英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登上英舰“皋华丽”号，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又于1843年10月签订了《虎门条约》。在此情况下，美国、法国也趁火打劫，跟着向清政府索取特权，于是又相继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从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等遭到严重损害，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鸦片战争成为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折点。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清王朝充军到新疆，三年后被赦回，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1850年，在去广西赴任途中病逝，终年66岁。直到临终前，这位抗英民族英雄还在协助编录《平夷十六策》、《破逆志》等书，以望为后人留下抵抗外国侵略的“百战百胜之长策”，表现了他的一片耿耿爱国之心。

（2）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原以为能在中国开辟一个新的庞大的市场，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受到很大限制，它们的欲望并未完全实现。1856年3月，英、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而此时，太平天国农民武装起义正席卷半个中国，清政府忙于镇压起义军被搞得焦头烂额。于是，因经济迅速发展而急于扩大市场的英国和法国，便同美、俄相勾结，乘机向中国发动了新的武装进攻。这次战争因其目的在于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殖民特权，故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从“修约”的要挟到“亚罗”号事件。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随即，英国联合法国、美国，借口《望厦条约》中有12年可以修约的规

定，多次向清政府提出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进行全面修改的要求，实际上是要签订新的内容更加广泛的不平等条约，攫取更多的在华特权。在修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后，它们便决定诉诸武力，迫使清王朝就范。

为了给发动侵华战争寻找借口，英国处心积虑地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8日，广州水师官兵到停泊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码头的“亚罗”号船上搜捕海盗和鸦片。该船本是一艘中国船，但为走私方便，曾在香港买了一张为期一年的船籍执照，且这时执照已逾期失效。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亚罗”号受英国“保护”，蓄意扩大事态，先是要求中国方面道歉，继而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不满足其要求，即攻打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了英方的无理要求。1856年10月23日，英军突然闯入珠江，炮击广州，并一度冲进广州城内，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合谋组织侵华联军。为了扩大侵华战争，以巴麦尊为首相的英国政府于1857年3月强行通过了增加军援和增援远东军的提案，并决定派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统率一支海军开赴中国。同时，向法、美、俄等国发出照会，约其联合出兵。法国与英国一拍即合，以天主教神甫马赖于1856年2月在广西西林县因违法犯罪被处死一事为借口，决定派葛罗为全权公使，统率一支侵略军，加入侵华战争。处于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因国内局势不稳，未能出兵，但令其驻华公使列卫廉同英、法密切配合。刚刚在克里米亚战场上与英、法兵戎相见的俄国，为迫使清王朝满足其对中国领土的要求，此时也决定与英、法携手，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为驻华特使，与英、法联合行动。1857年11月，额尔金、葛罗、列卫廉，普提雅廷会聚香港，决定英、法发动军事进攻，4国在外交上行动一致。就这样，在共同的侵略利益的旗帜下，英、法、美、俄结成了一条侵华联合战线。

英法联军第一次北犯。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集中32艘舰艇的100余门大炮，同时轰击广州，持续达27小时之久。广州军民奋起还击，同联军血战。29日，联军占领广州。1858年1月，叶名琛为联军俘获，押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4月9日绝食而死。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额尔金、葛罗看到清政府未能就范，决定率联合舰队北上，把战火引向北中国沿海。1858年4月，英、法舰队沿南海、东海、黄海进入渤海，到达大沽口外，美、俄公使也率兵船随同北上。4月20日，4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齐，随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代表大臣在北京或天津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在6天内作出明确答复，否则便要采取军事行动。聚集在大沽口外的英、法军舰在做好攻击准备后，即于5月10日向大沽炮台发起进攻。炮台守军与联军艰苦鏖战，使联军付出了重大代价，仅英军就死伤近90人。由于孤军作战，两岸炮台相继陷落。26日，联军炮艇沿白河而上，直逼天津城下。咸丰皇帝无奈，只得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到天津议和，全部接受了4国的要求，分别于6月13、18、26、27日，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这是继《南京条约》之后，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法联军第二次北犯。《天津条约》签订后，清廷在加强天津沿海防务的同时，希望利用在沪与英、法谈判修改税则之机，对条约内容作某些修改。英、法政府却认为：“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同意”，想利用在北京换约之机，武装进京，以武力向中国勒索更多的权益。1859年6月，

英新任驻华公使，额尔金之弟普鲁斯，在上海同法、美公使就此进行了密谋。于是，英、法联军开始第二次北犯。

1859年6月17日，侵华英军海军司令贺布率领联军舰队抵达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强行要求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换约，清政府只同意从北塘登岸，由天津进京。于是，联军决定以武力在大沽打开进京通道。这时，在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督率下，大沽口的防御已大大增加，炮台增至6座，新安大炮60门，驻兵4000余人；另在距天津30余里的双港新筑炮台13座，安炮81门，并在大沽附近的新城、新河、草头沽等处驻军2000名，以便随时增援。25日，联军炮艇13艘驶入海口，先是拆除障碍物，继以密集炮火轰击大沽南北各炮台。在僧格林沁指挥下，守军以既准又狠的炮火向联军战舰猛烈还击。联军旗舰舰长被击毙，舰队司令贺布也受伤，“茶隼号”和“庇护号”被击沉，其余参战舰艇均被击伤。当天下午，联军1500多人强行登陆，守军凭借事先挖好的工事，火炮、抬枪、鸟枪齐发，打得联军死伤狼籍，指挥官勒蒙也身负重伤，最后只得狼狈退却。这次大沽战斗，英军亡89人，伤345人；法军参战60人，死伤14人，骄横的联军第一次受到重创。7月间，英、法公使终于带着被打败的联军，灰溜溜地南逃了。

英法联军第三次北犯。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英、法，朝野震动，英、法政府决计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1860年春，两国陆续从国内和各殖民地调遣了2.5万陆海军部队，由英国陆军中将格兰特、法国陆军中将托班率领，分乘206艘舰船，第三次北犯。

1860年4月，联军占领舟山，随即又占领大连、烟台，封锁了渤海湾。清廷只顾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英、法增兵前来报复未认真加强防务。8月初，联军乘虚在北塘口登陆，继而攻占北塘镇、新河、军粮城、塘沽。21日，联军集中炮火。轰击大沽北岸炮台，守军大部牺牲。北岸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下令撤走天津的全部军队，僧格林沁也逃至通州。24日，联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天津。清廷急令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赴津议和。几经谈判破裂，联军又连陷张家湾、八里营，进逼京城。此时，方寸已乱的咸丰皇帝急忙带了少数眷属臣僚，仓皇逃往热河。10月6日，联军经补充了弹药和物资，向德胜门、安定门逼近，随后直趋西北，攻占了圆明园。圆明园是清朝几代皇帝集中大批人力、物力、财力，经150多年精心建造而成的宏伟秀丽的园林，被称为“万园之园”。联军闯进后，先是军官们分批进去抢劫，随后下令允许“自由抢劫”。在无数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被狂抢后，英军头目额尔金在本国政府支持下，下令焚毁圆明园，把这座稀世园林变为一片瓦砾场。在英、法武力的威逼下，10月24日、25日，清政府与两国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又签订了《北京条约》。11月，联军先后撤出京津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遂告结束。

这次鸦片战争历时4年。腐败的清王朝采取以抚为主的错误方针，同英法联军时谈时打，最后只得全部满足侵略者的种种无理要求，在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带来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为严重的后果。

2. 太平天国战争

鸦片战争后，旧的封建压迫加上新的资本主义侵略，使中国原已尖锐的

阶级矛盾和外侮日逼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迫使广大群众走上反抗的道路。1851年1月，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这场战争历时15年，遍及18省，不仅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且勇敢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揭开了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序幕。在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和推动下，各族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形成了清代后期人民革命战争的第一个高潮。

（1）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

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是一个出身于广东花县农民家庭的贫苦知识分子。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外国的侵略欺侮和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加上科场失意，决心走上反抗的道路。1843年，他与冯云山共同创立了“拜上帝会”的秘密组织。此后，他们长途跋涉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等地宣传和组织群众，两年多后即吸收了二三千会众，并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

1850年夏天，广西发生大饥荒，天地会组织纷纷暴动。洪秀全认为起义时机日益成熟，便于7月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到桂平县金田村“团营”，即集中结营组军。同年底，前来“团营”的达2万余人。洪秀全等人抓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举起了反清夺权的义旗。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洪秀全即挥师东向，夺占广西浔江边的大湟江口（今江口镇）。不久，又接受了天地会部众2000余人，声势更加壮大。咸丰皇帝得知后，下令“聚集精兵全力围剿”，企图乘太平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其歼灭。太平军向东南方向发展受阻，在桂平、武宣、象州转战大半年之久。9月，在平南县官村大败清军，乘胜占领了永安州城。在这里，洪秀全下诏分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皆受东王节制。这样，太平天国政权便初具规模。

这时，清廷命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军4万余人围攻永安。太平军于1852年4月冒雨突围，在龙察岭大峒山谷地以重兵设伏，杀清总兵4人及兵丁二三千人。随后，北上攻打桂林未克，即改向湖南进军，先破兴安、全州，继占道州。在道州，一边进行休整，一边就下一步的进军方向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循江而东，避实就虚，进军湘鄂，“专意金陵”。明确了战略进攻方向后，太平军即于8月放弃道州东进，过湘水西上，12月占领益阳、岳州，随即水陆并进，直趋武昌。武昌城虽然内有4千余清军固守，外有向荣所率的万余援军，但最终还是于1853年1月被太平军攻破。这时，太平军已成为一支由陆营、水营、土营组成的能攻克坚城的50万人的军队。

经过短期休整后，太平军于2月撤出武汉，顺江东下，接连攻克九江、安庆、池州、铜陵、芜湖等重镇，不到一个月就长驱1200多里，直抵金陵城下。金陵时称江宁，是江南的名城大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太平军兵临城下，守城清军一片恐慌。在完成了对金陵的包围后，太平军，于3月19日用火药炸塌仪凤门附近城墙，攻入城内，杀死两江总督陆建瀛、江宁将军祥厚等。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改金陵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建立起了与清廷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自金田起义至定都天京，太平军在两年又三个月中转战6省，所向无敌，实现了“专意金陵”的决策。这一段是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大发展时期。在向武昌进军之前，太平军“略城堡，舍要害”，弃地不守是必要的；但由武昌东下后，

对所得各地一概弃之不守，不注意保持对长江上游要害城镇的控制，则是战略指导上的一个很大失策。

（2）北伐之战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企图在拱卫京都的同时，迅速攻克北京，夺取皖、赣、湘、鄂等要地，一举消灭清王朝，因而在军事上采取了同时分兵北伐与西征的方略。

1853年5月上旬，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和春官正丞相吉文元奉命率领一支由2万多人组成的劲旅，由浦口开始北伐。根据洪秀全“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的要求，北伐军一路长驱北进，由安徽入河南，攻破归德（今商丘），西逼开封。由于沿途大量捻党和贫苦群众参军，军势更盛。7月初，主力渡过黄河，进围怀庆府（今沁阳），与清军相持两月。后撤围入山西，进至平阳（今临汾）、洪洞一带。清廷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将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谁知北伐军自洪洞转而向东，复入河南，经涉县、武安、临名关、攻入直隶，占领任县、赵州（今赵县）等地。北伐军原想经保定进攻北京，因清廷急派重兵屯驻涿州（今涿县），即改向天津进攻，于10月29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独流。由于清廷援军赶到，北伐军未能实现攻占天津的计划，便在静海、独流驻扎下来；一边报告天京，请求增援；一边筑城挖壕，就地坚守，从此由原来的主动作战转入了防御。当时，由钦差大臣胜保率领的2万余清军，已分别对静海、独流形成包围，并依仗优势的武器和充足的给养，企图一举消灭北伐军。林凤祥、李开芳率军顽强抵抗，使清军久攻不下。清廷又令僧格林沁移军前线，加上胜保军计3万余众，合力围攻。这时，天气转冷，陷入重围的北伐军久等援军不至，粮尽衣单，兵力大受损耗，处境非常危急，只得于1854年2月突围南走，在阜城又被包围。这时清廷命胜保率万余清军赴山东堵击北伐援军，一时减轻了对阜城的压力，使北伐军得以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

1854年2月，天京终于派出了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等率领的7500人的北伐援军。3月，援军攻占距阜城仅200余里的山东临清城。但由于当时领导层某些成员贪生怕死，援军非但没有继续北上，反而向南撤退，结果在清军的追击和地主武装的袭击下，反倒先于北伐军覆灭了。

1854年5月，北伐军由阜城向东突围，占领东光县的连镇。为牵制清军，李开芳率600余人再次由连镇突围，进入山东境内，占领高唐。留守连镇的六七千太平军，在数倍清军的严密围困下，忍着饥饿和寒冷，坚持斗争了三个月。1855年3月，营地被攻破，太平军大部阵亡。林凤祥因伤被俘，押送北京，慷慨就义。连镇既陷，清军全力进攻高唐。李开芳率部突围，进至在平县冯官屯。僧格林沁引运河水灌屯，营垒被攻破，北伐军将士大部战死。李开芳被俘，解送北京，被凌迟处死。北伐终于失败了。

北伐军及其援军的覆没，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所遭到的最严重的挫折。在天国政权刚刚建立，当务之急是要打破清军对天京的围困，形成以天京为中心的巩固的根据地的情况下，洪秀全匆忙抽出太平军主力北伐，远离后方作战，终致失败，这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战略上的重大失策。所以，李秀成说：“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但是，

北伐军孤军远战，历时两年，纵横6省，深入到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不仅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扩大了太平天国的影响，推动了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而且牵制了数万清军，减轻了天京周围和西征战场的军事压力。

（3）西征之战及回救天京

为夺取和控制武汉、九江、安庆等长江上游的要地，以屏蔽天京，太平军开始北伐的同时，即于1853年6月初，派遣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步军二三万、战船千余艘，由天京溯江西征。

西征军出师后，先克重镇安庆，继围南昌，与清军相持3个月，被迫于9月撤离。南昌撤围后，西征军即兵分两路：一路由国宗石祥祜统领，西取湖北；一路由胡以晃和检点曾天养统领，向皖北进攻。

石祥祜所率太平军先占九江、半壁山，然后集中兵力，一举攻克进入湖北的水陆门户田家镇，乘胜连下蕲州、黄州（今黄冈），第二次攻占武汉。随后，为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主力转向皖北。

胡以晃、曾天养所率太平军在进军皖北过程中，于11月攻占桐城、舒城；12月又攻占安徽省城庐州（今合肥市）。此后，皖北即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和粮饷来源。1854年1月，太平军以胜利之师向湖北进军，在黄州以北的堵城大败清军，杀湖广总督吴文熔、总兵德亮、知府蔡润深等。2月，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阳，进攻武昌。同时，又兵分南北两路，向湖南、鄂北进攻。北路军万余人在曾天养的率领下，于三四月间连克湖北、孝感、云梦、荆门等地，后在荆州、宜昌一带转战，因遇清军堵截，便南下湖南，打算与南路太平军会师。

南路太平军2万余人，由石祥祜和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指挥，于1854年春挺进湖南，随即遇到了由清廷礼部右侍郎曾国藩组建的湘军的顽抗。太平军先后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4月24日又攻克湘潭，准备围攻长沙。4月28日，曾国藩亲自率领水师5营、陆勇800人，由长沙进袭靖港。太平军以猛烈炮火进行轰击，击伤指挥船，继而出动200余只小划船，对湘军水师发起攻击，给其以重创。曾国藩羞愧交加，两次投水自杀，被随从救起。这时，驻湘潭的太平军与湘军激战，伤亡很大。5月1日，湘潭陷落，太平军只得分道撤退。湘潭之败，对西征战局影响甚大，太平军自此被迫转入退却，无力再向湖南等地发展。6月，曾天养得知南路军在湘潭失利，率北路军自宜昌南下，与林绍璋会师于常德，后退守岳州。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在曾国藩的率领下，于1854年7月又以两万之众北上进攻。7月25日，曾天养被迫率部退守临湘。为夺回岳州，西征军曾几次组织反攻，胜少败多，在8月11日的战斗中，年近花甲、夙有“虎头军”之称的老将曾天养单骑冲入敌阵，英勇牺牲。西征军失利，撤往武昌，湘军水陆跟进，发动进攻，10月武昌失守。12月，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突破，西征军损失近万艘船只，处境十分不利。曾国藩一时名声大噪，声称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为了扭转被动局势，石达开奉命率军西援，在湖口坐镇指挥。太平军针对湘军“将士皆骄”、求胜心切的心理，坚壁固守，与敌相持。曾国藩见攻九江不下，便改攻湖口。1855年1月29日，湘军进攻湖口梅家洲，其中水师一部贸然冲入鄱阳湖内。太平军抓住战机，用浮桥、垒卡堵死其出路，湘军水师的“轻捷之船”和“精健之卒。”被封锁于湖内，笨重的大船则被隔

绝在外江，顿使其失去优势。当夜，太平军发动进攻，烧毁大船 40 余只，湘军水师败退。2 月 11 日夜，九江和小池口的太平军利用夜色掩护，以轻舟百余只，再次突袭湘军水师，烧毁战船 100 多艘，并缴获曾国藩的坐船。曾国藩事先坐小船逃走，后再次投水未成，逃往南昌。湖口、九江大捷后，太平军乘胜进行全面反攻，由湖北转江西，攻城略地，浴血奋战，先后占领了九江、武汉等数十座城镇，以及皖、鄂、赣 3 省的部分地区，使西征战场转败为胜。

西征战场形势转好之时，天京附近的清军却加紧了进攻，形势日趋严重。早在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不久，清廷即派钦差大臣向荣率军在城东孝陵卫建立起江南大营；派钦差大臣琦善在扬州建立起江北大营，经常威胁天京。1855 年，清军先后攻占天京西翼重镇芜湖及皖北重镇庐州，同时加紧了对天京下游咽喉要地镇江的围攻。1856 年初，冬官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奉命率数万太平军自皖西返回天京，东援镇江。4 月，同镇江守军一起，大败清军，连破敌营 16 座，径抵镇江，又败虹桥、朴树湾、三河汊之敌，破敌营 130 余座；接着乘虚占领扬州，一举摧毁了经营 3 年之久的清军江北大营。在东援镇江的同时，石达开率军于 5 月攻克芜湖，进攻秣陵关，威迫清军江南大营。6 月，令其南路部队攻占溧水，诱使向荣分兵前往堵截。这时，东王杨秀清见天京附近清军兵力空虚，严令正要回京的陈玉成、李秀成率部进攻江南大营。6 月 20 日，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孝陵卫大营被攻破，清军死伤副将以下千余人，向荣等败走淳化镇，江南大营亦被彻底摧毁。太平军集中主力，一举拔掉了威胁天京安全的这两个钉子，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这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4）天京变乱后的防御作战及太平天国的失败

1856 年，正当太平天国政权再次出现有利形势时，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却空前尖锐起来。8 月 22 日，杨秀清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佯为答应，暗中却密诏在江西前线的韦昌辉和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韦昌辉于 9 月 1 日深夜返回后，次日凌晨杀害杨秀清及其一家，接着又大肆杀害其部属，使两万多人罹难，独揽了军政大权。9 月中旬，石达开回到天京，斥责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想加害于他，石达开闻讯连夜出逃，其妻子儿女均被韦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 4 万大军，准备回京讨韦。11 月 2 日，洪秀全依靠广大军民的力量镇压了韦昌辉及其同伙，令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回天京执政后，得到广大军民的拥护，但洪秀全不信任他，甚至有图害之意。石达开恐遭暗算，便于 1857 年 6 月从天京出走，并带走一二十万精兵。后远征西南，孤军作战，军心涣散，终于在 1863 年 6 月在四川大渡河畔彻底失败。石达开被围后投降清军，最后被凌迟处死。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和分裂，成了这次农民战争由胜利发展走向衰落失败的转折点。清军迅速从东西几个战场进行反扑，太平军在军事上从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整个战局急剧逆转。在 1856 和 1857 两年中，清军连克武昌、汉阳、湖口、九江、扬州、镇江、瓜州等天京上下游重镇，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再度围困天京。太平军在苏、皖、赣、鄂所占有的州县大部被迫放弃，统治地区大为缩小。

面对严峻的形势，洪秀全首先恢复了五军主将制度，重建了军事领导核心。1858 年 10 月，任命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陈玉成为前军主将兼

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后军主将兼副掌率，李世贤、韦俊分别为左右军主将。次年，封其族弟、具有改革思想的洪仁玕为干王、军师，总理政事，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此后，才能出众、屡立战功的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即成为后期太平军的统帅。

为破天京之围，稳定战局，李秀成、陈玉成于1858年8月在安徽枞阳镇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攻击江北大营的方案。诸路将领“各誓一心，订约会战”。会后，陈玉成率军由舒城出发，9月，与李秀成部在乌衣会师，并接连取得歼灭德兴阿部三四千人和由江南大营派来增援的总兵冯子材部5000人的胜利。随即挺进浦口，一举攻破江北大营，歼敌1万余人，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联系。在太平军进攻江北大营的时候，湘军李续宾部攻陷九江等地，10月，进犯水陆要冲、太平军军需物资供应基地三河镇。陈玉成、李秀成奉命率军西援，以优势兵力四面环攻，击毙湘军统帅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等，全歼湘军6000余人，使湘军4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浦口、三河两大战役后，太平军在江西、安徽的其他战场上也陆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而基本扭转了天京变乱后在军事上形成的危局。太平军在取得浦口、三河战役胜利后，又于1860年初作出了二破江南大营的决策。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采用声东击西、攻其必救的策略，首先奔袭作为清政府财赋之区的湖、杭二州，诱迫江南大营分兵，然后乘隙反攻，与天京守军合击江南大营。2月，李秀成率主力入浙，攻克省城杭州。在得知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派出1.3万清军前来救援时，便撤出杭州，回师天京。5月2日，在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太平军集中10万大军向江南大营发起总攻，歼敌数万人，和春率残部败退镇江。经此一战，江南大营再也未能复建。天京解围后，陈玉成、李秀成乘胜率军东进，以破竹之势，连克苏南、浙西许多州县，整个苏浙地区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的东部屏障和物资供应地。

正当太平军东进苏浙之时，湘军乘机加紧了对安庆的围攻。此时，曾国藩已被清政府任命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各。他决心全力攻占作为天京锁钥的安庆，然而顺江而下，进攻天京。为救援安庆，洪秀全决定派陈玉成、李秀成分别沿长江两岸西征，以会师武昌，攻取湘军的这一后方重镇，达到解围安庆的目的。结果因李秀成部未能如期西进，使这一计划流产。湘军无后顾之忧，便全力围攻安庆。从1861年4月至9月的半年多时间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辅王杨辅清分别率部来援，几次与湘军大战，未能取胜。9月5日，湘军以地雷轰塌安庆城墙，攻入城内，守将吴定彩等1.6万多人英勇战死，太平天国占领达9年的安庆终于陷落。此后，整个江北根据地也接着丢失。当安庆激战时，正在鄂南、赣北的李秀成拒绝前往救援。陈玉成在安庆失守后退守庐州，1862年5月遭湘军围攻，在突围的路上被地方团练诱捕，6月4日被杀害于河南延津，年仅26岁。

《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公开与英、法两国相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对镇压有功的曾国藩也更加倚重，命其统辖苏、皖、浙、赣4省军务。曾国藩对以东征金陵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行动作了进一步筹划，决定以主要兵力进攻天京；另派左宗棠、李鸿章分别率军进攻太平军的江浙根据地。各地太平军在清军的全面进攻下节节后退。1862年5月，曾国藩指挥水陆师完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正在进攻上海的李秀成奉命回援。10月，李秀成督率13王，领兵10余万，猛攻雨花台曾国荃军营，激战月余不下，只得

撤退。12月，遵照洪秀全“进兵北行”的指令，李秀成部进军皖北，企图调动江南之敌北援，下游之敌上援，从而解天京之围。结果一路受挫，损失数万人，只得折还，于是长江北岸完全被清军占领。在苏、浙战场，英、法侵略军与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相继组成“常捷军”、“常胜军”，向太平军进犯，受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和少数将领的叛变，苏州、无锡、常州相继失陷，浙江也基本为湘军占领。

湘军先后夺占了天京外围各地，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形势万分危急。1863年12月，李秀成提出“让城出走”，以保存力量，再图发展，遭到洪秀全的严厉斥责。1864年3月，曾国藩部对天京形成合围。6月，洪秀全病逝，时年五十岁，长子洪天贵福继位。7月，湘军攻陷天京，城内太平军将士或战死，或聚众自焚，无一降者。9月，幼天王和干王洪仁玕先后在南昌被杀害。临刑前，洪仁玕写下《绝命辞》，他仰天长歌：“英雄正气存，有如虹辉煌；思量今与昔，忿然挺胸膛。”“我今虽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李秀成从天京逃出后不久即被俘，在写下供词之后被处死。

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但分散在长江南北各地的太平军余部仍在坚持斗争，直到1863年才以失败而告结束。太平天国战争以其不屈的斗争和悲壮的历程，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3. 收复新疆失地之战

自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夺殖民地的新一轮斗争中，向中国发动了又一次侵略浪潮，中国边疆地区普遍受到侵扰，其中最早点起狼烟的则是西部边疆。

（1）西部边疆危机和清廷西征的决策

1864年6月，中亚浩罕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新疆上层封建主割据纷争、局面混乱之际，率军侵入新疆，占领了全部南疆和部分北疆地区。1867年，阿古柏成立了“哲德沙尔国”，自封为汗，并豢养了一支包括骑兵、步兵和炮兵的五六万人的武装。当时，俄国、英国都急于向中亚扩张，因而对阿古柏政权竭力笼络和扶持，但阿古柏一开始便倒向英国，俄国对此十分不快。1871年，早就对新疆垂涎欲滴的俄国当局悍然出兵占领了伊犁，并设官置戍，企图永远霸占。

新疆大片土地丢失，使清廷极为震惊。开始曾派大臣同俄国谈判，但毫无结果。清政府从事实中认识到，面对骄横的俄国，空言无济，唯有用兵。然而正当此时，日本于1874年5月出兵侵占台湾，东部海疆亦烽烟突起。清廷内部出现了“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李鸿章等人主张以海防为重，塞防为轻，反对用兵新疆，以移塞防之款济海防。晚清重臣左宗棠等则力主“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新疆军务。

左宗棠虽曾镇压过太平军和陕甘回民起义，但他一贯坚决反对外国侵略。面对兵疲、饷蚀、粮乏、运艰等种种困难，他不顾年老体弱，毅然白发临边，肩负起率兵西征新疆的重任。根据新疆远离内地、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和当时的敌情，左宗棠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

正确作战方针。在做好筹措军粮和饷银、解决运输、整顿军队、改进武器装备等准备工作之后，他任命总理行营营务西宁道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指挥7万清军，开始了收复新疆的战斗。

（2）进军北疆

清军向阿古柏防守较弱的北疆进军，首要目标是攻占乌鲁木齐。1876年7月底至8月中旬，刘锦棠等率部先后攻克了阜康城、黄田，在古牧地（今米泉），歼敌五六千人，扫清了乌鲁木齐外围。接着，乘胜向乌城发起攻击，敌不战而溃，收复了北疆重镇乌鲁木齐及昌吉、呼图壁。9月2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率部攻打玛纳斯南城。守敌十分顽固，清军攻而复退，退而复攻，付出很大代价。后刘锦棠派部前来助攻，终将此城攻破。这场攻坚战历时两月，歼敌3000余人。至此，除伊犁尚为俄国占领外，北疆全部为清军收复。这样，就使西征有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3）收复南疆八城

1877年4月，经过一段休整的清军突然越岭南下，发起了吐鲁番战役。阿古柏在吐鲁番集结了3万多兵力，并派重兵把守吐鲁番西北的重要据点达坂城。4月19日，刘锦棠率部攻打达坂，全歼守敌4000人，活捉其大总管。26日，清军合兵进攻吐鲁番，阿古柏的部将马人得开城投降。接着，又一举收复托克逊。吐鲁番既失，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4月在库尔勒服毒自杀，白彦虎接替了库尔勒的防务。

正当左宗棠准备进攻南疆八城、彻底追歼阿古柏的残部时，英国出面干涉，建议让阿古柏之子交出南路东部4城，保留西部4城，仍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清廷一些大臣也责备西征耗费过多，主张在天山南北息兵划界。左宗棠明确表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对攻打南疆8城作了周密部署。

1877年8月，刘锦棠率部攻打东4城，很快攻下库尔勒，白彦虎裹胁难民拼命西窜。清军一边追赶，一边作战，历时1个月，长驱3千里，又收复了拜城、阿克苏和乌什，救出了大量各族群众。然后，兵分3路，连下喀什噶尔、叶儿羌、英吉沙尔及和阗。攻打西4城之战，毙俘敌1万余人，捉拿阿古柏军大小头目1千余人，缴获大炮1百余门，战马万余匹。此8城的收复，使被阿古柏统治了13年之久的南疆地区重又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阿古柏被击败后，清政府命左宗棠统筹战守，积极准备收复伊犁。1880年5月，在做好准备之后，年近7旬的左宗棠叫士兵抬着他的棺木同行，决心亲临前线，收复伊犁，使新疆失地全部回归祖国。但是，清廷在国内外妥协势力诱迫下，动摇了用武力收回伊犁的决心，于8月召回左宗棠。次年2月，在经过长期谈判后，中俄签订了《伊犁改订条约》，俄国终于归还了伊犁地区，但中国却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领土。

4. 中法战争

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就侵入了中国的南方邻邦越南。为了扩张自己在远东的利益，70年代初，法国决计侵占全越南，并以其为基地，进而侵略中国。中法之间这种矛盾的激化，终于在1883年引发了一场战争，史称中法战争。

（1）黑旗军援越抗法

1873年11月，已经侵占了越南南方三省的法国，又派军队向北进攻，在1个月中连占北圻、河内、海阳、南定等城。面对法军的强烈攻势，越南国王邀请驻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老街）地区的黑旗军助战。

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本是活动在粤桂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由于受清军逼迫，于1867年辗转进入越南国境，逐渐发展成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因其以7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1873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西郊大败法军，斩其头目安邨。越王封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允许黑旗军驻扎在红河上游的宣光、光化、山西三省。1882年3月，法军上校李威利率军数千，再次溯红河向上游进犯。刘永福应越南政府要求，率军继续参战。5月19日，黑旗军在河内城西的纸桥与法军展开激战。击毙法军统帅李威利，法军败退河内。越王又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一等义勇男爵”。

1882年5月，法国决定继续扩大对越南的侵略。8月，法军一路在沿红河进攻黑旗军的同时，另一路攻入越南首都顺化，迫使越南政府同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使其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国西南边疆岌岌可危。鉴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应越南政府的邀请，清政府从1882年至1883年，陆续抽调1万多名军队驻扎在越南北部的山西、北宁等地。《顺化条约》签订后，法国先是施加军事压力，企图迫使清政府撤退驻扎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承认其对越南的占领，当其要求被拒绝后，便决定诉诸武力。1883年12月，法国政府任命孤拔为远征军司令，向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2）法军攻占山西、北宁

1883年12月14日，法军5000人在孤拔的指挥下，向红河上游的战略要地山西城发动进攻。清军和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顽强抗击，血战3昼夜，在消灭法军近千人后终于失利，山西为法军占领。1884年2月，法军增至1.7万人，由陆军少将米乐接替孤拔为远征军司令。3月，法军连陷北宁、太原、兴化等地，全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

战前，清廷内部就弥漫着妥协的气氛。山西、北宁失利后，主和派势力抬头，清政府无心整军经武，继续抵抗，于是派主和派首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诺在天津谈判。5月11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将越南北部的清军撤回边界。

（3）战争扩大与清廷宣战

《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立即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军防地。6月，米乐派遣陆军中校杜森尼率军向谅山前进。当法军到达观音桥（今北黎）附近时，谅山清军因尚未接到撤防命令，派代表向法军解释。法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并发起攻击。清军被迫还击，将法军打退。法国政府随即以观音桥事件为借口，部署向中国本土进攻。7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强行驶进福建马尾港。8月，进犯台湾基隆，为守军击退。

法军进攻基隆失败后，将舰队主力集中到马尾港，控制了闽江口。马尾

是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军、商港口，清政府在此设立了全国最大的福州造船厂，这里又是福建水师的基地，法国对其早有夺占之意。8月23日，法舰发动突然袭击，用大炮、水雷轰击中国军舰。福建水师仓促还击，11艘舰艇被全部击沉，损失商船19只，死难士兵700余人。24日，法军又炮击福州造船厂，使船厂受到严重破坏。

马江惨败，打破了清廷的幻想。1884年8月26日，清政府下诏对法宣战，并确定了在东南沿海加强防御、在陆路北圻战场组织反攻的作战方针。

（4）镇南关大捷和不败而败的战争结局

法军偷袭马江成功后，集中兵力进攻台湾。1884年10月初，孤拔将舰队分为两部，向基隆和淡水同时发动进攻。清军放弃基隆力保淡水，法军屡攻淡水不下，伤亡惨重。孤拔见攻基隆受阻、攻淡水失败，便率20多艘军舰封锁台湾所有海口，企图使台湾因得不到内地支援而不攻自破。但是，福建、广东、上海等地军民千方百计打破法军封锁，向台湾运送军械、饷银和兵员。台湾军民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使法军夺占台湾的目的未能实现。1885年1月，孤拔率舰队北上进攻浙东门户镇海。清军官兵凭借坚固防御，打败法舰3次进攻重伤其旗舰，孤拔被击伤，不久死于澎湖。3月底，法军攻占了澎湖。

当东南沿海在抗击法军进攻的同时，清军的陆路战场亦在越南北部分东西两线进行。东线清军越过谅山、谷松，进抵郎甲、船头等地；西线清军与黑旗军联合作战，于1884年10月前进到宣光一带，准备攻占宣光。法军为了达到威慑清廷的目的，决定在西线取守势，东线取攻势。1885年2月，得到增援的法军在东线发动猛烈进攻，清军节节败退，法军很快攻陷战略要地谅山，又占文渊城，一度闯入镇南关（今友谊关），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境内。

正当广西震动、边关危急之时，在军中素有声望、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被清政府任命为关外军务帮办，指挥前敌诸军，率部增援东路清军。他根据镇南关地形险要的特点，修筑长墙作为防御工事，并集中了约80营的兵力，形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1885年3月23日，法军第2旅司令尼格里率军分3路猛攻长墙。冯子材坐镇壕墙，沉着指挥。当法军逼近长墙时，他手持倭刀大吼一声，跳出战壕，将士们随主帅一齐冲向敌阵，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法军三面被围，死伤甚众，只得狼狈败退。镇南关大捷，歼灭法军精锐近千人，不仅使东线清军反败为胜，整个中法战争的战局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后，冯子材乘胜挥师南下，很快收复了文渊、谅山、郎甲、船头等地。这时，西线清军和黑旗军也取得了临洮大捷，连克数十州县。东西线清军连战皆捷，越南北部抗法战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法军在镇南关等地的惨败，导致了法国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于是法国政府不得不加紧了与清政府的谈判。正当中国军队掌握战场主动权，准备把法军赶出越南北部之际，清政府却于1885年4月4日与法国在巴黎签订了停战协定，承认了《中法简明条约》，并于4月6日下令从越南撤军，满足了法国在战前提出的要求。在中法战争中，作为战败国的法国反而得到了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这种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的结局，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5. 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的结局，使其更加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主要对象。1894年，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日本，为从对外扩张中寻求摆脱国内危机的出路，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因该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故通常把这次战争称作中日甲午战争。

（1）丰岛海战与中日宣战

早在明治政权成立之初，日本政府就制定了一个用武力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所谓“大陆政策”，其中特别是把进攻朝鲜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跳板。为此，日本在军事上进行了长期准备。1890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为了摆脱困境，日本政府决计发动侵略战争，于是便进一步加速了战争准备的步伐。

1894年初，朝鲜爆发了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由于朝鲜同中国存在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国王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实现其“征韩侵华”目标的大好时机，竭力鼓动清廷出兵朝鲜，以便为自己出兵侵朝提供借口。6月，清政府派出2500名淮军，进驻朝鲜汉城南面的牙山县。早在清廷出兵之前，日本内阁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成立了作战指挥的最高机关大本营。自6月5日至13日，日军8000余人陆续在仁川登陆，迅速占领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日军剑拔弩张，其矛头显然指向清军。但清廷经管军事、外交工作的李鸿章不准备战守事宜却乞求俄、英、美、法等国出面调停；在碰壁后，又在同日本公使的谈判中要求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军，遭到日本拒绝。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成立了以大院君李昱应为首的傀儡政权，随即迫使其废除了同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

1894年7月，清政府决定增派1.4万清军由陆路开往平壤；另调天津练军2000多人，雇用英国商船运截，由清舰“广乙”、“济远”号护送，从海路增援牙山。日军探知这一情况，决定突袭中国舰船。7月25日，“济远”、“广乙”由牙山返舰回国，驶至牙山湾口附近的丰岛海域时，日军3艘快速巡洋舰突然向清舰开火，双方激战1个多小时。由于日舰在吨位、炮火、速度、兵员等方面占绝对优势，战至最后，“广乙”全船覆没，“济远”败逃。与此同时，日舰猛烈轰击挂有英国国旗的商用运兵船。清军英勇抵抗，900余人死难。同日，日军还从汉城南下，偷袭牙山清军。清军战败，退往平壤。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2）五次主要战役

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开始，至次年4月结束，其间经历了5次主要战役：

平壤战役。平壤为朝鲜旧都。日本挑战战争后，决定立即以分进合击方针攻取平壤。当时，清军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丰升阿4部先后到达平壤，与自牙山败退的叶志超部会合，计有1.7万人，由叶志超统领。叶志超庸懦惧敌，不积极备战，各军将领均不服调度，因此在平壤保卫战中实际上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

9月初，日军1.5万人分4路向平壤前进，15日发起总攻。清军分路抗

击，战斗十分激烈。东路马玉昆所部奋勇杀敌，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城南卫汝贵部阻止了日军数次进攻。北路左宝贵部拼力抗击，日军占领附近山头，居高临下进行炮击，旋即占领制高点牡丹台。左宝贵不顾伤痛，登城指挥，不幸中炮战死，玄武门失守。叶志超见北门失守，惧怕万分，举白旗乞降，下令撤军，弃平壤仓皇北逃。清军在溃退中被日军伏击而死者近 2000 人，被俘 500 余人。随后，又失安州、义州等要地，于 9 月底撤回中国境内。

平壤保卫战失败，使援朝清军人心沮丧，士气低落，而日军则乘胜北上，把战火烧至鸭绿江边。

黄海海战。为掌握黄海的制海权，掩护日后向中国的进攻，日军在攻占平壤后，便寻机在海上聚歼北洋舰队。9 月 17 日上午，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率 18 艘舰只护送清军至鸭绿江大东沟后返航，忽然同日海军中将伊东佑亨所率的 12 艘军舰相遇，随即命令起锚迎敌。一场激烈的中日海军主力决战，便在大鹿岛西南的黄海上开始了。

日舰驶近后，依仗其船速快的优势，以“吉野号”为先锋，用环形阵势包围北洋军队，同时以炮火猛击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扬威”两舰中弹起火，失去战斗力。随后，旗舰“定远号”桅楼被击毁，丁汝昌受伤。在舰队指挥失灵的情况下，清军各舰猛烈攻击日舰。“定远”、“镇远”等舰击中“松岛”旗舰炮塔，断其号旗之杆。“定远”、“靖远”、“广甲”、“来远”等舰密切协同，围攻日舰“比睿”、“赤城号”，将其重创，并击毙“赤城号”舰长坂元二郎太，两舰逃离战列。接着，日军以第一游击队置于北洋舰队正面，而本队则绕至背后，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但各舰仍士气振奋，不停地向日舰开炮。在激烈的战斗中，“致远”舰中弹较多，舰身倾斜下沉。邓世昌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准备冲击“吉野”，与敌同归于尽。“吉野”慌忙逃避，并连连施放水雷。“致远”舰中雷沉没，邓世昌等人落水，随从带救生圈跳入海中救他，邓世昌因全船俱没，义不独生，仍自沉而亡。全舰 250 多人壮烈牺牲。“经远”舰在 4 艘日舰的围攻下，依然沉着应战，最后被鱼雷击沉，管带林永升等全舰官兵战死。“济远”、“广甲”两舰贪生怕死，退出战斗。“镇远”、“定远”舰相互依恃，与敌激战，击中敌旗舰“松岛”和主力舰“吉野”。黄海海战进行了 5 个多小时，最后日本舰队先行败退，北洋舰队驶回旅顺。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 5 艘军舰，官兵伤亡千余人；日海军 5 舰受重伤，官兵亡 600 多人。此战日本虽未能聚歼北洋舰队，但掌握了黄海制海权，从而为下一步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登陆创造了条件。

辽东战役。日军攻占平壤、控制黄海制海权后，随即于 1894 年 10 月下旬分两路展开了向辽东半岛的进攻。其第一军采取“近而示之远”的战法，于 24 日以一部兵力在义州作渡江姿态，暗中则派精锐在九连城东北、位于朝鲜境内的水口镇徒涉渡江，绕攻虎山清军，从侧背攻击九连城。部署在鸭绿江一线 2.3 万清军，除防守虎山的聂士成、马金叙部进行了顽强抵抗外，其余皆不战而逃。仅 3 日时间，日军即轻而易举地突破了鸭绿江防线。随后，连占安东（今丹东）、凤凰城、长甸、海城等辽东重镇，向中国东北境内发展进攻。其目的在于牵制清军，掩护日第 2 军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也为以后进行直隶平原决战夺取前进基地。

在日第 1 军发起鸭绿江战斗的同时，10 月 23 日，陆军大将大山岩率第 2 军 2.4 万人，由 14 艘军舰护航，在辽东半岛东岸的花园口开始实施登陆作战。

清军在此地未曾设防，当后来得知日军登陆时，又没有采取任何应急措施，致使日军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顺利登陆。11月6日，日军攻破金州，大连清军官兵闻讯溃散，次日日军即兵不血刃占领了大连。17日，日军向旅顺发起进攻。总兵徐邦道率残军主动迎战，重创日军，后因兵力薄弱，又无后援而战败。22日，各炮台相继失守，于是清政府经营10多年、耗费巨额资金修建的旅顺口，遂被日军占领。

威海战役。位于山东半岛北岸东部的威海卫，北与旅顺口隔海相对，西与烟台互为犄角，是控制渤海海峡、拱卫京畿门户的锁钥之一，也是北洋舰队的两大海军基地之一。黄海海战后，清军尚有15艘军舰、12艘鱼雷艇停泊在威海港。旅顺既克，攻下威海、消灭北洋海军即成为日军的目標。

1895年1月20日，日军出动2万人，一路佯攻登州，一路在荣城县成山头登陆，直插威海卫背后；同时以军舰和鱼雷艇封锁威海卫港口。1月22日，清廷致电李鸿章：“闻敌人载兵，皆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舰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断其退路。此亦救急之策，着李鸿章速筹度为要。”在当时情况下，清廷的这一决策应当说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举措，但李鸿章、丁汝昌没有积极出战，以致南帮和北帮炮台先后失陷，日本陆、海军遂将北洋海军包围。在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严词拒绝日军的劝降，但他仍株守港内，不突围转移。从2月5日开始，日军一边用鱼雷艇潜入港内偷袭，一边用炮火轰击，“定远”、“威远”、“靖远”等舰先后被击沉，其余舰只弹药也将用尽。2月11日，丁汝昌见陆援和突围皆完全无望，便服毒自尽，以身殉国。14日，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选道员牛昶丙代表清军在投降条约上签字，将港内北洋舰队所剩全部舰只、炮台和军械弹药交给日军。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没。

山海关外战役。在日军攻取旅顺、威海卫时，其突破鸭绿江防线的第1军在占领九连城、安东、大东沟、凤凰城后，又连陷岫岩、海城。12月底，日第2军又陷盖平。清政府见淮军在前线作战连连失利，遂于1894年12月28日任命湘军首脑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山海关内外各军。1895年1月，刘坤一率湘军出关。这时关外各路清军约有8万人，是中日开战以来出兵最多的一次，也是清政府主战派的最后一试。从1月17日至2月24日，清军数万人5次反攻海城，皆为日军所败。1895年2月底，日第1、第2军分别向鞍山、牛庄、营口进犯，3月2日攻下鞍山，4日进攻牛庄。清军士兵在将领弃军而逃、无人指挥的情况下，自动与日军展开巷战，伤亡近2000人，被俘600余人，日军伤亡近400人。7日，日军转取营口，随即攻陷田庄台。自此，辽东、辽南地区皆为日军所占。26日，日军又占澎湖列岛。

（3）《马关条约》的签订

自日本不宣而战至1895年3月，战事仅进行了8个月，清军陆军主力和北洋海军即损失殆尽。面对军事上的一连串失利，并且行将危及京津的严重局面，清政府对战争前途完全失去信心，便转而求和。在美国的安排下，3月13日，李鸿章作为清廷的头等全权大臣，赴日本马关与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谈判。4月17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银2亿两等。后因俄、德、法三国干预，日本政府被迫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由清政府用3000万两白银赎回。台湾被割让后，台湾人民在南澳镇总兵、黑旗军首领、

台南守将刘永福领导下，组织义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使日军在进占台湾过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

6. 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改良主义的戊戌维新失败了，但是，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却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命。为了镇压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保护列强在华利益，当时几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出动了，由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悍然发动了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

（1）义和团的兴起和列强合谋侵华

19世纪末，世界列强乘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热，不几年即控制了南至广州湾、北到旅顺口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在不断扩大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同时，它们的宗教侵略也渗透到中国的广大乡村和城镇。外国传教士依仗清政府给予的种种政治特权，到处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凡有教堂之处，与百姓多有积怨。有的外国人还以教士身份作掩护，刺探情报，许多教堂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外国入侵者的凌辱，尤其是传教士的丑行劣迹，不断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在斗争中他们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和军事合一的反帝群众组织。其主要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一些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基本单位是“坛”，由几个或几十个坛组成总坛。各坛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但在坛内规定有严格的纪律。需要联合行动时，主要靠发帖子互相邀请，往往“传单一出，千人立聚”。

义和团运动最早兴起于山东。当时山东是外国教会势力最猖獗的省区之一。广大民众认为洋人是带来各种灾难的罪魁祸首，因而愤起袭击外国军营，拆除租界界石，其目的仅在于御侮自卫，逼迫外国教士退出中国。但传教士却将他们视作“叛逆”，经常无故寻衅侵犯，从而导致群众更加强烈的反抗。1898年10月，山东冠县赵三多等人打出义和拳的旗号，率数千人攻打桃园教堂。很快，在“杀洋灭教”的号召下，义和拳活动遍及山东全省。面对声势日渐浩大的义和拳运动，清廷迫于外国的压力，极力加以压制。尤其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民进行了疯狂屠杀，使山东义和团的斗争转入低潮。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却迅速发展起来，乡野村庄，无不有坛。4月，义和团活动进入清政府统治的中心北京，尽管朝廷严令查禁，但在两个月时间内，全城即开设坛口约1000个，参加者达10多万人。一队队团民在北京街头巡行，到处张贴反对洋人的揭帖，烧毁一些教堂、医院，还捕杀了一些劣迹昭彰的教民。与此同时，义和团在华北重镇天津也大量出现。随即，山西、内蒙、东北地区等北方各省群众亦群起响应，纷纷参加义和团，开展攻打教堂、驱逐传教士的斗争。同年五六月间，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以至陕西、新疆等地，也都发生了义和团和大刀会、哥老会等秘密组织联合起来，进行反对教会、焚烧教堂、惩罚传教士的活动。在义和团的带动和鼓舞

下，一个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迅速在全国形成。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英、美、法、德等国一面要挟清政府严加镇压，一面互相联络，协调行动，合谋出兵侵华。1900年5月，英、法、俄、美借口保护使馆，威逼清政府同意派兵400多人进入北京。为阻止列强进兵北京，义和团烧毁丰台车站，拆除了丰台、黄村、安定3个车站间的铁路和电线。各国使馆分别向本国政府告急，请求增兵。随即，在天津会议上，得到本国政府授权的各使馆作出了派遣联军进犯北京的决定。

对义和团，清政府先是主张用武力剿灭，后又转而采取控制利用的政策。尤其是当慈禧听到外国要用武力迫其归政光绪的谎报后，顿增仇外心理，便决定利用义和团对付列强，以达到“以团制夷”、“假夷灭团”的目的。面对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列强在拉拢南方一些主张剿灭义和团的督抚，策划“东南互保”的同时，加紧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抽调兵员，由军舰和运输船运至大沽、塘沽，进入天津租界。至6月10日止，进入天津租界的英、俄、日、美、德、法、意、奥八国陆海军已达3000余人。6月20日，慈禧在得知联军攻占大沽、进犯天津后，即正式决定招抚义和团，抗击外国的进攻。21日，清政府颁布宣战谕旨。

（2）击退西摩尔联军

1900年6月9日，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海军头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各国进入天津租界的士兵中抽出2000多人组成先遣军，由英国东洋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和美军的麦卡拉上校率领，分批乘火车北上，企图以最快的速度进占北京，用武力保护使馆，胁迫清政府改变政策，剿灭义和团。

6月10日，西摩尔率第一批联军800多人，乘火车自天津出发。义和团闻讯立即将京津铁路的一些地段拆毁，不断阻击联军，先遣军只得边修路、边打仗、边前进。原定两天内到达北京，结果第一天才走了40公里，第二天走了10公里，第三天只走了3公里，到达廊坊时，因通往北京的铁路被彻底破坏，再也无法继续前进，被义和团四面围住。西摩尔见前进无望，于16日率部退至杨村。18日，义和团2000余人和同情义和团的清军董福祥部3000余人，向留在廊坊的联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毙伤联军50多人。撤至杨村的联军也遭义和团袭击，死伤近40人。20日，陷入被动挨打境地的联军乘木船沿北运河向天津方向逃窜，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22日，联军抢占西沽武库，坚守待援，直到26日才在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西摩联军进军北京的计划宣告失败，付出了死伤300多人的沉重代价。

（3）大沽、天津保卫战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也是重要的商港和军事要塞。西摩尔先遣军进军北京受挫后，联军即决定夺占这一要塞，以便从海上增兵。在确定从水陆两路攻打大沽，并作好进攻部署之后，6月16日晚，联军向大沽守军发出通牒，限令于17日凌晨2时前让出大沽南北两岸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击。防守大沽的天津总兵罗荣光断然拒绝了联军的无理要求。结果未到17日凌晨，在事先驶入大沽口内的炮舰和鱼雷艇的掩护下，联军组织的1000人的突击队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罗荣光指挥守军进行抗击，一直坚持到17日上午9时许，击毁击伤敌舰6艘，毙伤联军250多人，终因势孤力竭突围退出。大沽失陷，天津门户被打开，各国从海上来的后续部队从此得以毫无阻挡地向天津开

进。

早在西摩尔联军进犯北京时，天津紫竹林租界即被清军和义和团包围。联军攻占大沽后，决定调集兵力先解紫竹林之围，再夺天津，然后进军北京。从6月17日至月底，联军数次派出部队从大沽驰援租界，驻守租界的联军亦分路出战，均遭到清军和义和团合力攻击。租界联军一度被打得挂出白旗，以示不战。联军增援部队在付出重大代价后，终于突破拦阻陆续进入租界。至6月29日，在大沽登陆的联军已达1.4万人，其中驻扎在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的联军约有9200多人。7月5日，直隶总督裕禄与马玉昆、聂士成商议，决定联合义和团对盘踞租界的八国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由清军马玉昆部和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从北向南进攻；由聂士成部从西南进攻；由罗荣光、何永盛部和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从西面进攻。次日，三面进攻开始，清军和义和团与联军激战，给其以杀伤。7月9日，联军出动6000人向占领八里台的聂士成部反扑，将八里台包围。聂士成不顾两腿受枪击，持刀督战，最后重伤7处，肠出数寸阵亡。7月12日，租界联军增至1.7万人，便由防御转入进攻，在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下，分两路攻打天津城。义和团和清军进行了艰苦抵抗，杀伤联军800多人。由于裕禄得知清廷准备乞和，对战胜联军缺乏信心，未能积极有效地组织清军作战。15日清晨，联军攻入城内。裕禄率军主动撤退，天津城被联军占领。虽然义和团还在城里坚持战斗，但已无法挽回败局。

（4）联军进犯北京与《辛丑条约》的订立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经过20多天的准备，于8月4日集中1.88万人，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京大举进犯。这时，驻守在京津沿线及北京附近的清军不下10万人。但由于慈禧开始发出求和、避战的指示，各部清军大都不愿卖力抵抗。联军于8月5日突破北仓防线，随即进攻杨村。清军奋力抗击，终因不敌联军攻势而撤退，直隶总督裕禄以手枪自杀身死。联军乘势继续北犯。刚被清廷任命为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的前山东巡抚李秉衡，主动请缨出征，统率清军前往河西务御敌。战斗打响后，数万清军顿成惊弓之鸟，一触即溃。李秉衡无奈，吞金自杀。联军占领河西务、通州，兵临北京城下。

8月13日，联军1.5万人分三路冒雨进逼北京。俄军先头部队首先抵达东直门，在进攻中遭到清军顽强抵抗。14日，日军进攻朝阳门、东直门，激战两天，未能攻下。英军乘虚攻入广渠门，在占领天坛后，由一个水洞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随后各军相继入城，向紫禁城逼近。守卫皇宫的清军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与联军血战。15日晨，当联军进攻东华门时，慈禧挟持光绪皇帝；由居庸关经太原向陕西出逃。但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仍坚持抵抗，同联军展开巷战，直到次日晚才退出北京。16日，日军首先攻占紫禁城，北京陷落。联军进京后，纵兵劫掠3天，大肆屠杀义和团员及无辜平民。接着，经过内部协商，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司令，并成立了所谓北京管理委员会，将北京划分为11个区，由各国军队分别占领。

为了胁迫清政府屈从，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后即四出攻城略地。从9月下旬至次年4月，联军先后占领北塘、秦皇岛、山海关、保定、宣化、张家口、井陘等地，控制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直隶四周要地。联军在华兵力已逾10万，驻京部队超过3万。

在北京即将陷落时，慈禧即派李鸿章与联军和谈，后来在西逃途中，又派庆亲王奕匡回京议和。与此同时，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也立即改变，认为义和团是“肇祸之由”，下令“痛加剿除”，企图以此作为向列强求和的表示。在八国联军的镇压和清廷的欺骗、出卖下，义和团运动终于失败了，经奕匡、李鸿章与联军谈判，1901年9月7日，清廷同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及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共11国，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使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从此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六、军事技术及兵器的发展

18 世纪下半叶，英、美、法、德、俄等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席卷欧美的工业革命时期，标志着人类开始迈向机器时代、钢铁时代、铁路时代和电磁时代，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导致了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的高涨。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带动了军事领域的变革，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从而不仅带来了军队战斗力的巨大飞跃，对军队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等也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

1. 西方军事技术和兵器的发展

世界近代后期军事技术质的飞跃，首先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在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双重推动下，这一时期的军事技术在以下 5 个方面出现了长足发展。

(1) 火药技术

火药从中国传入西方后，热兵器逐渐代替了冷兵器，从而对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西方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经指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不过，由于早期黑火药质量较差，因而那时的火枪并没有多大杀伤力。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后，随着近代战争实践的发展，火药的配比、制造、贮存和性能也不断得到改进。以英国为例，其火药制造业在 19 世纪初叶已具备以下特点：在原料加工方面，以先进的工业设备提炼高纯度的硝和硫；在火药的配比方面，已按歌夫列里在 1825 年提出的化学反应方程式，配成硝、硫、炭的组配比率为 0.75 0.1 0.15 的枪用发射火药，以及 0.78 0.08 0.14 的炮用发射火药；在制造工艺方面，用以蒸汽为动力的转鼓式装置进行原料粉碎和拌和，然后用水压式机械将制成的火药碾压成坚固而均匀的药块，再用造粒缸将火药块制成大小均匀的火药粒；在贮存方面，将火药粒烘干加热，并用磨光机将药粒表面磨光，除去气孔，降低吸湿性，使之保持良好的干燥状态，以延长贮存期。正是由于采用了这些新工艺、新方法，使得英国的火药制造业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火药的配方被各国公认为标准配方。直到 19 世纪中叶，黑火药仍然是轻武器的基本发射药。

1860 年前后，由于级式燃烧原理的发现，火药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主要是将粒状火药压缩成密度更大的药粒，使火药在膛内的燃烧速度和膨胀气体的压力延缓，在弹丸沿膛壁前进时继续产生气体，从而使膛压降低，而弹丸的初速度却大大增加。

19 世纪化学工业的蓬勃兴起，使火药的性能发生了重大改观，迎来了高爆炸药的时代。1846 年，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发明了硝化甘油。这种硝基化合物除用于医疗外，还具有爆炸性，威力比黑火药大得多，但因其极为敏感，制造和加工都十分危险。1860 年，瑞典科学家诺贝尔获悉索布雷罗这一发明后，便着手研究如何控制硝化甘油爆炸，使其成为制作炸药的良好原料。

1866 年秋，在经过上百次试验失败后，他发明了雷酸汞信管，也即常说的雷管，用它来引爆硝化甘油，终于成功地解决了如何使用这种炸药的问题。雷管的发明是火药问世以来爆炸学中最重大的进步。1867 年，他又发明了用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的方法，使硝化甘油的敏感性大大降低，使用时用一个装有雷酸汞的雷管即可起爆，从而解决了硝化甘油储存和运输中的安全问题，使其成为可以实用的具有强大威力的炸药。这是炸药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结束了手工作坊生产黑火药的时代，进入了炸药的大工业生产阶段。

火药性能的重大改进往往成为军事革命的先声。这方面的发明为新武器的使用和提高杀伤威力，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2）枪械技术

从 16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在将近 250 年时间中，欧洲各国军队装备的都是前装滑膛枪。自 19 世纪初叶开始，在新冶金学、弹道学和金属加工技术的基础上，枪械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击针后装线膛枪逐步取代了前装滑膛枪，世界进入了近代枪械时期。

这一时期枪械的进步，首先表现在来复枪的改进上。1776 年，英国的弗格森在后膛枪的基础上发明了来复枪。由于重新设计了枪栓，在枪膛内刻上螺旋形的纹路即来复线，并装上了标尺，因而使子弹飞行的稳定性、射程、穿透力和命中率都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这种枪造价比较高，发射时每颗子弹都必须用木槌敲到枪管里去，使得装弹很费时间，发射速度慢，结果直到 19 世纪，在欧洲国家的部队中还只是有选择地配备给少数人。19 世纪初，英国步兵最先对来复枪进行了改进，采用次口径子弹，子弹不嵌进膛线，使原来发射速率慢的缺点得到克服，于是来复枪被更多地用来装备部队。到 1823 年，英国军队来复枪的订货量已达到 1 万枝。1835 年，普鲁士人道赖泽发明了击针后装枪。同前装枪相比，这种枪增设了闭锁机（亦称枪机或枪闩）。闭锁机的机头与枪筒尾部密接，在射击时使火药气体不能向后面泄漏，这样就可以增大弹丸的活力和初速，提高命中精度和侵彻力。

19 世纪在枪械技术方面带有革命性的改进，是火帽和圆锥形子弹的发明与应用。1807 年，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福赛思在研究雷酸汞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雷汞。这种雷汞用锤一击即可爆炸，爆炸时火星通过火门引燃枪管中的发射药。1814 年出现了用这种雷汞制造的火帽，起初是以铁、锡为材料，后来改用铜。1840 至 1842 年，这种火帽被装于枪、炮中，从此便成为点燃发射药的基本装置。火帽的发明，使步枪成为在任何气候下都可以使用的武器，而且大大减少了不发火的情况。在此之前，燧发枪大约每射击 7 发子弹便瞎火一发；火帽应用后，则降低为约 200 发才出现一发。

火帽的发明，推动了子弹的革新。开始，火帽是与子弹分开的，使用时将火帽安装在武器击锤下面的火门上。1823 年，英国的诺顿上尉设计了一种圆锥形子弹。这种子弹有一个中空的弹底，发射时它可以自动膨胀，封住枪膛，但英国政府没有采用。1849 年，法国人米尼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米尼式子弹，随即，法国、美国也几乎同时造出了第一批完整的子弹。这种子弹将火帽与弹壳、弹头合为一体，弹壳为特制铜等软硬适度的金属制成，且有爆炸复合装置加以保护，通过枪闩上的撞针撞击发火。圆锥形子弹发明前，来复枪由于装药困难，射击速度比滑膛枪慢。新发明的子弹形体较小，不仅便于射手用各种姿势迅速装填，每分钟可发射 6 至 7 发；而且由于射击后弹头体积膨胀，紧嵌入枪管的来复线中，获得很大的旋转速度，加上空气阻力

小，从而大大提高了来复枪的射击精度，增大了射程。有人曾经对当时的滑膛枪与来复枪的射击效果做过试验，结果表明：在 200 步距离处射击，前者所费子弹相当于后者的 2 倍，300 步处为 5 倍，400 步处至少 10 倍。超过 400 步射击距离，滑膛枪已完全失效，而来复枪在 800 码处还可射击较大的目标；在 1000 码处，弹丸还有足够的末端能量，可穿透 4 英寸厚的软质松木板。因此，有人说，与当时的其它轻武器或冷兵器相比，每个握有来复枪的士兵等于拥有一门可达同样有效射程和最大威力的火炮。正因为如此，精度高、射程远的来复枪也就最终替代了精度差、射程近的滑膛枪，成为步兵的基本武器。有的军事评论家认为，在 1850 年至 1860 年间发明的来复枪和圆锥形子弹，与这前后出现的任何新武器技术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

19 世纪在枪械技术方面的另一项重大发明，就是连发炮也即机枪的问世。击针后装线膛单发枪虽然较之前装滑膛枪优越，但发射时仍需将子弹逐发装入枪膛依次射击，于是一些人便尝试创造连发枪。其实，早在 1718 年，英国的帕克尔就发明了一种单管手摇机枪，在一次试验中曾创造了只用 7 分钟便打出 63 发子弹的可观射速。但因这种机枪过于笨重，装弹困难，因而未被引起重视。1862 年，美国的加特林发明了一种 6 管手摇机枪，用 6 支口径为 14.7 毫米的枪管安放在枪架上，射手转动曲柄，枪管依次发射。由于这种机枪射速快、火力强，所以一经发明便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867 年，英国军队也装备了斯宾塞 9 连发枪。机枪的出现，标志着枪械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火炮技术

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轻武器的进步，同样也推动了作为重武器的火炮的革新。

19 世纪中叶以前，各国使用的火炮均为前装滑膛炮。这种火炮虽然在近代战争中发挥了空前强大的威力，成为杀伤敌人的主要兵器，但在射速、射程和精度等方面也有不少明显的缺陷。1846 年，意大利少校卡韦利造出了一种在炮膛内刻有两条旋转来复线，使用圆柱形炮弹后膛装填的后膛来复线式火炮，使火炮技术有了变革性的飞跃。不久，英国制炮商惠特沃斯也生产了一门后膛装填的线膛炮，不过，他是用盘旋的 6 角炮膛来代替旋转的来复线的。同前装炮相比，后装炮由炮口装弹改由炮尾装弹，提高了射速；有完善的闭锁炮闩和紧塞具，解决了前装炮因炮弹弹径小于火包口径所带来的火药燃气外泄的问题；炮膛内刻制了螺旋膛线，同时发射尖头柱体定装炮弹，使炮弹射出后具有稳定的弹道，提高了命中精度，增大了射程；可以在炮台包括陆战掩体和军舰舰舱内装填炮弹，既方便又安全。由于后装炮具有较多的优越性，所以各国便竞相研制。

1854 年，阿姆斯特朗几乎在研制前装炮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创制了火炮的楔形锁栓式闭锁机即炮闩，加上预压紧塞具，制成精良的阿式后装炮。与此同时，德意志的火炮专家克虏伯制成精良的后装钢炮，在 1855 年受到拿破仑三世的称赞。1864 年，又制成后装线膛全钢克虏伯式层成炮和装箍炮。此后，几十种口径的后装克虏伯炮被许多国家装备部队作战，成为与阿式后装炮齐名的世界名炮。火炮性能的这些重大进步，使其杀伤力一度落后于步兵新武器的状况得到改变，火炮重又成为战场上的支配性武器。

（4）舰船技术

近代海军首先产生于西方，而近代海军的变革则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并完成的。这一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由风帆驱动变为以蒸汽为动力，由木质战舰变为钢铁战舰，由威力较小的舷炮变为威力较大的套筒炮和可以旋转的装甲炮塔。

蒸汽机出现后，很快被用于推进船舶。1807年，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制造了一艘名为“克拉蒙特号”、可供长距离航行的实用蒸汽船。这一事实说明，蒸汽机应用于军舰已经为期不远了。有趣的是，在此之前，当富尔顿于1803年向拿破仑建议用蒸汽机作动力建造无帆战舰时，竟被拿破仑当作天方夜谭而轻率地否定了。尽管如此，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们还是很快便敏锐地发现了蒸汽船的潜在的军事价值。1813年，富尔顿采用双船体间夹单明轮的方法，在美国建造了第一艘叫做“狄莫罗哥斯号”的蒸汽舰（后改名为“富尔顿号”）。英国也于1827年将蒸汽机运用到军舰上。蒸汽机的应用，使舰船摆脱了风向和水流的影响，提高了航速，增加了机动性。

但是，新的蒸汽舰也带了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暴露在外的机器和大型划水蹼轮易遭敌炮火攻击，而且在船舷两侧的明轮占据了本来可以用于安装火炮的宝贵空间；木质结构的船体防护力很弱。1837年，瑞士出生的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发明了螺旋桨式推进器，并把机器置于舰船吃水线以下的舱室。这一舰船建造史上的创举，解决了明轮和机器暴露在外的问题。在埃里克森的帮助下，美国海军设计并制造了第一艘螺旋桨战舰“普林斯顿号”，向世人宣告了舰船动力革命的成功。1849年，法国也建造了一艘螺旋桨式战斗舰，并将其命名为“拿破仑号”。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运用性能良好的钢材制造装甲军舰成为可能，并且因为大马力蒸汽机的运用，可以不必担心舰船重量的增加。由于客观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装备有新型火炮的俄国海军的攻击下，木质舰船不堪一击的事实，使得法国和英国在战争结束不久即开始建造第一艘装甲蒸汽军舰“光荣号”和“勇士号”。在美国内战中，埃里克森于1862年又设计、制造出了船形较小、具有装甲和装甲甲板、装有威力强大的达格尔伦滑膛炮的全新舰艇“班长号”，并在3月份同南方盟军舰队的战争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美国内战的经验，打破了一些人对以铁代木建造舰船的怀疑，最终敲响了木质战舰的丧钟。到19世纪60年代，装甲蒸气舰已开始全面取代在海战史上雄踞几百年的木质战舰。许多国家的军舰逐步披上铁甲，并随着火炮威力的增大而将铁甲不断加厚。据1864年6月英国《海陆军报》记载，当时作好战斗准备的22艘英国军舰中，已有一半是装甲舰。

这一时期海军军舰的另一个重大进步，就是舰炮的改进和炮塔的发明。184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特雷德雷尔运用法国海军军官阿·蒂埃里用铁箍紧套铸铁炮管的发明，为美国造了几门套筒炮。采取这一措施后，炮管的抗压强度大大增强。但是，美国海军在一个长时间里却没有采用这种炮，而是用一种改进型的达格尔伦铸铁炮。这种重型铸铁炮口径达15英寸，攻击力很强，可以击穿美国南方联邦装甲舰的钢板。1859年，英国军舰装备了一大批阿姆斯特朗套筒炮；就在这一时期，克虏伯钢炮也开始装备海军。由于这类炮具有后装、套筒和有膛线三个特点，炮弹的命中精度和末速有了很大提高，因而成为当时对付装甲舰的一种具有较大威力的火炮。这一时期在海军发展上还有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炮塔的发明。直到美国内战之前，舰

船上的火炮都是固定的，在战斗中成为制约火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原因。内战爆发后，才华横溢的设计家埃里克森于 1861 年发明了旋转炮塔，将其应用于新建的“班长号”军舰，从而使舰炮可以灵活自如地向不同方向射击，大大提高了军舰的攻击力。此外，在美国南北战争中，还出现了潜艇和水雷，并在实战中获得成功。

近代后期舰船技术在以上这些方面的重大发展，使海军建设产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机动力、打击力和防护力的高度统一。到 19 世纪 70 年代，蒸汽装甲军舰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从动力来看，一些大型蒸汽舰已有 6 千至 8 千马力，排水量达 8 千至 9 千吨；从火力来看，舰上装备有 25 吨至 100 吨重的线膛炮，有旋转的炮塔，能将 300 至 2000 磅重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有的距离，而舰艇的装甲厚度则达 200 至 300 毫米。这些都标志着海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5）通信技术

19 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有力地推动了军事通信技术的进步，这突出地表现在电报的运用和电话的发明上。

19 世纪 30 年代，欧洲和美洲先后出现了商用电报机。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发明家是英国的高斯、韦伯和美国的莫尔斯。1833 年，高斯和韦伯制作出第一个可供实用的电磁指针电报机。此后不久，另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库克和伦敦高等学院的教授惠斯登发明了新型电报机，并取得第一个专利。1837 年，美国人莫尔斯的发明，把电报技术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用一套点、划符号代表字母和数字（即莫尔斯电码），并设计了一套线路，发报端是一个电键，该电键把以长短电流脉冲形式出现的电码馈入导线，在接收端电流脉冲激励电报装置中的电磁铁，使笔尖在不断移动的纸带上记录下电码。经过不断改进，这套电报系统于 1844 年达到实用阶段，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之间首次建立了电报联系。

由于战争比人类任何其它活动都更加依赖于当时最有效的通信手段，因此电报一经出现，便立即引起了军界的关注。1854 年，英军第一次在战争中采用了电报。海底电报约于 1851 年开始用于多佛和加莱之间，然后发展到一方面用于伦敦和巴黎之间的远距离电报通讯，另一方面则用于协约国克里米亚战争的瓦诺基地。1857 年，在印度的独立战争中，设在加尔各答的政府和四处分散的英军所以能保持联系，主要靠的是电报。1861 至 1865 年的美国南北战争，是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电信技术的战争。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架设了 2400 公里的电报线路，把北方部队同陆军部和陆军司令联结在一起，共发送了 650 万份电报。陆军的一名上校迈尔，不仅发明了旗语通信，还于 1861 年夏发明了一种能够沟通集团军司令和下属部队联系的轻便发报装置，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恩格斯在谈到近代电报的军事功能时指出：“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不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

由于电报在收发时需要转译电码，人们嫌它迟缓不便，于是便进一步寻求更便捷的通讯方式，电话也就应运而生。英国的胡克首先提出在远距离上传输语音的建议。1837 年，美国医生佩奇发现，当铁的磁性迅速改变时，会

发出一种音乐般的悦耳声音，这种声音的响度随磁性变化的频率而改变。他把这种声音称作“电流音乐”。大约在1860年，德国的赖斯第一次将一曲旋律用电发送了一段距离，他把这个装置叫作“电话”，这个名称于是沿用下来。直到1876年，美国的贝尔终于发明了第一台电话机。电话及此前发明的电报的运用，使军事通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6）军事技术的发展对作战方式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军事上的革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固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但军事始终是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利用得最多和最快的一个领域。而军事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会改善军队作战的物质手段，带来战斗力的飞跃。科学家贝尔纳认为：“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实际上，除了19世纪的某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大部分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展是海陆军的需要所直接促成的”，“通过改革技术而生产出来的新式的或更精良的武器可以决定胜负”。

近代后期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给军事活动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推动了作战方式的改变。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前的大约200年的历史中，西方陆军采用的大都是线式编队的作战方式。所谓“线式队形”，就是将士兵排成线式横队作战。这种作战队形开始是很密集的，其纵深曾达到10列，后来随着弹药装填方法的改进，逐步减少到两三列。在接近敌方阵地时，第一列士兵取跪姿，第二列取立姿，按照统一的口令齐射，然后向反方向行进换药装弹；接着，后面两列已作好射击准备的士兵依次前进一起射击。在实施反方向行进过程中，整个队形仍在向前推进，最后用刺刀同敌人短兵相接。所以采取这种线式队形，主要是因为当时士兵装备的是带刺刀的燧发枪，而这种枪装换弹药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射击精度也不高。为增强作战的火力，也为保证军官能有效地控制战场，就需要士兵排成有一定厚度的编队，并按照统一的命令进行齐射。线式队形只能用于在平坦的地形上作战，军队移动很慢，不便机动，两翼容易受到敌骑兵的攻击，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战术的采用，最明显不过地反映了作战方法取决于人员素质和武器性能这一客观规律。恩格斯有一段话对此讲得十分透彻：“当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他们只有在鞭笞下才俯首听命……这种士兵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同有效射程仅有100米的燧发枪相比，当时的火炮却具有射程远、杀伤力大的特点，因而成为占优势的兵器。尤其是在拿破仑时期，火炮担当了攻城战和野战的主角，成为杀伤敌人的主要军种。

进入19世纪以后，军事技术首先是步兵的武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来复枪代替了滑膛枪，后装药代替了前装药，连发射击代替了单发射击，这一系列变化使步枪的威力一时超过了火炮，两者杀伤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逆转。在美国内战中，轻武器（大多数是步枪）造成的伤亡占86%，火炮只占9%，带刀武器占5%。在普法战争中，步枪造成的伤亡大约为火炮的10倍。

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1—24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7页。

以前步兵射击是从距敌 50 米到 100 米开始，现在则从 400 米就开始。技术决定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术必须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而变化。在这种射程增加、精度提高、射速加快的武器面前，如果刻守传统的、刻板的线式队形，只能遭致失败。在这方面，克里木战争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克里木战争时期，与英、法联军相比，俄军不仅在军队的数量和火器的数量、质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作战中采取的是过时的纵队突击战术。联军则采用了新的散兵战术，步兵在接敌运动中成疏开队形行动，在达到步枪射程之内时分散成散兵线，一面射击，一面利用地形掩护前进；到达冲击出发地区时再会齐，然后运用火力优势向敌展开突击。这一战法的采用，使全部或大部装备了后装线膛枪的英、法联军能充分发挥自己手中速射火器的战斗力，并将火力、机动与突击很好地结合起来，有效地达到了歼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这是联军取胜的一条重要原因。美国内战的情况对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战争初期，比较正规的北方士兵在开阔的战场上仍机械地按操典规定，保持整齐、密集的战斗队形，从而成为南军士兵射击的良好目标，吃了不少亏。而半游击性的南军士兵在战斗中则分散为一个个的小群，每两个士兵又拉开一定的距离。当军官挥动军刀下达“冲锋”命令后，所有士兵迅速向前冲进，虽然既不整齐也无秩序，但其力量却是不可抗拒的。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双方都已清楚地出现了将士兵疏散配置的倾向。后来，其他国家普遍认真吸取了美国内战的这一经验教训。战争实践的发展，终于逐步将纵队突击战术淘汰，而代之以散兵线这一新的技术。对此，在 19 世纪中后期欧洲各国军队颁布的一些战斗条令和教令中都作了规定。

2. 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和军队武器装备的更新

中国是世界上发明火药的国家，也是最早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国家。但是，自 16 世纪末叶以后，由于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制度的束缚，由于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的火器制造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当西欧陆军已全部使用火器时，中国仍是枪箭并重，冷热兵器并用，同当时英军的武器装备水平相比，差距竟达一二百年。清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志士仁人看到了中外火器的严重反差。魏源在其所著的《海国图志》中，不仅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地理、社会政治制度、先进的科学技术，还特别讲述了军队建设和武器的生产情况，指出：“西洋之长技有三：一曰战舰，二曰火器，三曰养兵之法。”据此，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观点，竭力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和养兵、练兵之法。从闭关锁国到睁眼看世界，再到“师夷制夷”，标志着先进的中国人思想的重大转变，随着西学东渐，在魏源等人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的军事技术开始打开尘封的窗户，进行“师夷长技”的尝试，火器研制事业出现了回升的趋势。特别是 19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把中国军事工业推进到了机械化阶段，使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进入了近代化的新时期。

（1）洋务运动与军工厂局的创办

19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列强入侵和农民起义的双重冲击下，清王朝中的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当权者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中国及世界的形势

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从无情的现实中终于看到，清王朝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列强所以敢于逞凶，清军所以遭致惨败，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中国火器不及，武备不兴。为了寻求中国自强自立的道路，他们接受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纷纷上奏朝廷，主张开办洋务，学习欧美造坚船、制利炮的长技，按照“洋法”操练一支用近代武器装备的陆、海军，增强国家的武备，以御外侮，以靖“内患”。尽管他们的建议遭到了以“天朝大国”自居、反对学习西方、拒绝任何变革的顽固派的政议指责，但由于这些主张有利于维护清朝的统治，因此被朝廷所采纳，并作为一种国策开始推行。当时倡导和主持洋务活动的官僚被称作洋务派。其代表人物，在朝廷里是领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在地方是握有实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张之洞等督抚官员。

在洋务派官员的主持下，从19世纪60年代初起，清政府即着手从外国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创办军用企业，开厂办矿创办民用企业，用新法编练陆、海军及兴办新式学堂，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一系列活动，史称“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自60年代开始到中日甲午战争止，共延续30年，而兴办军事工业，建立新式装备的陆、海军，则是其主要内容。奕訢曾经说过：“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这可以说代表了洋务派的共同主张。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开始艰难地起步了。最早出现的制造现代武器的军事工厂，是曾国藩于1861年12月创建的“安庆内军械所”，该所主要是以手工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弹药。随后，李鸿章于1862年在上海、1863年在苏州建立了“洋炮局”，开始用机器生产枪炮子弹。接着，各省督抚也陆续创办各种兵工厂。到1890年止，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军工厂局共有24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和湖北枪炮厂，它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干。

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上海美商旗记铁工厂，并将上海的两所洋炮局并入，再加上从美国购来的机器，合并建成“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7年该局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规模大加扩充，1891年又进行了扩建，是晚清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综合性军工厂局。由丁日昌、沈葆楨先后任督办，以美国人科尔任总监工，并由两个英国人任顾问。有工人3500多人，设机器厂、铸铁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轮船厂等十几个分厂。曾先后制造过旧式前膛枪、快利新枪，改制过林明敦式后膛枪；生产过旧式劈山炮、新式大炮、快炮，以及地雷、水雷等。1885年该局制造了第一艘轮船“恬吉号”（后改名“惠吉”），至1885年先后制造大小轮船10余艘。此后就专门经营南北洋各省舰船修理业务。该局设有翻译馆和兵工学校，从而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军工生产、培养军事技术人才、传播欧美军事科学技术的中心。

金陵制造局。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将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并加以扩充，改名为“金陵制造局”，是淮系军队军火供应的重要基地。由英国军医出身的马格里任主持制造的监督，生产弹药和大炮。由于所造的大炮质量低劣，经常发生火炮膛炸事故，马格里因此被撤职。以后该局不再雇佣外国人，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生产。1894年后经两次扩建，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该局主要生产后装枪和各种炮弹、枪弹，其仿制的克虏伯炮及诺登飞、格林多管速射炮的性能在当时名列前茅。

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后，由沈葆楨总理船政。聘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从法国购入成套设备，并雇用几十名法国技师和工头，是洋务派兴办的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在创办船政局过程中，左宗棠注重发展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与法、英技师签订合同，议定5年内“教习中国工匠能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1874年日意格按合同撤退后，外国技工减少，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中国技术人员接管了技术工作，继续造船，而且新造的船都是由中国人驾驶。该局拥有工厂16座，船台3座，船槽1座。自1866年至1895年，先后建造大小船36艘，其中21艘为日意格撤走后自行制造。1869年6月，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木质船体蒸汽螺轮舰船“万年青号”下水，当时只有150匹马力；到1887年2月下水的甲巡洋舰“开济号”已有2400匹马力，造船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该局还设有船政学堂，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分配在福州船政局和福建海军中工作。在中法战争中，该船政局曾遭法军严重破坏，战后经修复有了一定发展。其所造“平远号”钢甲巡洋舰成为北舰队的八大战舰之一，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黄海海战中发挥了一定的战斗作用。

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奕訢奏准在天津高局制造军火，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负责筹划。1867年，崇厚在天津建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是洋务派在北方办的最大的军事工业。初聘英国商人密妥士主办，主要技师为英国人。雇佣工人最多时达2700人。该局又分东、西两局，东局专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西局制造军需器具、军用物资和开花子弹。1870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将机器局加以整顿和扩充，随后将密妥士和技术不精的外国人辞退。到1876年，该局制造军工产品的能力已较初建时提高了三四倍，并能承修军舰和小型机器船。1893年，又建成了一个炼钢厂，供制造钢枪之用。于是，天津机器局便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局的北洋大型综合性军工厂，其制品主要供应北洋水陆各军。

湖北枪炮厂（后称汉阳兵工厂）。1889年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获准将原广州炮厂机器同筹建中的炼铁厂一起，于1890年移至湖北汉阳，创办了“湖北枪炮厂”。该厂机器是从德国购置，设备较新，规模较大，分炮厂、枪厂、炮架所、炮弹所、枪弹所等5个分所，雇佣工人约1200人。1898年以后，又添设了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该厂所造枪炮质量较好，是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所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

除上述几个大型军工厂局外，还有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创办的“西安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制造局”；丁宝楨任山东巡抚时在济南建立的“山东机器局”，后调任四川总督时，在成都建立的，“四川机器局”。另外，云南、吉林、山西、湖南、广东、台湾等省也都建立了制造军火的机器局。

晚清政府兴办的军事工业，尽管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它们毕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近代机器工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性进步。这些军工厂局分别设在全国各大城市，东西南北中处处皆有；其中既有制造枪炮弹药的专业厂局，也有建造舰船的专业厂局，还有两者兼备的大型综合性厂局；在对欧美各种火器进行全面仿制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其产品有各种步枪、多管枪、机关枪、野战炮、攻城炮、守城炮、海岸炮、舰炮、舰船，以及弹药、地雷、水雷，乃至制造枪炮所用的优质钢材，基本上包括了当时清军所需要的各种武器装备，从而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军事工业比较

完整的体系，为改善清军的武器装备和国家的防御设施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通过兴办军工厂局，不仅从国外引进了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产业工人和科技人员，传播了科学知识，而且由于使用机器生产，雇佣了大量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基本上按照外国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因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近代主要军工产品

洋务派兴建的军工厂局的产品，大都参照从国外引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资料进行仿制，也有一些是根据清军的需要进行改进或重新设计制造的。主要的军工产品有：

军用钢材。在军工厂局建立后的较长时期内，军工生产所需的优质钢材都是从国外进口的。1890年至1893年，江南制造总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的炼钢厂、汉阳钢铁厂建成，即开始采用新工艺冶炼制造枪炮和舰船钢甲所用的钢材，质量与进口的同类钢材相差无几，使军用钢材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给。

火药。从1867年至1884年间，清廷先后采用欧洲火药厂的机器设备，建成了六七个专制火药的厂局，其中以天津机器制造局火药厂和金陵制造局火药厂的规模为最大。这些火药局在制造黑色火药的同时，还开始仿制主要用作线膛后装钢炮发射药的六棱药。1892年，天津机器局在德国人的传授下，进一步学会了栗色火药的制造方法，该局及江南制造总局先后开始生产这种火药。19世纪80年代无烟火药发明不久，中国军工厂局即开始研制。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的无烟火药厂建成，次年开始制药，产品有枪用无烟火药、炮用方片无烟火药和扁条无烟火药。

枪械和枪弹。晚清军工厂局对近代步枪的仿制，大体分前装枪、后装枪和连发枪三个阶段。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进口的步枪均为前装枪。1867年后，一些军工厂局开始对这种枪进行仿制和改装。改装后的前装滑膛枪称作“洋线枪”和“洋抬枪”。江南制造总局枪厂还仿制了前装线膛步枪和骑枪。19世纪70年代，击针后装线膛枪传入中国，江南制造总局枪厂先后仿制了美国的林明敦边针后装线膛枪和黎意击针后装线膛枪。连发枪问世后，一些军工厂局的造枪人员又紧跟枪械发展日新月异的形势，于1890年研制出五连发的快利枪；随后于1898年仿制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1888年式毛瑟枪，只比创造该枪的德国晚了10年。此外，金陵制造局还曾仿制过加特林和诺登飞多管枪，并在中法战争期间调拨给前线清军使用；个别军工厂局还曾仿制马克沁、马德森机枪。晚清军工厂局对枪弹的制造，是随着枪械的发展而变化的，制造的厂局和产量都比较多。从全国看，大致在1862年至1874年间以制造前装枪弹为主；1875年至1890年间以制造后装枪弹为主；1891年开始制造后装连发枪使用的无烟火药枪弹。

火炮与地雷、水雷。火炮是晚清军工厂局生产的主要兵器之一。对欧美近代火炮的仿制，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自1868年至1873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在江南制造总局炮厂仿制前装滑膛枪4年多时间造出各型钢铁炮110多门。自1874年至1900年为第二阶段，江南制造总局又仿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阿姆斯特朗前装炮，到1888年共造出91门。这一时期虽然其他厂局也仿制过前装炮，但大都是轻型炮，且数量少、质量差。1884年以后，一些军工厂局开始仿制更先进的阿姆斯特朗式、克虏伯式、格鲁森式等后装线膛炮。其中江南制造总局炮厂制造的几种克虏伯式后装炮，具有钢材质量好、制

艺先进、便于机动、射速快、威力大等特点，装备部队后受到好评。随着火炮的发展，炮弹的仿制也经过主要制造供前装滑膛炮发射用的实心弹和球形爆炸弹、同时制造前装炮弹和后装炮弹和专造供克虏伯式山炮发射用的榴弹三个阶段，产量也很可观。仅江南制造总局在 1874 年至 1894 年的 20 年中，便制造各种炮弹近 41 万枚。当时许多军工厂除重点制造枪炮外，还生产了相当数量的地雷和水雷。所制地雷通常由铁制外壳和壳内装药组成。江南制造总局于 1874 年最先造出水雷，并于 1882 年专门设置了水雷厂。此外，天津机器局和福建船政局也制造了不少水雷。这些地雷和水雷主要用于陆上要地和海口要塞的防御。

（3）兵器近代化对晚清军事的影响

大量近代兵器的不断购买、仿制和装备军队，给 19 世纪下半叶的晚清军事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军队的编制体制、军事训练和教育、作战方式及海防建设等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

陆军武器装备的更新。陆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最早可以追溯到曾国藩、李鸿章所率的湘军、淮军购置洋枪洋炮。从 1854 年至 1856 年，湘军购买外国火炮达 1800 多门。淮军装备的洋枪洋炮，在数量和质量上比湘军还要稍胜一筹。到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时，6 万余淮军的武器装备已从新式枪炮与旧式枪炮、冷兵器并用，过渡到基本上全部使用新式前装滑膛枪炮的阶段。在中国军队装备的更新上，湘军和淮军可以说是开了由古代向近代演变的先河。

中日甲午战争前，清廷先是在京畿八旗兵中装备新式枪炮，由英国教官进行使用洋枪洋炮的训练。随后从 1856 年开始，又给驻防直隶的 1.5 万练军配置近代前装枪炮，按洋法编练。此后，直隶清军的兵器装备进一步发展，到 1890 年前后，已由过去的冷、热兵器并用，一变而为全部使用先进的毛瑟后装枪和克虏伯后装炮，成为当时中国装备变化最快、武器最好的一支部队。但从全国看，其余地区的练军仍未摆脱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状况。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后，一部分湘军、淮军被清廷保留下来，改编为驻防各大城市和要地的国家经制兵，亦称防军。1870 年前，防军所用枪炮因购自许多不同国家，种类很多，装备杂乱。经过整顿，到 1890 年前后，装备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专门编制了独立炮队，将火炮集中使用，可谓一大进步。

甲午战争中，清军被用西法操练的日本军队打败。惨痛的教训，使清廷进一步看到了改革军制、改善装备的迫切性，于是决定从 1895 年起编练新式陆军。新建陆军主要以德军的编制装备为模式，装备了新式枪炮，成为马、步、炮、工、辎重为一体的合成军。其中以聂士成在直隶编练的武毅军的装备最为精良。武毅军约编 1.3 万人，有各种口径的后装单发和连发毛瑟枪 1.02 万支，后装连发曼利夏枪 1.14 万支，马克沁机关枪 2 挺，各种口径的克虏伯炮 80 多门。1898 年，清廷又将北洋各军约 6 万人全编为武卫军。武卫军不仅轻武器比较先进，所装备的火炮已可以按作战需要分为步兵野战炮、炮兵野战炮和野战重炮、攻守城炮、山炮等不同类型，从而基本上形成了陆军完整的火器装备系统。总之，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清军的主要部队已不仅改革了编制，装备亦得到了更新，从而结束了新旧枪炮混杂、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落后状况，进入了近代火器时代。

近代海军的创建。近代海军在中国的出现，是中国人为抵御列强的海

上侵略而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但它从酝酿、萌芽到初建，却走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是以中国人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为基础的。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奉行的是重陆轻海的传统国防思想，与此相对应，实行的是禁海政策。但是，英国人通过鸦片战争由海上叩关进而破门而入的无情现实，使林则徐、魏源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领教了有海无防的痛苦，同时也唤醒了近代海防意识。到 19 世纪 60 年代，洋务派则更清醒地看到中国与西方在军事上的巨大差距。早在 1864 年，洋务派首领之一的李鸿章便已看到：“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于中国，内则狎处犂鞬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左宗棠也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蛮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做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的智囊人物薛福成对当时的外患讲得更为透彻：“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挟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而洋务派明确提出，为防止西方国家的侵略，必须“军事自强”；而要“军事自强”，则必须加强海军和海防建设。于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军的问题，也就被提上议事日程。

虽然清政府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有了建立海军的打算，并且此后洋务运动所兴办的军事工业也为近代海军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清政府对建立一支近代海军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完整的构想，决心不大，所以 10 年间进展缓慢。1874 年，日本派兵进攻台湾。这一事件使清政府强烈感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经过上上下下一场筹建海军的议论后，1875 年，清政府终于决心每年拨白银 400 万两作为海防经费，任命两江总督沈葆楨、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南、北海防大臣，负责筹建新式海军。当时议定，首先集中力量建成北洋水师，然后一化为三，10 年之内完成北洋、南洋、粤洋 3 支水师的创建工作。在迷茫、徘徊了 10 年之后，中国海军开始步入初建时期。

海军建设方针确定后，李鸿章即向西方国家购买军舰，开始组建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的组建因经费问题起步较晚，但在沈葆楨的督办下，实力建设虽然质量不高，在数量上却日有所增。与此同时，福建、广东两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着手组建本省海军。这期间，为培养海军人才，还建立了天津水师学堂，并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到 1884 年，中国的海军已初具规模。然而，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孤拔率领的法国远征军成了中国海军的第一个敌人。马江战役中法军的突然袭击，使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福建船厂也遭受重大损失。这又一次的强烈刺激，促使清政府从中吸取教训，决心“大治水师”，并于 1885 年作出两项决定：一是设立海军衙门，任命醇亲王奕訢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訢、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二是先在北洋练

转引自《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7 页。

同上书，第 47 页。

同上书，第 48 页。

同上书，第 47 页。

精军一支，此后次第兴办。北洋练军之始，即著李鸿章专司其事。沈葆楨去世后，有关海军的一切规划和专款使用大权全落到李鸿章手中。由于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北洋舰队很快得到扩充，并于1888年10月正式成军，其实力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1888年部分海军专款被慈禧太后挪用于修建颐和园，此后新建海军也就基本上停止了发展。清政府筹建海军的结果，计划中的粤洋舰队根本没有建立，只在广东和福建分别搞了两支小舰队；南洋舰队也没有发展起来，难以在海上独立作战；而真正建成的、具有一定海上作战能力的舰队，就是北洋舰队。各舰队的大体情况是：

广东舰队：守备广东沿海海域，由两广总督掌管。共有大小舰只19艘，其中10艘购自外国，9艘由本国仿造，多数船体较小，故整个舰队只能在近海巡防，没有海上作战能力。

福建舰队：守备浙江、福建、台湾沿海海域，归闽浙总督和福州船政衙门掌管，受南洋大臣指导。共有各类舰船20艘，其中6艘购自外国，14艘由福州船政局制造。舰船比广东舰队大，但多为木质，钢舰甚少，作战能力不强。

南洋舰队：守备江苏沿海及长江一带水域，由两江总督掌管。共有大小船只26艘，12艘购自外国者，14艘国内仿造；1000及1000吨以上者3艘，2000吨以上者7艘，其余皆在700吨以下；17艘为铁船和钢舰，其余为木质和铁肋木壳船。其实力强于广东和福建水师，是仅次于北洋舰队的第二大舰队，但由于缺乏大型铁甲舰充任主力，故仍不能在海上独立作战。北洋舰队：是清政府的主力舰队，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守备辽东半岛、渤海湾、山东半岛一带海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指挥。共有铁甲舰、巡洋舰、炮船、鱼雷艇、运输船27艘，其中5艘系福州船政局制造，其余22艘均购自外国。除6艘为木质与铁肋木壳船外，其余全是钢质和铁质船。27艘舰船中，载重量在1000吨以上的4艘，2000吨以上的5艘，7000吨以上的大舰2艘。全队舰艇共装备舰炮300余门、鱼雷发射管50余具，具有枪械、舰炮、鱼雷等海战火器相结合的比较完整的火器装备系统。北洋舰队还在大沽、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港口，旅顺口和威海卫成为北洋舰队的两大基地。这是其他舰队所无法比拟的。

晚清四支舰队的创建，标志着中国旧式外海水师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国家财力物力艰难，晚清海军在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未能得到新型钢铁甲舰的补充和更新，结果日益落后于同时创建的日本海军舰队，加上舰队指挥官无能，训练不严，纪律松弛，终于在甲午海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至战后连海军衙门都撤了。后来虽经重建，但实力地位已大不如前。

军事训练、教育和作战方式的变革。随着晚清陆军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也出现了相应的变革。开始主要是从一些部队中抽调部分精壮的兵弁组成训练队，由西方教官进行使用洋枪洋炮的训练，尔后再将他们作为骨干返回原部队传教。1874年以后，这种新式训练的规模和内容进一步扩大，从组织训练队变为训练一部分成建制的营、哨、队，从单一的操练逐步扩大到在课堂上进行相应的理论教育。不久，又发展为开办各类军事学堂，至1887年，已经设立江南制造总局操炮学堂、北洋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三所陆军学堂。这些学堂对入学的学员主要讲授数理化基础知识、枪炮的构造和使用、炮台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内容，练习枪炮的使用和

维修、保养技术，训练作战时队形变换、散兵线与纵队相结合的战术等内容。这种新式的训练和教育虽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已向清代前期延续 200 多年的旧式训练和以武举选官的制度提出了挑战，为甲午战争后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的全面变革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陆军装备的普遍更新，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驻军都采用新法进行军事训练，并设立军事学堂进行理论及技术、战术的教育，晚清军事训练和教育呈现了全面变革的局面。突出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编写新教材，设立新的训练科目，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使用枪炮作战的各种训练，使部队掌握新的技术。二是设立各种武备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从社会和军内招收优秀学员，进行近代科学知识、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的教育，培养军事素质较好的军官。1904 年，清廷颁布了《陆军学堂办法》20 条，调整和统一了全国军事教育体制。自甲午战争至清王朝灭亡，全国兴办各类军事学堂 70 多所，培养学员上万人，初步建成了高、中、初三级学堂相结合的近代军事教育体系。三是既在以作战训练为主的军队中开办随营学堂，辅以理论教育，又在以理论教育为主的军事学堂中辅以军事训练，做到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双管齐下、相互结合。正因为如此，所以陆军军事训练和教育内容不断得到充实，逐渐形成了新的体系。

近代海军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发端于左宗棠 1867 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1874 年以后，随着加强海防和海军建设的需要，对海军训练和教育的要求更为迫切。于是，以福建船政学堂的基本规制为依据，加以发展与完善，又增建了各类海军学堂。至甲午战争前，陆续开办了天津水师学堂、广东黄埔鱼雷学堂、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奉天旅顺口鱼雷学堂、山东烟台海军学堂等 6 所培养海军军官和技术人才的学堂，达到了兴办海军学堂的高潮。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作为海军骨干的北洋舰队的覆没，使近代海军的训练、教育落入低谷。进入这些学堂的学员除了学习与陆军相同的数理化等各部门基础科学知识、军事专业基础知识，操练与陆军相同的各种基本的步法、转法、操法，以及枪炮的射击、维修、保养等技术外，还要学习海军、海战等专业理论，并要在舰上进行航海和海战等基本功的操练，掌握鱼雷和各种仪器设备的使用、维修、保养，以及舰船的驾驶、维护等技术。学员毕业后，还要到枪炮学堂和舰船上实习半年至三年，合格后才能任职。由于晚清政府比较重视新建海军的训练和教育，章程制度比较严密，对学员考选比较严格，所以从 1867 年至 1894 年中，通过在国内海军学堂学习、派遣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和考察等方式，培养出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一批军政素质较好的海军军官。他们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创建和发展，为保卫国家的安全和抗击外国舰队的入侵，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新式武器大量装备部队后，晚清军队在作战方式上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由于自洋务运动后清政府聘请了一大批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军官来中国充任军事教官，并派遣不少学生出国学习，这些国家军队的条令典范自然也就成为当时中国军队学习的蓝本，因此这一时期的战术思想也就深深打上了它们的印记。总的说来，随着军事技术的飞跃发展，晚清军队在战术上也有了质的变化。创造了不少新的战法。比如：在攻城中用枪炮实施火力突击，构筑坚固阵地抗击入侵之敌，在要塞保卫战中用岸防炮轰击敌舰，以海军舰队同敌国舰队进行炮战，用火炮对远距离目标实施超越射击

等。其中突出的变化有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以散兵队形作为基本的战斗队形，不再沿用以密集队形进行火力战和冲击的阵法传统。作战中要求士兵善于利用地形，随地跪卧，敌现则发，敌稳则停，以散队起伏方式逐段跃进接敌。防御时，要挖掘掩体、堑壕，前后相隔二三米，形成有一定纵深的多道防御工事。中法战争中，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纸桥之战时即利用散形战法，成三线设伏，逐次打击、削弱法军，当法军进到三线时，三面合击，取得了对法军歼灭性的胜利。

二是重视运用炮兵进行火力打击。作战开始时，炮兵一般先于步兵开火，实施超越射击，压制敌方火力，摧毁敌方阵地，击杀敌方有生力量，掩护步兵冲锋。敌军溃退时，炮兵要前称阵地轰击败残逃敌。防御时，要用火炮进行拦阻射击，猛轰来犯之敌，坚守必不可失的阵地。1876 年，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即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战法。当年 6 月下旬，清军到达古牧地城外，该城城堡坚固，阿古柏军企图凭城顽抗。清军即将其四面包围，并连夜在城外修筑高过城墙 1 丈的火炮阵地。炮台竣工后，清军不再采用迫近作业和攀城攻打的旧战法，而是先用火炮猛轰城垣，实施火力突击，打开许多缺口，尔后步兵、骑兵实施冲击，一举攻入城内。

三是在陆战中实施诸兵种协同作战。晚清编练的新军，已包括步、骑、炮、工、辎重各兵种部队。因此，无论是在平时训练还是在实战中，清军已开始注意诸兵种协同作战。甲午战争后，在聂士成所部编纂的、后来作为清军训练范本的《淮军武毅各军课程》中，对步、骑、炮三个兵种在作战中如何部署及如何协同击敌，提出了明确要求。课程规定，如以 1 个军、20 个营的规模进行作战，则应将步兵 14 个营分作先锋队、小接应队、大接应队等三个梯次，相互间保持一定的间隔距离，形成具有一定宽度和纵深的阵地；骑兵 2 个营部署在小接应队即第二梯队的两翼；炮队 4 个营部署在大接应队即第三梯队之后，中间 2 个营、两翼各 1 个营。作战时，步兵以散兵队形向前进攻；两翼骑兵负责防范敌人包抄和在敌溃退时实施追击；炮队阵地设在全队之后，负责实施火力突击，摧毁敌军阵地和杀伤敌有生力量；工兵负责在敌必经之地布雷设障，杀伤敌军和迟滞敌军进攻。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已在陆战中得到普遍采用。

七、军事制度的主要变革

近代后期，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特别是由于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军事制度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当然，从世界范围看，这方面的变革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存在着先后、快慢的差异，其发展呈现出十分不平衡的状态。军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尤其是直接取决于武器装备。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在社会生产和军事技术发展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军队编制体制等军事制度的变革也首先是从西方国家开始的。

1. 西方国家的军制

(1) 新的领导和指挥机构总参谋部

在18世纪之前，由于作战手段和作战方式比较简单，战场范围有限，因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行动的协调以及战略计划的拟定，都是由最高统帅直接掌握和进行的。18世纪上半叶，武器装备的发展，庞大常备军的出现，军队编组的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大的作战规模导致作战空间的扩大和作战时间的延长，使作战指挥日益复杂。于是，辅助军事统帅组织、管理军队的专门机构也即应运而生。这类机构，在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称总军务司令部，在俄国称总军务部。1785年，普鲁士军队出现了参谋部，负责为军事统帅传令联络、搜集资料；1806年沙恩霍斯特将其发展为独立的作战参谋机构。但是，只有到19世纪中叶，当毛奇任参谋长时，普鲁士总参谋部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毛奇在1857年以后的整整31年中，一直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总参谋长。在这期间，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发展得极为迅速，有着很高的权威，以致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在指挥军队作战的负责上，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国王和总司令还更为重要。正因为如此，普鲁士的参谋机构一直被其他国家奉为样板，对许多国家近代参谋机构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世纪下半叶，欧美主要国家都先后建立了总参谋部或类似机构。俄国是在1762年至1763年间正式建立总参谋部的，由陆军院副院长兼总参谋长。当时总参谋部编制为40名将军和军官，其主要任务是：准备未来战争各个战场的有关资料，培训军需官，管理地图绘制工作，等等。由于一部分军官被调到陆军院工作，因而长时期内俄军总参谋部仅是一个空架子。后来，保罗一世曾撤消了总参谋部。1812年，亚历山大一世又将其恢复，并提高了参谋军官的地位和作用。参谋人员中，外国雇佣军官很多，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冯·克劳塞维茨即曾在俄军总部任职。美国则在1813年设置了总参谋部。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军的总参谋部只是陆军部长手下的一个办事机构，其使命是协助陆军部长指挥部队。日本参谋本部的设立，比欧美国家要晚些。1871年至1874年间，在兵部省内曾设立参谋局。1878年，撤消了参谋局，成立了参谋本部，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令机关脱离政府而直接听命于天皇。这是日本军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措施。

从各国军队的情况看，总参谋部的主要任务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贯彻执行最高统帅的命令、指示，搜集和提供情报，拟定和组织实施战略战役计划与动员计划，指挥和协调各军种、各战区、各种武装组织的作战行动，有的还负责拟定和组织实施武装力量建设计划。近代后期的战争实践证明，

总参谋部作为军事指挥中枢，在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 1870 至 1871 年的普法战争中，双方的强弱并不完全在兵器方面，而是在他们的参谋本部。在毛奇的领导下，普鲁士参谋本部具有远见，运转灵便，富有效率，早在 1867 年便拟定了具有高度攻势性的精密的战争计划。当时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费尔在向法王的报告中即已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在普鲁士的各种优势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们的参谋本部军官团，这将是其致胜的最重要因素。而法国参谋本部的军官，却是些一天到晚忙于例行公事的刀笔之吏。可以说，缺少一个有效的参谋本部，这是法国战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普法战争后，参谋制度进一步引起了各国军队的重视。

（2）日益庞大的军队规模与日趋复杂的组织编制

纵观各国军队建设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和影响军队组织编制的有军事战略、军事理论、作战思想等诸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在冷兵器时代，军队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弓、箭、刀、马等，因此组织结构也比较简单，其编成只有步兵和骑兵。在 17 世纪中期以前，各国军队规模大都比较小，组成也比较单一。中国发明的火药传入欧洲以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军队开始使用轻火器和明火枪，军队的组织结构产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开始出现新式步兵和炮兵这两种新成份。尤其是到 18 世纪拿破仑时期，他不仅第一次使炮兵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使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了突破性发展，而且将步兵、炮兵、骑兵合编起来使用，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独立作战能力，这可以说是现代合成军队的雏形。19 世纪中叶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为军队提供了大量新型武器装备，军队的组织编制随之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近代尤其是近代后期以来，许多国家的军队在组织编制方面发生了两个重大而明显的变化。

一是军队规模日益增大，出现了庞大的常备军。近代以前，在欧洲很少有国家军队的人数能超过 5 万人。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同时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也需要强大原武力作后盾；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样就使建立和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需要，而且有了客观可能。于是，欧美许多国家军队的规模有了急剧增长。比如，在克里木战争爆发的 1853 年，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总兵力达 55—57 万人，海军拥有 171 艘战舰；英国陆军 16.2 万人，海军拥有 200 余艘舰船。俄国陆军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在册官兵总数达 140 万人，实际服役约为 100 万人，海军总兵力约为 9 万余人，拥有 384 艘战舰。美国由于国会在 1816 年通过了一个关于每百万人口只能征兵 1000 名正规军的规定，因而陆军总人数增长不快，平时在 1 万人左右的规模波动。但在 1815 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和 1846—1848 年的美墨战争中却扩大了 4 至 5 倍，最多时陆军达 6 万多人，海军达 1.1 万多人。军队变成常备军后，开始逐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正规军队。军人有了标准的制服，各级指挥官的军衔也趋于固定，并制定了一系列条令和条例。军队有了由国家提供的兵营，并按标准配备武器和其他制式装备，按照各种条令和条例进行统一

训练和实施战斗。

二是军队的组织制度日趋复杂。欧洲各国的武装力量一般由陆军和海军组成。随着武器装备种类的增加、技术分工趋细、专业性加强，陆、海军的编制出现了向复杂化发展的趋势。

在陆军中，虽然步兵仍是主要兵种，但工兵和炮兵已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早的专业工程分队于 17 世纪出现在法国。18 世纪初，俄国彼得一世批准了坑道工兵连的编制、舟桥队的编制和军事工程团的编制。19 世纪初，其工兵的基本编制单位是工兵连。其间虽然曾成立了负责工兵指挥的工兵局，并将一些工兵连合编成为营和团，但实际上它们仍然是各自为战的技术独立单位。随着工兵技术保障器材的技术发展和遂行任务专业化程度的提高，1816 年后出现了军属工兵营的编制。到 19 世纪中叶，俄军的师已有了工兵连配属，集团军也开始编有工兵长官。19 世纪下半叶，由于筑城、交通、新式通信器材和工程技术装备的进一步发展，在其编成内又出现了野战电报通信队、铁道营、水雷连、野战工程机械队等。在美国内战中，北方为保证军用铁路畅通，曾建立了铁路工程兵兵团，人数达 1 万。这时，工兵任务有了很大程度的扩大，人数也在迅速增加。在一些国家庞大的军队中，工兵人数已占总人数的 2%。炮兵和工兵一样，也是最早分化出的技术兵种。虽然炮兵早在 17 世纪末、18 世纪初在大部分国家即已列为军队正式编制，但仍未成为独立的兵种。到 18 世纪，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军队已出现了将炮连编入团和旅内的团队炮兵、野战炮兵、攻城炮兵和要塞炮兵。19 世纪后半期，炮兵科学，特别是内外弹道学、射击理论、兵器构造原理和炸药等理论的进步，使火炮技术再次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出现了编入师和军的轻野战炮兵、乘骑炮兵和山地炮兵，编入军和集团军的重野战炮兵。这时炮兵的作用已压倒了步兵。比如，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在进行色当会战时，就是依靠炮兵的压倒优势给法军以摧毁性的打击，以致在战争结束时，被俘的法国军官认为德军是靠“五公里长的炮兵”取胜的。

随着资产阶级庞大军队的形成和作战方法的变化，各国陆军出现了新的层次结构。18 世纪末，各国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是团，一般为 1200—1500 人。19 世纪上半叶，一些国家建立了编有各个兵种并能独立完成各种战术任务的常设兵团（师、军）。19 世纪下半叶，俄国、法国、奥地利等一些大国为了在各个独立战略方向上作战，还建立了集团军这种无固定编制的军团。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曾把普鲁士的武装力量分为几个集团军，通过发布训令的方法来指挥。

欧洲国家由于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海上武装力量一直比较发达。西班牙和英国海军都盛极一时。19 世纪蒸汽机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了海军发展史上的新的飞跃。欧洲各国海军先后完成了从木质帆船舰队向以蒸汽为动力的钢甲舰队的过渡，装甲舰、战列舰等主力舰成为舰队的骨干，海军已成为由舰艇部队、基地和陆战队组成的能进行海上独立作战的军种。在海军的发展上，英国和法国处于领先地位。到克里木战争前夕，英国海军拥有 200 余艘舰船，其中汽船则占一半以上，有战列舰 30 艘，舰炮 4673 门。19 世纪上半叶，俄国海军除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含多瑙河区舰队）外，还有阿尔罕格罗夫斯克、里海和堪察加 3 个分舰队。按主力舰数量，俄国海军仅次于英法，居世界第三位，但质量十分落后，绝大部分舰只还是木制帆船。克里木战争初期，黑海舰队曾在锡诺普重创土耳其舰队，夺取了黑海制

海权。英、法参战后，在大量使用蒸汽机和螺旋桨的新型舰艇的英、法海军面前，落后的俄国海军则变得不堪一击，最后只得龟缩到基地内，实行消极避战。

美国建国后，海军建设曾几起几落。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经过重建，美国海军已从过去的近海防御性力量发展为一支公海舰队。到 1815 年，已拥有 3 艘 74 门火炮的战列舰和 2 艘重型快速战舰。1814 年，美国人富尔顿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战舰，新型舰用火炮也已试制成功，但这些新兴军事技术均没有得到美国的重视和运用，从而使海军建设大大落后于英、法。1837 年，其海军力量仅占世界第 8 位。此后，美国海军虽有所发展，但直到内战前，在装甲蒸汽战舰上仍然难望英、法之项背。在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竞相发展海军，都制造了装有旋转炮塔和后装线膛炮的蒸汽装甲舰，并组成了舰队。北方则发展得更快些，明显占有优势。1863 年，拥有舰艇 588 艘，3.4 万人；1864 年增加到 671 艘，5.15 万人；到战争结束的 1865 年，则达 700 多艘。在内战中，水雷、潜艇和扫雷装置也发明并投入实战，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次装甲舰的海战、第一次用潜艇击沉战舰，从而引起海战的变革。在海军技术和装备发展的同时，美国政府对海军建设进一步引起了重视。美国海军理论家和史学家马汉指出：海军是取得制海权的力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要在战争中取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顾及国家之安全；其次须拥有一个足与敌国在现有状态下争取制海的海军。”他还认为，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是海军建设和在海战中获胜的关键。海军建设理论和技术的这些进步，为美国海军在 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实现“大海军计划”，建设远洋海军，实力跃居世界第 3 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普遍的义务兵役制

17 世纪，西欧军队是采用募兵制与强迫征兵相结合的方法补充兵员的。由于募兵制是以雇佣形式招募兵员，因而在西欧各国军队中雇佣兵占有很大比重，民族成份相当复杂，士兵的政治、军事素质也不高。俄、普、奥国军队的士兵，大部分系农奴组成，普、英两国利用大量外国人。德意志和瑞士的雇佣兵就很出名，教皇卫队专雇瑞士的阿尔卑斯人。募兵制的实行，使许多社会渣滓成为职业雇佣兵。民众对于军队是轻蔑的，当时在法国咖啡馆和其他公共场所的门前就挂有“狗、仆人、娼妓和军人不准入内”的告示。由于国家经济能力不足，雇佣兵在招募、训练和物质保障方面存在很多困难，因而不允许建立人数众多的军队。

资本主义在西欧多数国家的确立，引起了兵役制度的决定性变革，普遍义务兵役制逐步代替了雇佣兵制。1793 年法国雅各宾党人的革命政府首先实行了义务兵役制。按照这一制度，所有健康的适龄男子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应征入伍者通常为 20 至 21 岁，服役时间 5—7 年，然后转入预备役。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使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成为可能。1793 年雅各宾专政时期，国民议会颁布法令，号召公民应征入伍，结果在短时间内即组成了一支 80 万人的革命新军。新的征兵制度还为军队提供了更多后备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士兵的战斗素质。因为多数应征者在参军前就已受到军事训练，退出现役后通常也要接受预备役训练，这就普遍提高了公民的军事素质，为战时补充兵员提供了较大的选拔余地。1813 年，普鲁士也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 18 至 40 岁的男性公民均必须在常备军中服现役 3 年，然后转入后备军，直

到 50 岁以前都是非现役预备队的一员。19 世纪初，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实行了这一制度。

美国在内战前，军队一直是靠征募志愿人员进行补充的。志愿兵服役时间很短，一般为 6 至 12 个月，因而常常影响军事行动的开展。1847 年 1 月，由于美墨战争的需要，国会才立法，将服役期改为 5 年。在美国内战中，南方首先于 1862 年 4 月实行义务兵役制，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林肯总统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跟着也于 1863 年 3 月开始实行《征兵法》。《征兵法》规定，凡年龄在 20 至 45 岁之间的男性公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从而使服兵役成为国民的义务和强制性的行为。由于实行征兵法，尤其是政府批准征召黑人士兵，建立黑人部队，使北军兵力迅速增长。大批饱受奴役、具有为自身解放和自由而献身的强烈愿望的黑人入伍，给北军增添了生力军。应当说，兵役制度的这一重大变革，是北方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军的兵员补充有自己的特点。18 世纪初，俄军的补充实行募兵制。其做法是，国家每年从纳税阶层（主要是农民）中征集一定数量的新兵到军队终身服役。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由于战争频繁，1802 年至 1825 年间在选定的地区先后进行过 18 次征兵，征集的兵员累计约 200 万人。大体每 500 人（指纳人丁税者）中抽 2 至 5 人，1812 年曾达到每 500 人抽 10 人，应征年龄从 19 至 37 岁扩大到后来的 18 至 40 岁，服役期限仍然长达 25 年。在此期间，士兵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脱离家庭。为了简化征兵工作，减轻国家负担，亚历山大政府从 1810 年起还试行“军屯制”，凡划入军屯的地区，由在正规部队中服役 6 年以上的老兵和当地 18 至 45 岁的“国家农民”组成军屯营或团，作为军屯部队的骨干，其他一切适合服兵役的居民则编入后备队。男性儿童从 7 岁起就登记为“世袭兵”。军屯部队又当兵又种地，沙皇政府要求它们在粮秣方面自给自足；平时过严格的军事生活，按时起床、吃饭、训练和劳动。田间劳动由士官带队，统一指挥。士兵可以结婚，配偶由长官指定。任何违犯纪律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要受到残酷的体罚。到 1825 年底，各地军屯部队总数近 16 万人，另有“世袭兵”15.4 万余人。由于军屯制十分落后，且遭到农民的反抗，因此到尼古拉一世时便逐步被废除。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俄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因陆军大臣米留金在其中起的作用最大，因此有“米留金改革”之称。作为这次改革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于 1874 年初颁布了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法令。

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实行，再加上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各国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从而建立了 19 世纪战争中所常见的庞大的资产阶级常备军。这种征兵制一直影响到后世，直到现在。正像一位军事评论家在评论法国最早实行征兵制意义时所说的：在任何国家的法典中，再没有哪一种法律比这个不太著名的法国法案，对于人类的前途具有更大的影响。

（4）军事院校的兴办和军官的培养

早在 18 世纪初，正规的军事院校即在欧洲出现了。进入近代后期后，庞大的资产阶级军队的出现、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作战规模及方式的变化，迫切需要大批训练有素、具有指挥才能和专业知识的军官来管理和指挥军队。于是，英、法、俄、普、美等国纷纷兴办军事院校，并逐步形成了培训军官的完整的院校体系。正是这些军事院校，为欧美各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人才。

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注意通过军事院校培养军官的传统做法普遍引起了欧美各国的重视。被拿破仑打败的普鲁士首先建立了一个培训军官的教育体系，其中有各种训练专业军官的专业学校，在各专业学校之上又建立了军事学院，这是第一所真正接近于现代军校的军官学校。在这些学校，特别是军事学院中，首次对战争的原则和理论进行集体研究。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于1818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他的为资产阶级军事思想体系奠定理论基础的经典之作——《战争论》，就是在任校长的12年间写成的。在普鲁士的影响下，法国也发展了培养陆军各兵种的高级军校。俄国对通过军事院校培养军官没有英、法、普等国家重视，到尼古拉一世时，俄军军官仍大都由志愿从军的贵族担任，不仅质量低劣，数量亦不能满足军队需要。1832年，俄军建立起第一个最高军事学府总参谋部军事学院，为总参谋部培养军官。1855年，又建立炮兵工程学院。但这些院校连同原有的各类军校，还是无法满足对军官的需要。克里木战争前夕，军事院校毕业的学员只占军官队伍的12%左右，80%以上的军官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19世纪60至70年代，陆军大臣米留金进行军事改革时，为扭转军官数量不足和质量低劣的状况，取消了过去的贵族武备学校，建立了2年制的军官学校和7年制的军事中学。前者招收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青年；后者课程与普通中学相近，主要是为军官学校输送学员。同时还建立了2年制的士官学校，非贵族出身的青少年也可以入学。士官学校由各军区开办。对军事学院培训的内容也进行了改革。院校改革之后，凡未经过军校而升任军官者，都要经过相当于士官学校水平的考试。通过这些措施，俄军军官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一定提高。

在普、法等国的影响下，美国的军事院校教育也有了迅速发展。这突出表现在西点军校的改革上。这所位于哈得逊河湾的军校创办于1802年7月4日，其历史几乎与美国的历史一样长。开始，军校偏重于培养工兵技术人员，课程主要是军用民用工程技术。1802年至1814年，西点军校共培养了120名毕业生。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他们中有100人在军中服役，其中有1/4伤亡。这些军官在战争中表现都很出色，由他们构筑的工事，没有一个被敌人攻克。在战后，西点军校于1815年曾濒临被取消的厄运。1817年6月，学校开始复兴，门罗总统任命西尔韦纳斯·塞耶上尉为校长。当时担任美国陆军部长的卡尔洪十分重视军官的培训工作。他认为，一批具有丰富阅历的军官，怎么估计也不过份。缺少良好训练的步兵，通过补充可以迅速投入战场。如果没有足够的优秀军官，特别是连、团级的军官，那么军队将处于纪律涣散的状态，最高指挥官的智慧也就变得不起作用。为了培养出一支在战争艺术上有较深造诣的军官队伍，他认为必须加强西点军校的建设，把它从单纯培养士兵的学校变成一个培养职业军官的真正学府。在他的支持下，西点军校从工兵部队完全独立出来，校长不再兼任工兵司令。塞耶被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后，学校得到扩建，开始培养高质量的职业军官，对学生系统地讲授军事艺术并开展科研工作。学校一方面把一批军人派往欧洲留学，学习和考察欧洲特别是法国的军事制度；另一方面翻译了大量法国军事文献作为教材，尤其是约米尼的著作，对19世纪美国军事思想影响极大。经过改革，西点军校成为名符其实的高等军事学府，塞耶也在历史上为自己赢得了军校之父的美名。

除西点军校外，美国还建立了一些兵种学校，如：1824年在门罗堡建立

了炮兵实习学校，这是美国第一所军事专业学校。同年还建立了主要是培训民兵军官的诺维奇大学（后改为帕特里奇学院）。40年代，海军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以前美国水兵多是雇佣外国水手和无业游民，从而造成水兵素质低的状况。海军部长班克罗夫特于1845年在麻萨诸塞州安纳波利斯的塞文堡建立了美国第一所海军学校。1851年该校得到国会批准，改为4年制的海军学院，成为海军军官的“摇篮”。美国内战后，军事职业教育工作有了新的加强。担任陆军司令的诺尔曼领导建立了金字塔结构的军事教育网络。除了在全军建立“兵营学校”及设立在利文沃斯堡的大型训练中心，对基层军官和士兵进行专业培训和教育外，还建立了研究生技术学校系统，主要培训军官，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以适应装备现代化。陆军教育的最高学府西点军校改变了以往偏重军事工程和技术的做法，大量讲授基本理论和人文各学科课程，还开展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美国的军事院校先后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们毕业后大都成为美国军队的骨干，在美国军队的职业化建设以及美墨战争、美国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历史资料记载：在南北战争的60次重大战役中，有55次战役双方的军队都是由西点毕业生指挥。余下的5次中，有4次是由西点人指挥的一方取胜。到了战争后期，双方的战场指挥员几乎全都出身于西点。到战争结束的1865年，西点人在北方联邦军队中升到将官职衔的达190多人，上将就有3人；而南方联邦军队中升任将官的也有150多人，其中上将为8人，双方的总司令都是西点培养出来的。像罗伯特·李、泰勒、斯科特、格兰特、厄普顿等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所以，一个西点人曾经宣称：“如果希腊人忘不了马拉松；如果犹太人留恋耶路撒冷；……那么，美国人就应把西点军校铭记在心。”

（5）后勤保障制度的变革

进入19世纪特别是自50年代以后，在欧洲、美洲一些国家，火器已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义务兵役制的实行，使兵员大量增加，建立了庞大的常备军和后备军。战争规模也不断扩大。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武器装备的发展，把世界军事史推到了近代。各国军队先后完成了向近代化的过渡，后勤保障方式也随之发生了与冷兵器时代及旧火器时代显著不同的变化。

第一，军队武器装备的筹措和保障方式由以往的就地供应为主，转变为后方供应为主。由于各种技术兵器数量急剧增长和火力极大增强，使枪炮、弹药等物资成为战争消耗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弹药需求量显著上升，技术保障成为后勤保障的重要内容。比如，克里木战争爆发后，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英、法军队动用了2587门炮，共发射了238万余发炮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提出“炮兵的预备队就弹药”。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再依靠临时筹措或依靠从外国进口，各国普遍建立起一整套生产、储备和供应的系统，建立起专门的后勤机构，在保障方式上开始采用中央供给制，同时辅之以军队携带和就地取给。欧洲一些国家在中央军事部门的部队编成内，设置了后勤机关、部队、分队，成立了总军需部门和各级部队军需部。法国在陆军部下除设军需部外，还设有军械部、财务部、军医委员会和兽医委员会，并在陆军中编有军需兵、卫生兵和弹药兵。美国陆军在第二次独立战争后的正规化建设时期，曾设立了军械部、卫生部、财务部、采购部，1818年又设立了给养部。这些机构在陆军首长领导下，共同负责解决军队的后勤供给问题。

第二，军事运输由人力、畜力和自然动力运输为主，开始向机器动力的运输方式过渡。过去军队的补给主要是靠人力、风力驱动的舟船和人力、畜力为动力的车辆。近代以来轮船、火车的出现，使传统的运输手段逐步为先进的运输手段所取代。自 1807 年富尔顿建造的“克莱蒙特”号开始商业运行后，到 1830 年，已有成百艘蒸汽船在内河水域行驶。特别是火车的发明，使交通变得迅速而又价格低廉。1860 年，美国境内已拥有 3.1 万英里的铁路线。在内战中，轮船、铁路成了重要的运输工具。战争期间，军需部拥有 274 艘轮船，此外还包租了 1386 艘轮船，通过水路运送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当时，南方仅占有 3.1 万英里铁路中的 9000 英里，北方则占有 2.2 万英里，铁路网比较完整。内战爆发后不久，为保障军事运输，林肯总统即将全部铁路置于自己的直接管理之下。铁路为部队运输提供了很大的机动能力。北方曾在 11 天时间里，通过铁路把布托马克集团军的第 6 和第 7 军共 2.5 万人、10 个炮兵连及其战马和 100 车行李，从弗吉尼亚运送到 1200 英里外的查塔努加。北军所以战胜南军，运输手段比较先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870 年普法战争爆发后，普鲁士也正是依靠铁路线，在 21 天内将 55 万军队、15 万匹马和 6000 门炮集中到法国边境，并运输了大量物资，为赢得战争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医疗保障由就地治疗为主，转变为后送治疗为主。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火器杀伤力的提高，战斗伤亡率也随之提高，医疗保障越来越重要。在 1846 至 1848 年的美墨战争中，美军参战人数最高时为 6 万人，死亡 12876 人，其中仅有 1271 人是阵亡或重伤不治而死，由于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病和因事故而死亡的人数远远多于死于子弹和刺刀的人数。而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欧美国家每逢战事大都是临时组织医疗队伍。受伤或生病的士兵只有巧遇能干的医生并且是在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治疗。战争实践的发展，迫使许多国家对这种医疗保障方式进行改革，将军事医疗机构正式编入军队序列，并配备养伤病床和各种药品。美国内战中，布托马克集团军的一名军医莱特曼创造了一项实际可行的医疗制度，即各团设急救站，负责把伤病员转送到野战医院，然后再由野战医院将伤病员转送到战区外的基地医院。这一改革方案于 1864 年 3 月被国会正式批准实施，从而使北方军的伤病员在战争中得到了良好的治疗。后来，许多国家的军队也都采用了这种医疗保障方式。

2. 中国晚清军制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渐入末世的清王朝为挽救垂危的统治，参照西方的军事制度对军队进行过几次大的改组，先后建立了湘军、淮军、新式海军和陆军，使中国古代军制开始向近代军制转化。

(1) 从八旗、绿营到勇营军制

清朝的武装力量分为经制兵、官勇、和团丁三个层次。八旗和绿营兵是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其数额、编制、薪饷、防区均有定制，故称为国家经制之兵。有事临时招募、经费出自政府的官勇，其数额、编制、薪饷皆无定规。散处城乡各地的团丁，属于不脱产的团练保甲组织。清朝前期，八旗兵是主要武装力量。自康熙平三藩之乱开始，八旗官兵由于腐败日盛，战斗力逐渐

衰弱，其地位逐渐被绿营取代。康熙以后，绿营因承平日久，养尊处优，也相继衰弱下去。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在太平军和各地起义军的凌厉攻势面前，绿营兵不堪一击，渐趋瓦解。

在烽烟四起而官兵又腐败不能战的危急形势下，清廷只得下令各省官绅兴办团练来对付太平军。开始，这种临时招募的勇营虽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在军事上还只是作为绿营的附庸，不能独挡一面。自从礼部右侍郎曾国藩奉命在其家乡湖南湘乡创办湘勇（又称湘军）以后，这一新起的武装力量逐渐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1852年，曾国藩因母亲去世，回籍丁忧，同年冬天奉命协助巡抚办理湖南团练。曾国藩到长沙后，将防守省城的1千湘乡团丁仿明戚继光束伍成法，编成左、中、右三营，逐日操练，这是湘军最初编练的军队。1853年春，太平军进攻南昌时，曾国藩增募湘勇2千人、楚勇1千人，将湘军护编成10营，由曾国藩亲自统领。这年8月，曾国藩移驻衡州，着手建立水师。次年，造船240多艘，配炮570余门，在湘潭、衡州招募水手为水勇，编成水师5000人，分为10营。湘军初无马队，1857年因安徽蒙、亳起义军马队多且强，于是曾国藩始命李鸿章到安徽招勇500人，试操马队。1854年，改为马队营制。随着军事上的需要，包括陆营、水营和马队在内的湘军不断扩充，至1865年攻取南京后曾达12万人。于是湘军便很快取代了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相应地勇营军制也即取代了八旗和绿营军制。

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名比较明智的上层官僚，曾国藩对八旗、绿营的弊病看得比较清楚，因此在创办湘勇过程中，他力求革新经制兵的体制和调遣成法，另树一帜，以建立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新军，为此，他采取了下面几项改革措施：一是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勇营士兵全部公开招募，兵必自召，将必自选，层层选募，即由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分统，分统挑选哨官，哨官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士兵，并取具保结。这样，既可使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上下能患难相顾，又可使其不敢轻易逃离。二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一军之权全付统领，一营之权全付营官，大帅、统领不为遥制。三是兵权与饷权合一。粮饷支发皆由大帅裁度。四是提高士兵的薪饷。规定每正勇一名每月饷银四两左右，意在以厚饷养兵，从而大大提高了失意书生和山乡穷苦农民投军的积极性。五是加强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湘军对训练安排得很谨严，既练技艺，也练阵法，一天也不间断。曾国藩常亲自训话，训营规、训家规。通过这些措施，革新了八旗、绿营的军事体制，自此，“兵为将有”，中央兵权移于将帅，同时也在军营中形成了新的风气。

湘军分陆军、水师、马队三个兵种。1852年冬，初设陆军三营，每营360人。次年冬，每营改为500人，1860年始成定制。每营辖前、后、左、右四哨，每哨下辖8队。湘军水师初定，以21船为1营。由10名哨官统领。1856年间，改编30船为1营，1营30哨，每船1哨，共500人。湘军马队，也以营为建制单位，原制每营辖10哨，哨辖6棚。围剿捻军时，改定营制：马军1营统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辖五棚。随着湘军的发展壮大，各级指挥系统逐渐完善。湘军中主管军法号令的机构叫营务处，主管粮饷器械的叫粮台。营官之上有分管数营的分统；分统之上，有自主一路的统领；统领之上，由曾国藩任总统全军的大帅。

曾国藩编练湘军后，因手握重兵，故久受清廷畏忌，加之安庆战役后湘

军暮气日深，而此时新创立的淮军已成为劲旅，故曾国藩在湘军攻陷天京后立即将其解散。湘军虽解散了，但湘军制度却起了改革近代兵制的作用，支配全国军制达四十年。

淮军原是曾国藩为借李鸿章之手另建新武力而创立的，是继承湘军制度的一支勇营武装。1859年，曾国藩让在湘军幕府的李鸿章去招募淮南勇500人，操练马队。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苏南士绅派人向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在无兵可分的情况下，因见两淮风气强悍，决定训练淮军，以解决湘军兵源不足的问题，同时也为取代湘军预作准备，因此派李鸿章返回皖北招募淮勇。李鸿章回到合肥老家，即将昔日办理团练时的旧部招募成军，带往安庆，1862年乘轮船开赴上海。起初，新募淮勇只有5营2500人。曾国藩特意从湘军中抽出4营2000人充任军事骨干，并以新募湘勇4营2000人加以补充，共计13营6500人。淮军在上海成军后，其营制、饷章均一如湘军。李鸿章依靠上海丰厚的饷源和外国侵略者的支持，迅速扩充人数，购置新式武器，很快使淮军成为拥有7万之众和洋枪洋炮装备的新式军队，其作战实力大大超过湘军。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为抵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各省督抚纷纷仿效湘军营制，募练勇营武装，以资战守。其较有名气者除淮军外，还有河南的豫军、安徽的临淮军等。太平军、捻军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左宗棠等建议，应当以制兵为练兵，并在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勇营屯驻。于是，大部分勇营武装被裁撤，少部分则根据需要被保留下来，成为国家常备军，屯防要地，改称防军，如铭字军、盛字军、鼎字军、庆字军等。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有些省份或地区仍有一批绿营武装保留下来。自1863年起，清政府开始以湘军营制和湘军将领对其重新加以编练，故定名为练军。开始，是由直隶总督、原湘军将领刘长佑奉命经办，结果收效甚微。后来，清政府又令新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继续整顿直隶练军。曾国藩所定练军营制在人数和装备上虽有一些改变，但总体上仍是依照湘军。制定练军营制后，曾国藩未及执行就奉命赴天津查办教案，后又改任两江总督。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完全遵照曾国藩的办法办理，遂使练军成为从绿营脱胎则换勇营之骨的武装力量。接着，其他各省纷纷仿效直隶的做法，对绿营进行改造。从此，作为国家经制兵的绿营不复存在，勇营营制完全取代了绿营营制，成为中国晚清正式的军事制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清代军制，在咸丰（1850年）前是八旗、绿营制度的时代；自咸丰、同治以至光绪甲午之战（1894年）间，是湘军制度，并由湘军、淮军渐次过渡到防军、练军。据1898年清廷兵部、户部统计，全国防军、练军共36万人。

（2）水师和海军军制

清代水师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此外还训练了巡湖水师、巡盐水师。这些水师规模大都比较小，装备亦很落后。太平军失败后，1864年，因曾国藩、彭玉麟奏请，将湘军水师改建为长江水师，仍守湘军旧制。设长江水师提督一人，隶属两江、湖广总督节制，统率提标五营驻安徽太平府。每镇标各统水师四营，湖口镇标5营，共24营，战船774艘，士兵1.2万余名。尽管如此，清朝水师的战斗力仍比较弱，外海水师连守海口、捕海盗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与船坚炮利的西洋海军对抗了。

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清军加快了向西方军队学习的速度。在李鸿章的竭力建议下，清政府决定创建海军。经长期努力，终于建起北洋、南洋、福建 3 支海军。但福建海军随即毁于中法战争，于是集中全力加强北洋海军的建设，并建立海军衙门，仿英、德海军军规制订《北洋海军章程》。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溃不成军，从此一蹶不振。

北洋海军由李鸿章创办于 1880 年。成军后由丁汝昌任海军提督，统领全北洋海军，以英国人琅威理任总教习，驻威海卫。下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员，共有军舰 14 艘，士兵 4000 余人。其战官由水师学堂培养，艺官由管轮学堂训练，弁目从练勇水手中选拔。士兵以招募为主，因待遇较高，故从募者较多。北洋海军的简阅巡防制度是，每日小操，按月大操。立冬以后，各舰赴南洋合操，巡阅江、浙、闽、广沿海要隘。每逾三年，钦差大臣与北洋大臣出海校阅。此外，还制订了优抚制度。如规定：凡提督以下各级官员，临阵或因公受伤致残，或在海军供职逾 15 年至 20 年，积劳成疾不能做官当差者，均于开缺后给予一年官俸，并发给返回原籍路费。

（3）新军军制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国防的孱弱，使朝野上下强烈要求改革军制，改善装备，裁汰旧军，编练新军。清廷看到用西法操练的日本陆军打败了清朝湘、淮各军，于是决定也采用西方的方法试办新军。从此，中国军制开始向新的方向变革。

1894 年冬，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胡燏芬试办新军。胡燏芬在天津附近马厂（后移小站）练兵 5000，一切操练章程及火器等均照西法办理。这支军队被命名为定武军。1895 年 11 月，又命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接替胡燏芬编练新军。袁世凯将定武军扩编为一支包括步兵、炮队、马队、工程队在内的 7000 人的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该军以德国人为教练，全军总统由袁世凯兼摄，下设军务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督队营务处、稽查先锋官以及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转运局、侦探局等机构。这便是近代中国第一支完全按西方模式训练的新式陆军。与此同时，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在南京编练一支新军，定名为自强军。戊戌政变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奉命将北洋各军改编为武卫军，以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编为武卫前军，以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为武卫后军，以提督宋庆所部毅军为武卫左军，以候补侍郎袁世凯的所部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并另募亲兵 1 万为武卫中军。各军营制饷章，大率以新建陆军为准。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武卫军战败瓦解。为改变清军在战争中所显示出的混乱、懦弱状况，清廷在推行新政中，统一新军编制，将全国新军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 3 等，要求各省按新军营制编练常备军。为对编练新军的工作进行考查、督促，清政府于 1903 年成立了练兵处，以庆亲王奕訢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以户部右侍郎铁良襄同办理。各省亦设督练公所。1904 年，练兵处提出了全国常备军约需 36 镇始足分布的设想；次年宣布统一编制全国已编各新军番号。1907 年，新建立的统摄全国军事工作的陆军部决定，将计划编练的 36 镇兵力视各省情况分配，要求用两、三年最多五年时间编练完毕。清廷企图通过这些措

施统一军制，加速新军建设，将地方军权收归中央。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也着手整顿地方军队，主要是从绿营、练勇中挑选精壮，再招募民丁，编成巡防营，其编制、装备、训练也基本采用新制、新法。对清政府编练新军的要求。大多数省的行政长官因循守旧，并不真心奉行，只有袁世凯和张之洞积极响应。张之洞依照日本陆军师团兵制，将其所辖护军营扩大改编为常备军左右两翼，共有官兵 7032 人。袁世凯经几年选募操练，至 1905 年已编成北洋常备军 6 镇，并按顺序编成陆军第 1 至第 6 镇。这 6 镇军队实际上成为清末新式陆军的基干力量，也标志着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的形成。在清政府全力推动下，各省练兵工作有了进展。但是随着 1910 年清政府被起义的武昌新军推翻，编练新军的计划也即告中止。终清之世，只练成了 14 镇又 18 混成协又 4 个标，全国新练陆军除禁卫军 2 协万余人外，共有兵力 17.9 万多人。

清末编练的新军全面采用了西方的营制操法、薪饷制度和兵役制度。新营制规定，常备军实行军、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营、队（相当于连）、排、棚（相当于班）的编制序列。军主官称总统，标主官称统带，营主官称管带，队、排、棚的头目分别称队官、排长、正目。军是部队最高建制单位，每军视情况辖 2 镇、3 镇不等。实际上，军这一级编制并未成立，因此镇也即成为新军的最高单位。新军军制不仅否定了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也否定了湘、淮军的勇营制。与旧兵制比较，新军制的最大特点是仿效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兵役制度，建立并实行了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制度。这是中国军队向近代化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4）太平军军制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自金田建军、武装起义开始，在十多年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洪秀全等领导人根据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在总结以往的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吸收中国古代军制优秀遗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军事制度，并据此组建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农民军。太平军各项军事制度之完备，组织之严密，军纪之严格，是历代农民起义军所不及的。其军制在中国军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产生过一定影响。当然，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由兴盛走向衰败，其军制在后期也遭到了破坏，逐渐变得混乱。

军师负责制与将凭制度。从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国到 1856 年“天京事变”之前，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天王领导下的军师负责制，即由天王执掌军事大权，下设军师之职。开始，任命杨秀清、萧朝贵为左辅、右弼正军师，冯云山、韦昌辉为前导、后护副军师。他们在天王统率下，和石达开一起共同领导太平军。1851 年 12 月，天王分封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并规定正军师东王节制其他诸王，将太平天国军事领导权全权授予东王杨秀清。从此，天王领导下的军师负责制便作为太平天国的军事领导体制正式确立。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虽然仿照《周礼》设有六官丞相，丞相以下还设有检点 36 员、指挥 72 员、将军 100 员，但他们平时不是掌管全国军政事务的职官，只有奉命出朝统兵时才被赋予独当一面的权力。太平天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由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又副军师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三人组成。其中杨秀清拥有裁决大权，军令皆由其发出，实际上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一军一切生死黜陟等事，军帅详监军，

监军详钦命总制，钦命总制次详将军、侍卫、指挥、检点、丞相，丞相禀军师，军师奏天王，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天王降旨，军师宣列王，列王宣掌率以下官一体遵行”。由此可见位列“朝纲之首领”的正军师权力之显赫。天京变乱、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自己兼作军师，实行“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的新体制，前期的军事负责制便告结束。后来，虽然在1858年恢复五军主将制，1859年封洪仁玕为军师和干王，1863年加封李秀成为军师，但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有力的军事统帅部，军事领导系统很不完善。天王大权独揽，整个太平军的调遣、守将的任命，实际上还是由他掌握。

太平天国在所占领的地方建省、郡、县三级，郡、县两级分别设立总制、监军各一名，总制和监军是地方军事领导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负有武装守土之责，并领导作为地方武装的乡兵。总制、监军既受其上级的领导，也受当地驻军长官的领导，总制之上的省级军政领导，一般由中央军事统帅部指派的指挥、检点、丞相等高级将领担任，并受当地军事长官或更高的将帅领导，或由他们及其副手兼任。

太平天国对镇守各地的军官和统兵大员，实行“将凭”制度，即在其封授派遣之时，由正军师东王杨秀清颁发一张用二尺留边寸余黄洋绉制成的“将凭”。拥有“将凭”的佐将，是太平天国最高军事统帅的代表，握有先斩后奏之权。太平天国后期，郡、县两级的总制、监军变为乡官，受当地守将节制。由于洪秀全滥封王爵和将官，加之省、郡、县三级的许多地方军事将领拥兵自重，因而造成了指挥的混乱。

武装力量组成与太平军的组织编制。太平天国武装力量由太平军、王府卫队、女营和乡兵等组成。太平军是太平天国武装力量的主要成分，也是主要的作战部队，直属天朝中央指挥，有正式的编制、统一的番号和后勤保障系统，实行严格的军纪律令。其任务除卫戍京城和各根据地重要城镇之外，主要是在各个战场与清军作战。天王和列王都配有一定数量的侍从宿卫和其他属员，他们分别专属于天王和列王，一般不直接受正军师东王的指挥调遣，不参与作战，仅仅是一种警卫性质的武装力量。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分营的军制，男子除参军之外，大多数人编入诸匠营、百工衙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年老体弱者编入牌尾馆，又称老民馆。女子编入女营。女营又称姊妹营、女馆、女军。女营按军事编制，以军为单位，实行军、卒、两三级建制，共编40军。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就是著名的女军将领。女营平时主要从事肩米负盐、挑砖担水、割麦砍柴和营建等体力劳动。一旦军情紧急，也要参加守城和战斗，与太平军并肩杀敌。因此，女营也是太平天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太平天国对占领区的乡村社会基层按军、师、旅、两、伍进行组织，即1.25万家组成一军，每军下辖五师，每师下辖五旅，每旅下辖五卒，每卒下辖四两，每两下辖五伍，每伍共管五家。这也就是太平天国的乡兵。这类武装力量，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

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全部由陆营组成，后来陆续组成土营和水营。定都天京后，逐渐形成由陆营、土营、水营和骑兵、炮兵等多兵种组成的军队。

陆营：最初由5个军组成，后扩编为10个军；定都天京后，正式建制为95个军。陆营大部分为步兵，也有一定数量的工程兵、骑兵、炮兵等其他兵种。

土营：1852年组建于湘南，由来自湖南道州、郴州、桂阳等处数千名煤矿工人组成，编制为两个军。土营是直属太平天国最高军事统帅部的工程兵，其任务主要是构筑工事、挖掘地道、暗藏地雷、轰塌城垣，为攻城部队开拓前进道路。

水营：1852年冬成立于武昌。定都天京后，水营正式建制5军，不久又扩建为9军。水营除担负水上作战任务外，还承担水上运输、架设浮桥等。

太平军的编制仿自《周礼》，按军、师、旅、卒、两、伍系统编组军队。军为最高建制单位，一军设军帅一人，辖五师；一师设师帅一人，辖五旅；一旅设旅帅一人，辖五卒；一卒设卒长一人，辖四两；一两设两司马一人，辖五伍；一伍设伍长一人，辖伍卒四人。一军官兵共13156人，但大多数军实际上都不满员。平时训练和战时领队督战都由军师负责。出师作战，则由太平天国军事统帅部另派监军出任指挥官，监军之上又设总制节制。由于太平军始终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之中，因而总制实为一军固定的最高长官。此外，一军之中还配备有经办军需、文书等23种事务的各种典官杂职人员，共35人。太平军的陆营、土营的编制大体相同，其区别仅在于土营在总制之上还设有将军、指挥。

军需供给制度。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天下皆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根据这一思想，太平军实行人无私财和公有均分的圣库制度。所谓“圣库”，就是所有参加太平军的人，把自己变卖家产得到的钱财和打劫富豪所得财物全部交给公库掌管，这个公库即称为“圣库”。定都天京后，朝内设正、又正、副、又副总圣库四员和总圣库协理二员，分管天朝圣库，并节制各军的典圣库官。官兵的衣食杂用，均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从圣库领取，其他一切军械军需也从圣库取给。太平军官兵在生活上基本平等，所有人一律没有俸禄，粮食、油、盐及其他副食费皆有定制。军官每人每礼拜发礼拜钱即副食费100文，士兵50文。另外还有买菜钱，官兵一样标准。这种长期实行的圣库制度，是太平军后勤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太平军的粮秣、衣物、军械供应，除靠圣库保障及在打仗中取于敌方外，还通过以下两个主要途径来解决：一是实行典衙和诸匠营制度。典衙俗称百工衙，是太平天国专门组织各种有专长的人进行以军工为主生产的手工业机关。所谓“百工”，盖言其多，实际约有42种，如典炮衙、铅码衙、典硝衙、典铁衙、战船衙、弓箭衙、旗帜衙、缝衣衙、豆腐衙、天茶衙等。其产品主要供应朝内和天京军民。有一部分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也供给天京之外的太平军。所以，典衙机构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太平军的后勤供给机关。除百工衙外，太平军还建立了包括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等在内的诸匠营，专门生产各类军需物资。百工衙和诸匠营生产的产品直接分配给各基层单位，不经过市场进行交换。二是在战地和已占领的地区筹措。具体办法有“打先锋”、“进贡”、征收税粮和采购等。所谓“打先锋”，就是联合当地贫苦农民，用武力的方式剥夺地主豪绅的金银、衣服、粮食等财产。进贡则是在占领地区动员当地群众捐献钱财和粮食。在这几种办法中，“打先锋”是太平军获取军饷的重要途径。

军律和军令。太平军十分重视军纪、军法建设，在发动起义和定都天京后，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军律和军令，其中主要有《十款天条》、五大纪律与《太平条规》。《十款天条》是洪秀全、冯云山创立拜上帝教时订

立的；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又颁布了五大纪律诏。它们都是指导、规范太平军行为规范的主要军律。《十款天条》的主要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五条军律是：遵条命；别男行女行；秋毫莫犯；公心和傺（读那，“和傺”是广西平南附近的方言，为共同商量、融洽无间的意思），多遵守头目约束；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在此基础上，1852年，洪秀全又颁布了《太平条规》，其中包括定营条规、行营条规，对军队宿营、行军提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要求。诸如：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无事不得过营越军；要各正军装枪炮以备急用；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不许焚烧民房、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等。

太平军不仅重视军律、军令的制定，对其在军中的贯彻执行亦非常严格，如有违犯者，轻则枷杖，重则立斩。《十款天条》和《太平条规》既是军律，亦是刑律性质；为了严号令、肃纪律，太平军还制定了惩治违法乱纪行为的具体规定。1852年洪秀全诏令严查军中是否有犯第七天条即“不好奸邪淫乱”者。一经查出违背此天条的人，立即斩首示众，决不宽恕，李秀成在其《自述》中曾写到：东王杨秀清令严，军民畏，无论何官何兵，擅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斩左脚，右脚踏入斩右脚。因此，“上下战功利，民心服。”

太平天国军律、军令之完备，执纪之严格，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独有的。这是太平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强大凝聚力、能征善战、深得人民群众拥护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连湘军主管情报的头目张德坚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不虏乡民，赈济贫者，“乡民德之，……贼至争迎之”，“处处助贼打仗”，官兵在作战中“能耐劳苦忍饥渴”，“莫不奋勇争先”，就是“渡不测之渊，登壁立之山，……死者自死，渡者自渡，登者自登”。当然，到太平天国后期，由于军律、军令贯彻不力，太平军纪律逐渐松弛涣散，败坏军纪的现象屡屡发生，军队战斗力也便受到很大削弱。

八、军事理论的变革与创新

1. 资产阶级著名军事理论家及其军事思想

(1) 变革创新的年代

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科学，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随着许多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斗争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则主要是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后的半个世纪内逐渐形成的。拿破仑一世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承袭法国大革命军事改革的成果，逐步完善了法国的军队组织，并通过大量的战争实践，创立了一整套新的作战方法。总结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经验，研究拿破仑的统帅艺术和军事思想，是19世纪许多国家军事理论家的主要课题，从而形成了当时军事学术研究的主潮，并推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特别是理论科学进入了一个变革创新的年代。这个时代产生了众多的军事思想家，可谓众星灿烂。其中突出代表是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1780—1831年）和瑞士的若米尼（1779—1869年）。他们在总结历史上各次重大战争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的基础上，对军事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战争的本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军队建设、战略与战术的区分、攻防作战的基本原则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研究。法国大革命产生了一代天骄拿破仑，拿破仑战争则培育出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两位近代军事科学巨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是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标志着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体系的确立。

奥地利的卡尔大公（1771—1847年）、德国的毛奇（1800—1891年），也是当时颇有建树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大公是奥地利君主利奥波德二世之子，奥地利元帅。在指挥与拿破仑一世的军队作战中屡获胜利。1801年升任奥地利军事委员会主席，锐意施行改革，建立和制定了新的军事制度和军事条令。著有《从1796年的德国战局论战略原理》、《1799年德国和瑞士战史》等。在军事科学的范畴和研究对象问题上，他主张将军事科学划分为战略（或关于战争的科学）和战术（或军事艺术）两大部分，认为进攻作战最有利，而防御作战只有在尔后预定要转入进攻时才有意义，主张在攻防中都要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优势兵力。他以军事统帅兼理论家而在资产阶级思想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毛奇，亦称老毛奇，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826年毕业于柏林军事学院。他的军事生涯长达70余年，不仅是出色的战地指挥官，而且是德国最著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他与“铁血宰相”俾斯麦被并称为不可拆散的“雌雄剑”。在1858—1871年任普鲁士总参谋长期间。他改制扩军，革新装备，制定未来战争计划，从而使普军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均获胜利，实现了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统一。1870年受封为伯爵，次年晋升为元帅。1871—1888年任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他曾主持编写战史工作，并著有《毛奇军事论文集》、《军事教训（交战的准备）》等军事著作。毛奇继承了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坚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在战争中主张先敌动员，重视利用铁路调动军队，突然袭击，分进合击，利用外线作战手段在速战速决中取胜。

近代后期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发展，充分表现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勃勃进取精神，它继承并大大发展了以往军事学的成果，运用当时最先进的哲

学思想观察分析战争现象，使军事思想上升到新的理论层面，使军事科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强调研究战争的历史经验，探索战争的规律和方法用以指导战争，重视军事技术的作用，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和军队编制、制度的改革，重视政治精神因素和人的作用，重视地理、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这些都包含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也存在夸大军事统帅个人的作用、夸大武器尤其是新式武器的作用以及片面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等偏颇，这些又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军事科学的局限性。

（2）克劳塞维茨与《战争论》

克劳塞维茨于 1780 年 6 月 1 日出生在普鲁士马格德堡一个小贵族家庭。12 岁便被父亲送进普鲁士军队，在步兵当士官生。1793 年，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革命后的法国军队作战，13 岁的克劳塞维茨参加了围攻美因兹城的战斗。1795 年，普鲁士与法国媾和，此后他在军队度过十多年的平静生活。其间，他阅读了大量新出的军事书籍，并学习拉丁文、数学以及哲学、历史，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1801 年被荐送柏林军官学校，系统地学习了军事知识和康德的哲学思想。1803 年毕业后，担任了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并继续从事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侧重研究了这一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法国军事著作，撰写发表了一些军事评论和政治、哲学研究文章。1806 年 10 月，在第 4 次反法联盟对法战争中，克劳塞维茨随亲王参加奥尔施泰特会战，被法军俘虏，翌年获释。国家屈辱和个人不幸，激发了他改革强军的决心，回国后即写了《关于普鲁士未来反法行动》的备忘录，并积极投身军事改革工作。1809 年初，调普军总参谋部工作，任总参谋长兼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沙恩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协助其进行军事改革。1810 年 8 月 29 日，克劳塞维茨晋升少校军衔，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战略学和战术学教官，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在这两年里，他得以将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上升为理论并加以整理，为王太子讲课的 8 本 244 页的提纲，已初步形成他的战争学说轮廓。1812 年春，克劳塞维茨反对普鲁士国王同拿破仑结盟，辞去了军职，去俄国参加反拿破仑的战争。在俄军，他担任沙皇顾问冯·富尔将军的中校副官。当年 6 月 22 日，拿破仑向俄宣战。战争期间，克劳塞维茨在骑兵军任参谋长，参加了一系列会战的筹划和战斗，并荣获沙皇金质佩剑奖。1814 年回归普军，翌年任布吕歇尔军团第 3 军参谋长，在第 7 次反法联盟对法战争中，参加了利尼会战、滑铁卢会战，直至联军最后战胜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欧洲的封建势力得以巩固，普鲁士封建势力继而排斥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改革者。克劳塞维茨先被任命为莱茵军团参谋长，后被调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1818 年 9 月升为少将军衔，时年 38 岁。他并因功绩卓著、才干出众而被重用，反被限制在只管行政不得过问教育的校长职位上。这使得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克劳塞维茨陷入痛苦和失望。在任校长的 12 年间，他闭门潜心于战争理论的研究工作，矢志著书立说，先后研究了 1566—1815 年间所发生过的 130 多个战例，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路易十四战争、拿破仑战争以及 1813 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一系列战史研究的评论，整理总结了自己所亲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撰写了许多重要战史著作，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提升。1830 年春，克劳塞维茨调任炮兵第二监察部监察。当时《战争论》尚未修订完成，他不得不中断这项理论工程，将 3000 多页手稿包封起来，以

备再作修改。1831年5月，他被调任驻波兰边境普军参谋长，同年11月6日卒于布雷斯劳，终年51岁。

克劳塞维茨去世后，他的妻子玛丽整理出版了《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除对战史研究评论的各卷外，前3卷就是《战争论》。全书60余万字，分3卷8篇124章，分别论述战争性质、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进攻与防御和战争计划等。

《战争论》是克劳塞维茨在总结以往战争经验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用12年时间写成的。克劳塞维茨在政治信仰上倾向封建君主制，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他参与的战争中，始终与拿破仑为敌。但他也通过亲身的经历认识到，“法国革命战争突然打开了一个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战争现象的世界”，“在拿破仑所指挥的战争中形成一套最好的方法，带来了使所有人惊叹的成果”。他看到拿破仑以其革命精神改造了全部战略体系，冲破了一切旧的战争法规和惯例，创造了全民征兵制，建立了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和军，创造了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的新的作战方式，强调进攻，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战场，迅速机动，并掌握强大的预备队，力求消灭敌有生力量等等。相比之下，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军制、作战方法和军事学术思想已显得陈腐不堪。这些都迫使人们以新的眼光去重新审视战争，探求和提出新的战略战术思想。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拿破仑战争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他把拿破仑称为“战争之神”，并积极致力于仿效法国，改革普鲁士落后的军制和军事思想。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研究的思维方法上，深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他运用辩证方法总结战争经验，探讨战争理论问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战争哲学”的命题，并致力于在战争哲学、战争最一般的理论原则方面提出独创性的见解，因而使他的著作取得空前的成就，达到了同时代所无人企及的理论高度。在《战争论》一书中，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问题的独创性的见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论战争的一般性质。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提出：“战争无非是扩大了搏斗”，搏斗双方都力图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包括三个方面：

——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战争是暴力行为，充满暴烈性，战争要准备流血牺牲，任何仁慈的观点、怯懦的观点都是有害无益的。

——战争是充满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他一方面认为，战争是有其自身内在规律的，战争规律或多或少可被人们所认识；另一方面又认为，整个战争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像一场赌博，冒险精神和统帅的天才大有可为。

——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产生于政治，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决定于政治，军事观点必须服从政治观点。战争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脱离政治。军事统帅应具有政治头脑，正确认识所从事的战争。

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看，暴烈性的要素，使战争成为一种盲目的自然冲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使战争成为一种非常理性的行为。这三个方面，分别同人民、统帅、政府和军队相关联。“这三种倾向像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战争论》以大量篇幅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尤以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著名观点，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政治本质，为后世政治家、军事家所普遍重视。早在克劳塞维茨之前，就有不少军事家在军事理论著述中涉及到这个问题。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初，中国春秋时期的著名军事学家孙武，在所著《孙子兵法》中，即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论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他把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归纳为“五事”、“七计”，把“道”放在“五事”、“七计”之首位。“道”即指政治。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又说：“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孙子把“道”也即把政治作为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近代欧洲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也对战争与政治关系作过某些论述。如英国的H.H.E.劳埃德（1720—1783年）认为，政治因素对于战争的影响不亚于地理因素。普鲁士的A.H.D.von.比洛（1757—1808年），把战略划分为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指出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关系，就像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关系一样，而政治战略是最高一级的与克劳塞维茨同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对战争与政治关系也有不少论述，但大都是零散和肤浅的，远未达到《战争论》的理论高度。

论战争目的与手段。克劳塞维茨提出，抽象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而现实战争的目的是多样的，歼灭有生力量，占领要塞地区，攻击入侵，待机御敌等等。但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目的。消灭敌人的军队，“并不是仅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且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指敌我双方在“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如不给敌人军队以致命打击，即使占领敌国全部国土也仍未达到目的。打跨敌人，可采取粉碎其主力部队、占领国家权力中心和政党集团所在地、有效地打击敌人强大的盟国等方式，然而无论如何，“战胜和粉碎敌人军队始终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极为重要的”。关于消灭敌人军队与保存自己军队的关系，克劳塞维茨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战争中的目的尽管多种多样，而手段只有一种，就是战斗。所以，用武器解决问题是最高法则。

论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克劳塞维茨在这部著作中，批驳了以前的军事理论家们过于强调物质因素而轻视精神因素的观点，充分肯定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并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把战争中起作用的要素分为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五类，并将精神因素列为第一位。他认为：“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他提出，精神的力量主要包含：第一，统帅的才能。在“军事天才”一章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天才是一种擅长军事活动的高超精神力量，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智力。第二，军队的武德。包括勇敢和团体精神。团体精神即通过军队这个团体的种种制度、规章的惯例而固定下来的军人品质。书中对这一精神给予很高评价。第三，军队的民族精神。主要指高度的热情、狂热的信仰和信念等，这是民众武装的天赋品质。这三种精神因素在战争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其区别在于，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他们作用发挥的大小不同。“最好的办法是对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都不要轻视”。在三种精神因素中，克劳塞维茨更强调的是统帅的才能。在战争中，精神因素、

精神力量在各个时期都起作用，贯穿于战争的各个方面、由始至终。而精神因素与物质因素是相互作用、影响，是融合而一、相辅相成的。克劳塞维茨对精神因素作用的分析，有些方面有份夸大精神力量的偏颇。

论民众武装。克劳塞维茨的所谓民从武装，指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民军。他认为民众武装是一种巨大的战略防御手段，有正规军队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在《战争论》中描述道：民众武装如同燎原烈火，从四面八方围困敌军，烧毁敌军基地，破坏敌人生命线。而敌人不可能像驱逐一队队士兵那样赶走武装的农民，“处处都有抵抗的因素，处处又都捉摸不到”。民众武装在战争中的作用并非万能，其作用的发挥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战斗在本国腹地进行；有复杂的地形如山脉、森林、沼泽；民族性格有利于民众战争；战争持续时间长等。他还指出，民众武装的使用原则是：不宜进行大规模的战斗；配合正规军队行动；不宜用于战术防御，而应作为战略防御的手段。

论进攻与防御。《战争论》用最大篇幅论述“防御”和“进攻”，其深刻性在于指出两者的辩证关系，反映了攻防矛盾辩证运动的一些规律。他认为，进攻与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进攻与防御都不是单一的整体，防御中有进攻的因素，进攻中也有防御的因素；整体防御可进行部分的进攻，整体进攻可进行部分防御；进攻可转为防御，防御也可转为进攻。在军事思想史上，克劳塞维茨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成对范畴，鲜明地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防御。他还提出了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观点，即进攻是一种具有积极目的、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一种具有消极目的、较强的作战形式。防御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防御可赢得时间之利、待机之利、地形之利、民众之利、因而比进攻容易得多。而在具体战争中应取哪种作战形式，则取决于所追求的目的和拥有的力量。如力量强大足以达到较高的积极目的，就应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如目的消极、力量薄弱时，应采取防御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

论作战中的基本原则。书中主要论列三条：数量上的优势，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克劳塞维茨指出：“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进行战争首要的规则应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在总兵力方面，在绝对数量上占优势。同历史上许多著名军事将领和军事学家一样，克劳塞维茨高度重视集中兵力的原则，并在理论上作了较多系统的阐述。他说：“最好的战略是首先在总兵力方面，然后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始终保持十分强大的力量”。一是“空间上的兵力集中”，即在主要方向和决定性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优势兵力。二是“时间上的兵力集中”，即在关键的、有决定意义的时机，同时集中使用全部兵力。这一基本法则主要是就战略而言，并不完全适用于战术。而就攻击而言，“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击败敌人的最有利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作为目的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缺少的。

除以上观点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面对已改变的时代，应当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以代替过时的错误理论。过去理论的缺陷在于：过多地追求肯定的数值，把军事行动当作数学习题来演算；只考虑物质因素而忽视精神因素，只考虑单方面的活动，而忽视作战双方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理论不应当是死板的规定，而应当是一种考察；理论应当培养指挥官的智力、

能力，而不是制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公式。克劳塞维茨十分强调战史的作用，认为战史是最好的老师。战争中存在某些原理、原则，但不是永恒不变的，各时代有各时代的战争，因而应有各时代的战争理论。但他未能进一步探究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克劳塞维茨是 19 世纪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之一，而他所著的《战争论》则是军事思想史上第一部自觉运用辩证法阐述战争理论的划时代的名著。在他去世后一个半世纪，人们仍然给予高度评价。（美国《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战争指导》说）：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位伟大的战略学家，是现代战略学研究的鼻祖”，《战争论》“不愧为全面研究军事学术的最佳理论著作”，“在某种程序上讲，他的著作就是战略学的‘圣经’”。

（3）若米尼及其军事理论

若米尼 1779 年出生于瑞士帕耶讷，祖籍意大利。少时家庭富裕，早年立志成为一名贸易家或银行家。从学校毕业后到巴黎一家大银行当了职员。拿破仑一世大军在意大利战争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全欧，使若米尼开始仰慕拿破仑的统帅雄威，向往革命风雷激荡的法国。1798 年，他开始跨入军旅生涯，在为法国服务的瑞士步兵团任职，后进入法国陆军一后勤部门当军需官。不久因才华出众被选到司令部门，曾任陆军部长的副官和秘书长等职。1802 年欧洲战火暂告平息，若米尼返回商界，但其意下在做银行家，而是潜心研究拿破仑崭新的作战方式和统帅艺术，写出《大军作战论》。此书引起拿破仑麾下内伊元帅的重视，他不仅资助了这本书的出版，还聘若米尼作自己的随身助理。1805 年，内伊元帅将此书推荐给拿破仑。拿破仑读后大为震惊，说此书把我的全套战法写出来告诉敌人！若米尼因此受到拿破仑的赏识，被提升为上校参谋，后任内伊元帅的参谋长。在法军供职期间，他参加了拿破仑指挥的多次远征。1812 年，若米尼升任准将。同年，在拿破仑远征俄国的战争中，被任命为维尔诺城防司令和斯摩棱斯克省省督。1813 年，若米尼复任内伊元帅的参谋长，在拿破仑指挥法军同俄、普联军的会战中，表现出优秀的指挥才华。拿破仑后来讲到，若米尼如果不是病魔缠身，早在远征俄国后就可以得到元帅的节杖了。若米尼不是战将出身，被称为“文人战略家”，拿破仑的格外器重，若米尼本人的恃才傲物，招致了拿破仑麾下一些资深将帅的仇妒。若米尼为此先后 15 次提出辞职，但每次均被挽留。最终，他与拿破仑的参谋长 L.—A. 贝尔蒂埃元帅矛盾激化，于 1813 年 8 月致书俄国沙皇，表示愿转而赴俄国效劳。俄国沙皇久慕若米尼大名，敞开大门迎接这位“文人战略家”。开始让若米尼在俄统帅部任军事顾问，曾两度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侍从武官。后又帮助俄国创建了高等军事学院，成为俄军事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俄土战争和克里木战争时，他参加了俄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对若米尼的离走，法国方面未予视作叛国，因他的国籍是中立的瑞士。当俄国等欧洲反法联盟 1815 年重新对法开战时，若米尼也保持了人格上的清正，从未给俄国及其盟友在反法战争上出谋划策。对此，俄国沙皇也予以宽容，在对法战争期间特意安排若米尼回瑞士休假。战后，若米尼继续充任俄皇军事顾问，协助筹划军事方面的改革，但主要精力则用于著书立说。1855 年晋升为步兵上将，同年离俄赴比利时，后去法国。1869 年 3 月 24 日在巴黎逝世，终年 90 岁。

若米尼是 19 世纪与克劳塞维茨齐名的军事理论家。他身后留下了一大批

很有价值的军事著述。这些著作大体分为战史和战争理论两大类。他对战史极为重视，认为对战史的研究是战争艺术原则的唯一理论基础，从而坚持从战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提炼理论。在他的著作中，战史著作长达 47 卷之多。他的军事思想中贯穿着法国 18 世纪启蒙学派理性主义精神，确认战争有原理和规律可循，强调按原理和规律作战方能致胜。其主要著作有：《论大规模军事行动》、《1792—1801 年革命战争批判军事史》、《战略学原理》、《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生涯》等；代表作是《战争艺术概论》，全书七章共 30 万字。

若米尼认为，军事科学就是军事艺术或战争艺术，它由六个部分组成，即：战争政策，战略，大战术，战争勤务，工程艺术，基础战术。战略是进行战争的科学，战术是进行战斗的科学。他批驳了战争规律问题上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指出那种视战争为“充满阴影的领域”、“毫无规律和科学可言”的战争神秘主义观点的荒谬，鲜明宣称战争确有若干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可以认识和掌握的。他提出，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是赢得一切军事胜利的基础，那就是适合各种情况的概则，胜利来自遵循历史教训中提炼出来的概则，概则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有用。同时，他又竭力反对把战争理论绝对化，承认概则的相对性。针对那种把牛顿力学机械地搬入军事领域，用几何学原理和方法指挥作战的军事学派，他指出其错误莫过于相信战争有一种“纯粹的科学”，一切行动都可以用数学计算的方式加以决定。他主张应根据不同的作战地区、作战对手而随机应变，指挥官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违背原则，善于对各种原则作最大限度的自由运用。

若米尼在《战争艺术概论》中对战争与政治关系问题作了探讨。他认为，战争中的政治因素主要指恢复或保证国家的某种权利和利益，援助邻国和履行对盟国的条约义务等一些作为政府加入战争的理由。一方面，国务活动家应该注意根据战争政策“判断战争是否适合时机，是否正当，甚至或者是否需要，并决定究竟应采取哪些行为，以求达到战争目的”。另一方面，“不同的战争类型，对于为达到既定目的所要采取的作战行动的范围，都可能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因而战争发动者还应注意作纯军事的考虑。

在关于民众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他认为在侵略性战争中，侵略者若是碰到不惜一切牺牲的民族奋起抵抗，后果是非常危险的。在民族性战争中，一个民族全体自动奋起抗战的景象是十分壮观的。由于民众参加可以大大增强抵抗者的力量，因而任何精锐的军队，在其实力不足以占领全国所有的重点，无法保护一切交通线等情况下，若是碰到一个心怀怒火的强大民族，那注定要归于失败。但他对民族奋起抗战本身，则以人道主义的观点给予否定。

在进攻与防御的问题上，若米尼论述了攻防相反相成、相互转化的关系，从攻防各自的利弊方面探讨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作战中进攻的价值，认为进攻优于防御，克敌制胜的唯一方法不是实施旨在威胁其交通线的机动，而是交战；为粉碎敌人，必须采取坚决的战略，及时把主力投到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点，以闪电速度实施突击，并适时转入追击。若米尼在防御作战上也主张“攻势防御”。他把防御区分为消极防御与积极防御两种，指出“消极防御总是极为有害的，而积极防御则能取得巨大成功”。被迫采取防御的指挥官，决不能“采取单纯消极防御，也就是说，决不在固定的点上停留不动，静待敌人对其实施突击。反之，他应使自己的作战行动倍加活跃，

并争取主动，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敌人的弱点”。他还进一步指出，攻势防御战争“不论在战略或战术上，都是有利的采取这种作战行动，可以利用攻防两种优势”。

在集中兵力问题上，若米尼把它看作是适用于一切战争环境的伟大的原理，是战争的格言。他指出，一些军事名将在战争中大获全胜的秘密，就在他们善于“集中他的主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而拿破仑集中兵力攻敌一点的方法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因此，“分散兵力是兵家的大忌”，而“只要集中兵力，就能取胜”。

若米尼强调国家应重视军事的发展，建立健全完善的军事制度和良好的军事政策，大力提倡民族的尚武精神。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认为武器本身虽然并不能获得胜利，但却是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肯定振奋士气的重要性，指出士气对战争命运有重大影响。他阐述了慎选将帅的重要意义，认为优良的将帅是保证胜利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并对将帅的选拔及其应具备的条件作了较详细的论述，认为优良的将帅应精通战争理论，具有决策和指挥才能，具有勇敢、正直、坚定、冷静等优良品质，选拔将帅必须严格、审慎，明智和公正等等。

若米尼的军事理论，在战争哲学思想方面不如克劳塞维茨那样丰富、深刻，但在对战争规律的一些认识问题上，又比克劳塞维茨的看法更清晰、辩证。若米尼的军事著作，以其论述的通俗简明，与克劳塞维茨推究思辨的风格迥然别异，而倍受欢迎，成为欧美各国军队普遍采用的权威性军事教材。无论如何，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在军事科学史上堪称一代两璧。

2.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

（1）军事科学史上的崭新理论

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同时，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并逐步走向与其上升时期相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和激化。无产阶级开始有组织地同资产阶级进行多种形式的尖锐斗争，从工人罢工等和平斗争方式逐渐开始走向武装起义等暴力斗争的道路。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产生的历史前提。无产阶级进行军事斗争的需要，又现实地提出了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军事科学理论的任务。这个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主要是欧洲1848年至1849年的革命，特别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提供了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经验，从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的军事学说奠定了初步的实践基础。与此同时，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西方军事学术发展史，尤其是武器发展史、军队发展史、作战方法发展史、主要军兵种发展史等，深刻分析总结了他们所处时代发生的一系列重要战争和战役战斗经验，认真研读了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著作，吸取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发展最高成就中的精华，获得了创立无产阶级军事学说的丰富思想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军事问题进行理论概括的时代，虽然出现过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

但就这个时期整个斗争形势而言，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当时和历史上的战争，探讨战争和军事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些根本问题。

在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得出了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消灭私有制这一革命结论。1850—1853年初，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的经验时，又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暴力的必要性，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武装起来，建立自己独立的军队。从1851年中国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到1871年法国爆发巴黎公社起义的20年间，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十几场比较大的战争。这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200多篇关于战争评论的文章，通过对具体战争的分析，冲击了军事理论领域内长期充斥的宗教观、英雄史观、投机侥幸等唯心主义观点。这些评论，涉及如何正确认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艺术。同时，在总结各国人民起义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这些军事理论文章，阐述了军队及军事技术、战术发展的唯物主义原理，奠定了无产阶级的军事历史学、军事技术学、军制学、筑城学、战略学、战术学以及军事地理学等各门学科的理论基础。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创建自己的新军队。在以后撰写的理论著作中，又对暴力与经济的关系、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战争的起源和性质等，作了进一步的系统的理论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题军事著作和涉及军事问题的著作以及战争评论、关于军事问题的书信共440多篇，200多万字。主要有《反杜林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军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山地战的今昔》、《德国农民战争》、《步兵史》等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为崭新的军事学说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认识工具，使他们得以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观察战争和解决军事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军事理论，是与他们的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部分，其丰富性和深刻性都使他们的前人望尘莫及。这个理论体系，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论证了战争的历史暂时性和战争存在的历史界限，分析了战争与经济、政治的必然联系，深刻阐明了战争、武装冲突和整个暴力的阶级性质及政治本质，研究了决定战争发生、进程和结局的规律，全面论述了构成战争力量和军队战斗力总和的各种因素及这些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据此提出了许多战争和作战的指导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无产阶级军事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创立，不仅为各国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军队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推动了世界军事科学的发展。

（2）马克思、恩格斯军事理论的主要学说

关于战争根源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把战放到社会经济基础上来研究，认为战争和军事是一个历史范畴，有它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战争并不是人类一产生就有的现象，也不是永恒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阶级社会的战争，则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的产物。而“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考察为基础，从理论上论证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阶级对立、阶级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阶级统治、奴役、暴力等种种关系，归根到底又是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他们一再申明，一切历史冲突归根到底都源于社会经济运动，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不是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战争根源的探讨中，已涉及到战争本质问题。他们赞赏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但不同意克劳塞维茨“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的解释，而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战争是阶级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而进行的暴力斗争。他们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切历史冲突，在阶级社会里集中表现为各国统治者和他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日趋严重、一步步尖锐以致剑拔弩张，非诉诸武力不可，非诉诸战争不可。运用这种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具体战争写了大量评论，其中包括英国—波斯战争、英国对华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摩洛哥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等。通过这些评论，揭示战争本质，进一步申明战争是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这一根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论证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关于战争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指出战争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既起过残杀破坏作用，也起过破旧促新的作用，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革命，成为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他们据此断言：无论是殖民地国家人民的革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都是和战争这个环节连在一起，战争最后肯定会引起革命的后果。这个革命的后果，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将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们认为，统治者掌握着武装力量，会使用暴力对付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可能用和平方式的时候应当采取和平斗争方式，在必须使用武器的时候就要使用武器。暴力是革命的杠杆，无产阶级不应当盲动或绝对放弃和平手段，然而不可能单纯通过议会斗争取得胜利，最终必然要转到暴力革命。无产阶级虽然不排除和平手段，但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实现消灭一切战争的目的。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暴力革命的开始形式。他们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先占领城市，夺取国家政权。起义和战争

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取得胜利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第一，不要玩弄起义，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并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以对付在组织、训练和习惯势力方面都占优势的统治集团；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坚决地不停顿地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每天都应力求获得新的胜利，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第三，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争取中间的动摇势力，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前就迫使它退却，对起义者而言，要勇敢、勇敢、再勇敢！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这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暴力革命的理论。他们在《法兰西内战》中出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首先必须用革命暴力摧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然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并且还必须用武装来保卫新生的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也是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一项最基本的内容。这个思想不是对以往旧暴力理论的简单批判和继承，而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考察得出的结论。他们在叙述阶级斗争发展历史时，特别是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阶段的时候，循序地探讨了阶级社会内部隐藏着的暴力行动和战争，指出奴隶反对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和战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历史地考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发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大多数方式中都充满着暴力。资本的原始积累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而这一道曙光的出现正是通过直接使用暴力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了暴力在历史发展上的革命作用，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认为暴力是建立和维持一切国家的重要手段。人类的社会发展史表明，国家起源于私有财产和阶级，是通过暴力手段建立和维持的。“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有：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无产阶级国家及暴力与以往任何阶级的国家及暴力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不论怎样，在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中，暴力总是存在的，并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暴力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其作用是不同的。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从公仆变成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面发展；或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或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将阻碍经济发展，摧毁生产力，使整个社会倒退。而革命的暴力，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革命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在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即：当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如果不打碎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无法发展的时候，革命暴力就会起到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实现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的作用。所有旧社会制度向更高级新社会制度的过渡，离开革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2卷，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同上书，第1卷，第35—36页。

命的暴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暴力革命理论，十分强调暴力对经济的依赖性。他们认为，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关系，并直接依赖于经济关系。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以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暴力比其他一切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一个完全新的阶级所进行的旨在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必然会创造出新的兵器和新的作战体系。

关于建立革命军队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时代，无产阶级建军的问题还没有直接成为实践。他们在阐述暴力革命理论时，论及军队的起源和本质，揭示了军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指出引起军队变革的基本因素，并在分析军队历史特别是当时欧洲各国军队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关于建立革命军队的一般原则。其主要观点是：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它是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军队及其编制编成取决于经济状况，作战方式方法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水平，武器和装备状况取决于生产状况。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个条件，亦即取决于居民的质量和技术水平。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必须拥有自己坚强的武装力量，在获得胜利以后，还必须凭借这种武装力量保卫革命的成果，维持自己的统治。人民武装力量的组织应由正规军和工人农民自卫军两部分组成。无产阶级军队应十分重视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进行训练，致力于掌握军队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

与以往军事家关于军队建设理论所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将军队建设与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紧密联系起来，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他们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并在这个基础上阐述了建立无产阶级军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早在 1845 年，恩格斯即对未来社会军队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推测，预言在未来社会里将没有常备军。6 年以后，他总结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武装起义的斗争经验，在《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中指出：“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可靠乡村中的农民自卫军；（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在这里，恩格斯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武装力量体制的设想：由工人、农兵自卫军（民军）担任国内勤务，由正规军（常备军）负责抗击外敌入侵任务，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还阐述了独立地武装工人的思想，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的任务。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指出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要有自己的武装，有自己强有力的军队，无产阶级才能有独立的地位，才能进行不断革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马克思、恩格斯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拓展，将问题研究超出武装起义的范围，进入到对无产阶级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地位的阐述。他们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取得的政权，就必须摧毁旧军队而代之以人民武装，必须依靠人民武装这个权威。恩格斯于 1887 年 2 月 13 日在给巴黎国际友谊节组织委员会的信中，面对当时极其严重的战争危险，再次提出废除旧的兵役制而“代之以真正的人民军”，并对“真正的人民军”在训练时间、训练内容、军队编制、武器装备及服装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特别强调：“这支由人民自己组成的军队是根本不能用来对外进行征服

的”，也不能用于“对内残酷镇压人民运动”。这是对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的性质、职能及建设问题所作的十分明确的论述。

关于人民战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就必须武装起来，实行人民战争。普遍地武装人民，训练人民，组织群众起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是以弱抗强，战胜统治者和侵略者的唯一方法。他们指出，“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手段。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手段”。“民族起义的力量不在于进行决定性的会战，而在于进行游击战争、防守城市和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在敌后方和侧翼举行暴动，扰乱敌正常运动，夺取或销毁敌粮秣辎重。武装的群众，游击军，最好不穿着制式服装，可随时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出现而不被敌所识觉。要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扰乱敌击敌。这样，敌人的每一个行动都有千百只眼盯着，而敌人对人民武装却看不见、摸不着。这种武装是敌人无法打散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民战争的意义时，还阐述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他们从其所处时代发生的具体战争中，得出了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勇敢和必胜的信念常使战斗得以胜利的判断。并指出，精神因素是战斗力的一部分，而其发挥的作用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武器的改进固然非常重要，新式的枪使战术发生某种重大变化，但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他们。勇猛的精神对战士来说是重要的素质，它可以弥补许多弱势，可创造令敌人惊畏的战绩。

关于战略战术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观来阐述政治、经济、技术条件与战略战术的关系，指出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新的作战方法的产生不是天才统帅悟性的自由创造，也不是神的启示，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他们的战略战术思想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从战略的高度强调集中兵力，指出战略的奥就在于集中兵力。在阐述这个问题时，他们首先对集中兵力这一军事通则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尤其对拿破仑一世集中兵力的战法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在《法国作战方法的批判》、《如何击败普军》、《攻击》等军事著作中，有比较集中的阐述。他们认为拿破仑致胜的秘诀在于集中，在于设法创建多兵之旅，在于在作战的关键性地点和时机造成多兵。他们非常赞赏拿破仑“多兵之旅必胜”的名言，并具体地评论说：当拿破仑看到自己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作战时，例如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决定意义的作战线上（在对奥战争中是斯特拉斯堡—维也纳线），而把较少的兵力留在次要的战场上（意大利）。集中兵力的原则，在古希腊人那里，还只往往限制在战术范围，仅被看作是一个基本战术原则；到了拿破仑等新一代将帅那里，显然予以高度重视并运用这一原则取得赫赫成绩，但也未超出战役范围。马克思、恩格斯则不仅把它看作战役原则，并且上升到战略上来评价，将其作为一条重要的战略原则，使之成为整个战争的作战指导。关于进攻与防御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许多军事家就曾有过广泛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发展，在于深入地论述了攻防的作用及它们之前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对进攻战法有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从战略意义上说，进

攻是指在任何一次大小战斗或决战中夺取主动权的行动，通常使用全正面攻击、翼侧攻击、中央攻击的方法，但攻击并不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唯一战法。以前的军事家往往认为谁先攻击，谁就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而在战史上也确有不少喜爱攻击而取得惊人胜利的统帅，如：汉尼拔、亚历山大三世、凯撒、拿破仑一世等等。这种情况使人产生一种误解：进攻即主动，进攻即胜利。这是需要大大修正的。历史上的许多统帅，他们所有的重大胜利都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取得的，而所有的巨大挫折也大多是在自己掌握主动权的军事行动中遭到的。进攻在作战中既可以取得重大胜利，也可能导致巨大挫折。只有在处于绝对优势兵力、战场条件又利于进攻的条件下，进攻才可获得大胜；如果是处于劣势的军队，就不应盲目进攻，应采取防御的战法。防御的战法在作战中是不可少的，这种战法甚至是最稳妥可靠的。他们特别指出，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而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防御的目的就是从机动中采取进攻。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他们高度评价拿破仑的 1814 年战局和 1815 年战局是两个卓越的战局，是完全防御性的战局，是进行进攻战和不断攻击的最出色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进攻与防御时，也论及追击和退却的问题。认为追击是进攻的继续，战果通常是在追击时得到的；追击愈猛，胜利越大；胜利的彻底程度取决于追击的勇猛程度。退却，也能获得时间、有利时机直至胜利。这些论述，许多在当时战争中即被验证，而且继续被以后的许多作战实践所证明。

（3）“大军事作家”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也同是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而在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创立的过程中，恩格斯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军事著作，有些是互相交换意见后由马克思执笔，有些是马克思提出思想和观点，转请恩格斯执笔，但绝大多数是出自恩格斯之手。因此，单就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创立而言，恩格斯则是最杰出的代表。

恩格斯 1820 年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今伍珀塔尔市）一棉纺厂主家庭。1834 年 10 月入爱北斐特中学读书，1837 年 9 月受父命中途辍学到商行当练习生。1841 年 9 月至 1842 年 10 月，在柏林炮兵部队服役。1842 年 4 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与马克思会面。1844 年在巴黎与马克思再次会面，从此两人开始合作从事共产主义事业。1849 年 5 月德国西部和南部为保卫帝国宪法举行了武装起义，恩格斯赴爱北斐特，领导该地起义人民构筑防御工事，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参加志愿部队的战斗。事后，他撰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探讨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他深切体会到军事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年的系统的军事理论研究。他阅读历代军事家的大量军事理论著作和军事史著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军事问题，对当时重大军事行动进行深刻分析。1850 年 11 月至 1869 年 6 月，恩格斯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著作。在《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中，对军事组织和作战方法的发展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发展问题作了论证，提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将有自己的表现，将创造出新的、特殊的作战方法。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提出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动力，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他为纽约《美国新百科

全书》撰写了《军队》、《步兵》、《炮兵》等 59 个条目，涉及到军队建设、装备发展、作战指挥、筑城、炮兵、海军等范围十分广泛的问题。在《纽约每日论坛报》、《新奥德报》、《新闻报》、《曼彻斯特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多种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美国内战、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和其他一些战争的评论文章、军事论文。1878 年完成《反杜林论》一书，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系统阐述的同时，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上不仅起反动的作用，还起进步的作用。1834 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指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途径与形式，探讨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他一生先后撰写了 300 多篇论述军事理论、军事历史问题的著作，在军事理论领域独树一帜。

恩格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有效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坚持研究的系统性。他认为，“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他曾当过一年炮兵（1841 年 9 月—1842 年 10 月），并参加过武装起义，担任“共产主义同盟”盟员维利希的副官，负责军队的装备和粮食供应，同时直接参加过 4 次战斗。这些经历，使他对军事斗争有一定程度的感受，并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但他闪光思想的产生和理论建树，则主要来自系统的研究工作，首先又是来自系统的军事基础知识。他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我所需要的，是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编制。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他详尽地研究过军事组织的各种技术，不放过任何一个他想了解的细节，从战略战术直至一个炮架。他非常注意军队通史，用了相当大的精力研读各种军事著作，如：威廉·纳德尔中校的西班牙战争史，赫·金策尔《近代筑城的战术要素》，威·维利森《关于 1831 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若米尼《1792 年至 1801 年革命各次战争的军事批判史》和《拿破仑在凯撒、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法庭前自述的政治生涯》，克劳塞维茨《遗著：论战争和军事学术》和《战争论》，阿·吕特根《1850 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陆海军的军事行动》等等，还系统研究了欧洲各国军队的历史与现状等大量资料。他在撰写军事论文时，严酷地要求自己必须详尽地占有一切有关资料。他说：在写战史方面，如果没有关于兵力、给养和装备等情况的各种材料就想加以论述，那是最容易出笑话的。由于恩格斯在军事理论研究领域所表现出的准确、深刻的见解以及富于科学预见，他在当时即被尊为“军事权威人士”，而被友人称之为“将军”。马克思也这样评论说，“恩格斯在参加巴登战局以来，已经把军事作为他的研究专业。并且，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写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你可以相信，人们将会怀疑作者是普鲁士的大军事作家”。

。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5 卷，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65 页。

同上书，第 46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 5 卷，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01 页。

